



引用格式:马俊峰,王斌.美好生活的内涵及其生成逻辑——基于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6):1-9.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8.06.001

文章编号:1009-3729(2018)06-0001-09

美好生活的内涵及其生成逻辑

——基于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

Study on the meanings and generating logic of a better life

—Based on Marx's theory of human liberation

马俊峰,王斌

MA Junfeng, WANG Bin

西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将美好生活置于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的视域中来考察,是深入探讨美好生活意蕴的前提性根据。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深刻阐释了人的劳动能力的解放、人的社会关系的解放、人的个性的解放三种解放样态。基于此,美好生活则是人在从事对象化实践活动中所呈现出的一种完美和谐的发展状态,本质上是人的全面解放在现实生活中的极致展现。相应地,这也从根本上规定了美好生活生成的三重逻辑指向,即人民创造性劳动的生成性逻辑、确立绿色发展价值观的思想性逻辑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同构性逻辑。明确美好生活的丰富内涵与生成逻辑,有利于人们为达成美好生活的理想图景选定理论坐标和实践路径。

关键词:

马克思;
人的解放;
美好生活;
生成逻辑

[收稿日期]2018-08-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BZX015)

[作者简介]马俊峰(1969—),男,甘肃省长张家川县人,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王斌(1989—),男,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人,西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11} 美好生活理念的出场是对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的现实回应，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憧憬的价值取向。但美好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美好生活何以成为人通达意义世界的栖息之地，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鉴于此，本文拟从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的视角切入，阐释美好生活的内涵和生成逻辑，以期为达成人民美好生活愿景提供理论坐标和路径参考。

一、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探源

众所周知，马克思毕生致力于人的解放问题。在马克思看来，“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2]46}。人的解放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为人的解放提供了根本指导，彰显出巨大的理论魅力。深入研究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的精神实质，辩证地把握其理论内涵，才能认清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的真理意蕴。

1. 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基于对“现实的人”的思考，通过对“现实的人”的本质的揭示，确立了关于人的解放的理论。“现实的人”是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的逻辑起点。我们只有通过厘清“现实的人”的科学内涵，才能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

马克思视野中的人，既不是抽象的人，也不是自我意识的人，而是通过自己从事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彰显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的人”。马克思曾强调：“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3]1} 这就是说，我们要充分地理解人，就必须把人置于人与社会、现实与历史、共性与个性、抽象与具体等关系中来考察，如果脱离社会

关系去理解人，只能把人理解为一种抽象的人，既生物学上的人，而这种人在社会中是不存在的。唯其如此，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认为“现实的人”要维持生存、延续生命，就必须进行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即从事劳动，从而形成人的生产基础、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人在从事劳动生产实践过程中，一方面使自然界成为人的实践活动对象，为人的现实生产活动提供物质前提；另一方面还生成了以语言为表征的人所独有的精神属性，而人的精神属性来源于人同社会和其他人间的交往关系。由此可以说，“现实的人”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的统一，是人的现实性的本质规定，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也是从根本上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关键所在。马克思关于“现实的人”之本质的深刻阐释，超越了以往哲学家的认知范式，实现了西方哲学史上关于人的本质认知的革命性变革，也为深刻把握人的解放问题提供了唯物辩证的方法论指引。

2. 马克思人的解放的多维内涵

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人”是处于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中的人，深受物质生产与社会结构的影响，因为“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3]147}。马克思对“现实的人”之本质的深刻剖析，赋予了人的解放理论以博大精深的魅力，指明了人的解放是以人全面占有和享受人的本质为归宿的解放，并由此规定了人的解放的多维内涵。

(1) 劳动能力的解放。人所从事的物质生产实践即劳动，是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展现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劳动创造了人本身”^{[4]988}，劳动在现实性上规塑着人的本质，可以说，劳动是人的自我价值生成、本质力量确证的根本途径，也是人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的有力表征。马克思指出，人的劳动能力主要包括体力和智力，“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

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5]。人的体力和智力与人的解放密切关联,二者结合的方式和向度与人的解放本质相关,为人的解放提供了可能性依据。在私有制条件下,由于受资本逻辑的控制,人的劳动成了异化的劳动,“劳动始终是令人厌恶的事情,始终表现为外在的强制劳动”^[6],这就遮蔽了劳动的本真意义,使人完全享受不到劳动所带来的幸福和快乐。造成劳动异化的根源是私有制和基于私有制的强制性的旧式分工,因此只有消灭私有制和旧式分工,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完美结合,才能使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随着人从异化劳动中彻底解放出来,人的发展及其本质就会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历史性跃迁,人的劳动能力和人类社会才会得到解放。

(2) 社会关系的解放。人在从事物质资料生产中必然会与社会、自然和他人结成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135}。也就是说,人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其本质力量才能得以确证,才不会成为与自身发展相对立的异己力量。人的社会关系的生成主要来源于普遍而广泛的交往实践活动。在交往实践活动中,人与社会、与他人不断进行交往和联系,结成广泛持久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伦理关系、宗教关系、文化关系等,从而使人的社会关系不断得到拓展和延伸,使人逐渐超越狭隘的民族、地域、地理环境的制约。这时,人类将结成自由自觉的联合体,世界历史的图景也将因人的社会关系的广泛发展而发生深刻改变。当然,在参与构建社会关系的过程中,人还必须摆脱外在性、异己性社会关系的束缚,因为人的解放“只有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本身所驾驭的时候,才不再是理想、职责等等”^[7],才会

自由自觉地控制社会关系,全面占有和支配社会关系,由此为自身的全面自由发展和彻底解放奠定基础。

(3) 个性的解放。在马克思看来,人的个性是其处于一定社会历史语境中所表现出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既包括人的自主性、自为性,又包括人的自觉选择性和自我创造性。在人的解放的问题上,人的个性的解放最终指向人本身,人的解放的程度如何主要取决于作为主体的人的个性的发展程度。所以,人的个性的解放对于人的解放至关重要。而人的个性是在社会关系中孕育并生成的,深受社会关系的规约,这就决定了人的个性是一个历史范畴。马克思曾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3]415}。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人完全受资本逻辑的控制、支配和裹挟,人对资本具有依赖性。在资本的奴役下,由于受各种各样物欲的驱使,人变得麻木不仁并逐渐迷失自我,人刚摆脱人身依附,却又深受物的依赖关系的囚禁,人的发展因而就偏离了应有的方向和目标,长此以往,人的独立性和个性将被消磨殆尽,并逐渐陷入资本的控制中。总之,人的个性的解放是人的解放的本质逻辑的延展,这一解放根本上是要致力于打破资本对人普遍控制的桎梏,使人超越资本控制的窠臼,恢复人的独立性和个性,用“有个性的个人”逐步替代“偶然的个人”,以觅寻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价值,实现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

二、美好生活的内涵

如前所述,基于“现实的人”的考量,马克思深刻论述了人的解放的三种样态,完整地勾勒了人的解放理论的本真内涵。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的理论,不仅为人的解放指明了方向,而且蕴含着关于美好生活的丰富思想。

1. 美好生活是凸显人的主体性的生活

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的价值旨趣表明,无产阶级是实现人的解放的主体性力量。马克思曾强调:“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4][8]17}也就是说,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担负起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因为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有前途的阶级。无产阶级的这一先进性决定了无产阶级在实现自身解放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当然,无产阶级自身的解放与整个人类的解放是完全一致的。无产阶级要想获得自身解放,首先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彻底消灭私有制和一切阶级压迫,从而为人类自身的解放提供前提性基础,因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8]。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只有实现了自身的解放,人类的彻底解放才有实现的可能性,或者说,无产阶级自身的解放本身就蕴含着人类的解放。同时,人类的解放又会加速无产阶级自身的解放,使得无产阶级对经济、政治等领域的诉求更广泛、更强烈。当然,这些诉求的满足,一定程度上是无产阶级实现自身解放的有力表征。可见,无产阶级只有意识到自身的主体性地位,积极发挥自身的主体性力量,无产阶级自身的解放和人类的解放才有实现的可能。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中内含的无产阶级主体性思想,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9][2]14},这就要求我们要不断满足人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美好生活需要,以凸显人民在新时代的主体性地位。由此可以说,人民美好生活愿景的达成就是对

人民主体性的最好诠释。

2. 美好生活是满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需要的生活

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的最终价值目标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422},是马克思毕生追求的崇高理想。马克思通过理论与实践的不断探索,以实现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发展自身的本性为旨归,让人摆脱一切外在力量的枷锁,不断满足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从而使人逐渐通达美好生活的境界。所以说,只有满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人对美好生活的价值期许才能实现。

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异化劳动的社会现实时指出,工人在异化劳动的奴役下从事劳动生产,精神受折磨,肉体被摧残,完全感受不到人之为人的生命张力和乐趣,体验不到生活的美好。因此,马克思提出要在自由人联合体中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全面发展是人打破强制性分工后从事任何一种劳动时,人的体力、智力、个性、品质等各方面的素质和能力都得到协调发展的客观状态;人的自由发展是人摆脱所有外在束缚,根据自己的兴趣与爱好,自由、自觉、自愿地发展自身的素质和能力时所呈现出的人的发展的主观状态。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是互为前提、互为目的的,不能把二者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割裂开来。一方面,人的各方面素质和能力越是全面发展,其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诉求越能得以满足;人们依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不断地自由拓展自我发展的空间,就会促使其对美好生活充满憧憬和向往,激励其为实现美好生活的价值期许不懈奋斗。另一方面,人的自由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得以提升,会进一步促使其素质和能力的全面发展。所以,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由发展是一种耦合关系,两者的有机

结合昭示着人的解放的理想状态:“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2]189}可以说,没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美好生活就得不到圆满展现。这就要求我们要最大程度地满足人们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惟其如此,人们才会增强不懈追求美好生活的意愿和信心,激发自身实现美好生活的创造力和感知力,美好生活的生成才会具备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强大的精神支撑,从而勾画出美好生活的灿烂图景。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好生活就是不断满足人们的自由全面发展需要的动态过程。

3. 美好生活是建构人的共同体的生活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的旨归,而人的共同体则是保障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形式。在马克思看来,实现人自身的解放只有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被消除、旧式分工被消灭的基础之上,届时人与人才能在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的前提下相结合,形成“自由人联合体”即人的共同体。而人只有生活在共同体中,才能实现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3]199},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最高追求才会实现,人才能逐步走向自由自觉的美好生活,最后通达人的解放的终极状态。

共同体是人的共同体,人是以共同体的方式存在的人,也就是说,人之于共同体的关系不是一种依附关系,人并非共同体的附属品,而是能够在共同体中完全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意愿,自由自觉地支配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实现由人的依赖关系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再到人的自由个性发展阶段的历史跃迁。以宏大的历史视野来审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意蕴,有助于从根本上引导共同体的全体成员觅寻平等、开放、包容的互动关系。良好互

动关系的形成,会使得共同体中的人通过信息的交换、情感的分享,增强其对共同体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形成一种和谐美好的共同体人际氛围。当然,这种氛围也会进一步激励共同体中的人敢于打破共同体人际互动关系的边界,尝试去积极建立新的共同体人际互动关系,从而形成美好的共同体人际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和谐美好的共同体人际关系的形成,标志着人与自然、人与物的最优整合、人与人的最佳融合,以及人自身的生理与心理的和谐,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真善美统一的最高境界与逻辑归宿^[10]。在共同体中人与人通过搭建平等对话机制,普遍表达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理解,诱发人们思考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社会公共问题,促使人们积极投身于公共精神的构建活动,使得共同体中的人体悟公共精神的潜在好处,从而帮助人们树立共同体意识。人的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又会促发人探索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人的解放之间的互动关系、寻找人的丰富的生活样态,从而进一步打破旧有思想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禁锢,形成与共同体发展相一致、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相协调的新思想和新视野,进而实现共同体成员的思想大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由于人与人之间思想的对话、智慧的碰撞、情感的交往,人的共同体才会展现出人的精神世界中美好的一面。

概而言之,美好生活是人在从事对象化实践活动中所呈现出的一种完美和谐状态。诚如马克思所说的,“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恰好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2]191}。这就意味着人的对象化实践活动及其对事物的感觉是以人的主体性的存在为价值前提的;相反,如果没有人的主体性的存在,作为主体的人就很难实现对对象化实践活动之整体性的把握和理

解,人对事物的感受也会是片面的。人只有确立自己的主体性,才能真切感受到生活实践之美好的一面,才能从情感维度和精神维度上赋予美好生活以更丰富、更深刻的内涵。当然,美好生活除是人对象化实践活动的一种感受和体验外,更是“一种超越现实的期望,一种向自主目标迈进、可欲而永远非自足的状态”^[11]。就此而言,人是基于自身的价值尺度去审视自己的生活并力求尽善尽美,从而达到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历史性目标。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来讲,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方式呈现出的人的发展的理想状态,也是人所追求的一种完美和谐的状态,本质上是人的全面解放在现实生活中的极致展现。

三、美好生活生成的三重逻辑

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不仅为我们深刻理解和把握美好生活的内涵提供了理论坐标,而且也为我们探寻美好生活的实现路径提供了根据遵循。依据该理论,我们认为,美好生活的生成蕴含着以下三重逻辑。

1. 生成性逻辑:人民的创造性劳动

马克思指出,人的价值的生成来自于以创造性劳动为基础的现实生活过程,因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2]196}。也就是说,人只有通过创造性劳动,才能获得丰富的物质生产资料,结成广泛的社会交往关系,形成多样化的语言形态,建构人之为人的精神世界,真正达成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统一,使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能得以彰显。由此可以说,创造性劳动是人的本质规定性生成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创造性劳动,人的主体性、创造性与超越性将失去对象化的实践力量,人梦寐以求的美好生活也将失去可依靠的强大支撑。需要指出的是,创造性劳动能够“给每一个人

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的全部能力即体能和智能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12]。正是如此,创造性劳动中就蕴含着美好生活的一面,生产劳动不再是人宰制人、人压迫人的手段,而是人追求自由自觉的生活的必要手段,这也就意味着人自觉自愿地选择从事创造性劳动,就是向自己所憧憬的美好生活前进了一大步,在这个意义上讲,“美好生活就是创造性劳动本身”^[13]。

当然,创造性劳动不仅可以生成人的本质规定性、引导人走向美好生活,还关涉着创造性劳动所指向的美好生活是由谁创造、怎样创造、由谁享受的问题。唯物史观认为,人民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美好生活理所当然是属于人民的,我们要依靠人民来创造美好生活,自然也由人民来共享美好生活,或是说人民是美好生活的主体力量,既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也是美好生活的享受者。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由理想到现实的历史转变与其从事的创造性劳动有着本质的关联性,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14]4}就是说,人民只有从事创造性劳动,才能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从而满足自我提升、自我发展的需要,真正使劳动成为人民生活当中的第一需要,潜移默化地促进人民精神的生产与再生产,并逐步实现人民所向往的美好生活的图景。因此,我们应充分尊重人民的劳动主体地位,通过发挥人民的创造性劳动在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创造中的作用,使人民真切体验创造性劳动给自己带来的成就感、获得感、幸福感,让人民懂得自己不仅是创造性劳动的生产者,更是创造性劳动成果的享受者和评价者,进而引领创造性劳动生成美好的社会风尚,让其成为人民走向美好生活的必然选

择。一言以蔽之,人民的创造性劳动是生成美好生活的源泉。

2. 思想性逻辑:确立绿色发展价值观

绿色发展价值观是综合发展的各种形态而凝练出的价值观,它与发展本身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其自身就蕴含着美好生活的向度。美国著名思想家德尼·古莱曾指出,“虽然在某些方面,发展本身是追求目的,但在更深层方面,发展从属于美好生活”^[15]。从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进程来看,发展是达成人类全部美好生活理想的源动力,这是因为发展内在地规定着社会向上的价值意蕴、主体德性提升的伦理旨趣,最终还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整个社会福祉的稳步增长。而绿色发展价值观作为现代发展观的核心要义,不仅是人类对发展内含的人文的、价值的、实践理性的价值内蕴的审视与高扬,又引导着人类逐步走向普遍、恒久的美好生活。换言之,美好生活是对绿色发展价值观的阐释和表达,其中处处闪烁着美好生活的要素。相应地,绿色发展价值观又会为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提供思想性指引,以保证实现美好生活图景的正确方向。也就是说,美好生活的生成只有遵循绿色发展价值观的思想逻辑,才能探索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正确路径。

事实上,以往在评判社会发展的程度时,人们总是在社会层面经济指数的增加和物质财富丰盈的维度,以人对发展成果占有的多少来衡量社会发展的程度,这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所形成的一种狭隘的发展价值观。狭隘的发展价值观是建立在人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对自然资源无止境掠夺、人与自然相对立的基础上,久而久之必然会导致一系列严峻的环境问题,造成生态失衡,由发展衍生出的环境问题日益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消极力量。本质上,这种价值观反映的是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待自然的态度,即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人们往往将自

然视为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手段,而非将自然作为实现人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规定。这就必然割裂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天然联系,背离发展内蕴的美好生活的旨趣,从而就丧失了其内在张力对美好生活生成的主体性作用。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绿色发展价值观日益成为引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理念。绿色发展价值观旨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美好的发展,它既是对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的回应,又是一种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系统思想与实践智慧相统一的价值取向。从绿色发展价值观的思想逻辑来看,它在总体上表现为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是人们在一定社会生产条件的制约和一定价值观念引导下所形成的关于人的美好生活状态的总体性特征。为使绿色发展价值观在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中发挥应有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1]51}。可见,健康的生活方式是达成人们美好生活期许的有效途径。为此,我们应从简约适度、绿色低碳两个维度来促进人民美好生活目标的实现。

具体来说,一方面,应提倡简单、环保的生活方式,减少生产、消费对生态环境的人为压力。这里所讲的“简单、环保的生活方式”不是一定要让人们降低生活水准,减少对物质生活产品的消费需要,而是倡导在节约的基础上适度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潜移默化中扭转人们过度消费的行为,形成一种厉行节俭的社会风尚,提升人们的生活幸福感、满足感,从而降低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保持社会发展、人自身的发展与生态环境发展三者间的一致性,促成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有效和解。本质上说,这是绿色发展价值观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实现,也是其引导人们实现美好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应以绿色低碳的生活

方式达成人民美好生活追求。提倡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不仅是要求抑制消费数量的无限增长、不合理增长,也包括消费中要更多地选择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消费对象和消费方式”^[16]。因此,我们应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费,确保其能满足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共存;应推进环保的消费方式,引导人们自觉自愿地减少资源浪费型的消费方式,降低其消费行为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压力,实现人们的消费行为与自然的有机融合,从而使人民拥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的美好生活。

3. 同构性逻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解决全球问题的中国智慧和方案,是致力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命运共同体,它“表征着一种彼此信任、同舟共济、共享共荣、安稳确定、富有情怀的人群交往关系和存在样态,因而是心向往之的人类存在样态”^[17]。这里所说的“人群交往关系”呈现的是共同体的关系,即个体与共同体的相互关系。这就意味着只有在共同体中,人的社会性才能自然而然地生成,人才能提升与实现自我价值,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才能达其所愿。这里所说的“心向往之”反映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把人类整体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作为检视的对象,以创造和提升人类整体的幸福为旨归,追求的是命运共同体参与者都能共享共赢发展的美好的世界愿景,这也是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最美勾画与设想。也就是说,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美好生活之间具有价值取向上的一致性。由此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美好生活之间具有理论同源、价值同向的同构性逻辑。

共同体的关系属性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生成美好生活的理论根基。共同体之所以能成为共同体,在于共同体是由人构成的并由人创造的。人是怎样的,取决于人生活的共同体

的形态。相应地,人的美好生活目标实现的程度如何,也由人生活的共同体来定义。换句话说,共同体关涉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属性。人只有在共同体中,人的类意识才会生成,人才能在物质生产活动中顾及他人,人才能成为类存在,从而实现个体与共同体的协调发展,由此人才能真正融入共同体,并在共同体中逐步达成美好生活的愿望。因此,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忽略周边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而只谋求自身的发展,相反,中国是将其他国家的发展融入自身发展的伟大历史征程中,积极用中国的发展成果惠及其他国家,以类思维提升人类的幸福感,将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整个人类的福祉相融合,以兼济天下的世界情怀促进人类美好生活的达成,从而形成共同体成员间彼此依存、命运与共的整体性关系,构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可以说,命运共同体只有面向整个人类,面向人类整体性的发展需要,人类才能整体进入到美好的生活状态,达成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同时,人类的整体性发展当然包含并有助于满足与提升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助推中国人民迈向美好生活的更深层阶段,激励其进一步探索实现美好生活的新领域、新理路。

价值共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生成美好生活的共同价值取向。价值共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各个国家或地区意识形态的冲突,打破各种制度的对立、多样性文化间的偏见而形成的命运共同体参与者普遍认同的价值观。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发表的讲话中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9]522},这高度概括了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共识,赋予其全新的时代内涵。当然,价值共识不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单个意志的体现,而是统合了命运共同体参与者共有的文化价值、文化精神及其共同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而形成的,它呈现的是共同体参与者对美好生活世界的价值理想与价值追求,以容纳文化间的差异、凝聚全人类的精神力量为旨归。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建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美好生活的世界图景就有了强大的价值依托。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人民理解和把握美好生活的世界意义的外在表征,也是中国人民对世界发展图景寄予的美好期望。因此,我们应在尊重命运共同体参与国文化价值差异性的基础上,站在人类共建共享共赢发展的历史高度,学会相互包容、合理借鉴,坚守命运共同体价值共识的世界性意蕴,由此实现不同文化、不同文明间的融合,形成你我共生的世界文明样态,凝聚世界和谐美好发展的精神力量,进而由精神力量转化为不同国家或地区共建共享共赢发展的现实物质力量。由此观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美好生活的生成之间具有内在的价值一致性。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4]这一重要论断为我们理解和把握美好生活指明了学思理路。将美好生活置于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的视域中来考察,是深入探讨美好生活意蕴的前提性根据。由此观之,美好生活是凸显人民主体性的生活、是满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需要的生活、是构建人的共同体的生活。深入理解美好生活生成的理论与实践逻辑,不仅有利于彰显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的科学性和价值性,展现其理论穿透力和历史震慑力,而且有利于人们把握美好生活的丰富内涵,明确达成美好生活的理想图景的理论坐标与实践途径。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
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7.
-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90.
-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4.
- [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30.
- [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78.
- [9]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2017.
- [10] 刘同舫. 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演进逻辑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205.
- [11] 王鑫,袁祖社. 绿色发展与美好生活——基于
优良制度的实践—价值逻辑[J]. 武汉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33.
- [1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11.
- [13] 张三元. 论美好生活的价值逻辑与实践指引
[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5):91.
- [14]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外文出
版社,2014.
- [15] 古莱. 发展伦理学[M]. 高钰,温平,李继红,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43.
- [16] 周中之. 美好生活的伦理意蕴及其实现的价值
引领[J]. 中州学刊,2018(10):92.
- [17] 毛勒堂. “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可能? ——基
于资本逻辑语境的阐释[J]. 马克思主义与现
实,2018(1):179.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



引用格式:金建萍. 人的全面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要义 [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6):10-16.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8.06.002

文章编号:1009-3729(2018)06-0010-07

人的全面发展: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要义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the core meaning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金建萍

JIN Jianping

西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马克思以“现实的人”作为前提和出发点,以社会整体为考察和研究对象,在对现实的批判中确立对人的发展问题的理论论证。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想彰显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的“人文关怀”向度,每一个个人只有通过自身实践活动才能不断生成为人。根据马克思这一思想,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从人的全面发展的向度来思考 and 解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这一主要矛盾,在继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大力提升发展质量,更好地推动社会全面进步,这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要义。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消除束缚人的发展的制度弊端,解决民生短板,坚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健全公平优质的教育体系,是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

马克思社会发展的
人的全面发展;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收稿日期]2018-06-16

[基金项目]甘肃省高等学校科研项目(2015A-012);西北师范大学研究生课程改革项目(2017-005)

[作者简介]金建萍(1973—),女,甘肃省榆中县人,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

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是马克思最为关注且始终关注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主体、发展规律和趋势,他从人的需要的发展、能力的发展、个性的发展、社会关系的发展等方面,确证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从人的全面发展的向度来思考和解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这一主要矛盾,在继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大力提升发展质量,更好地推动社会全面进步,这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要义。本文拟通过对人的发展之根本的辨析,指出人的全面发展是我国新的历史方位的话语内核,进而为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给出路径参考。

一、人的发展之根本:生成人之为人的本质

深受德国古典哲学影响的马克思,早期曾秉承费尔巴哈关于“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理想,提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1]11}。这一时期,马克思刚刚成为现代唯物主义的创始人。他将人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认为人的发展实际上是作为主体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是人的本质力量通过对象性活动在自然、社会领域的展开。在考察人的发展时,马克思并不是笼统地、抽象地讲人,他强调人不是抽象地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以现实的个人作为前提和出发点,马克思把人的发展分为类的发展与个体的发展,并把着眼点放在每一个个人的发展之上。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人是一种没有先在本质的存在,是一种自我创生自己本质的存在。换句话说,人只有通过自身的劳动,才能使自己不断地生成为人。

马克思还进一步探讨了如何使人成为人,即人成为人的主客观条件和实现途径。起初,马克思是从人的解放的视角去分析人的未来发展的前景目标,如“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1]18}，“就是说,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地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1]189}。此时,马克思将人的发展界定为“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即作为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实际上是将人的发展与人的解放相等同,强调只有通过人的完全解放才能回复人本身。之后,马克思逐步地把人拉回到现实生活当中,指出个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强调“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501},人的本质是具体的历史的,是由一切现实的关系如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等决定的。这一决定何以可能?对此,马克思“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2]。马克思认为,这一基本的原始的关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活动方式本身决定的,又决定着其余一切的社会关系状况,在此意义上,人的解放及其本质的实现,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11},亦即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关系。唯其如此,才能达到人的社会交往的普遍性和人对社会关系的控制程度的发展^[3]。

因此,人的发展有其物质基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的发展的必要前提和根本动力。“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1]544},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实际前提,作为先在前提条件体现着社会发展对人的根本制约。离开生产力发展状况和物质生产条件去谈论人的发展,必然无法揭

示人的发展的活动构成,因为“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4]147}。当人从自己的目的出发,将其本质力量对象化于自然界时,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

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在社会意义上反映了人类所特有的本质联系。马克思指出:“人们的生活自古以来就建立在生产上面,建立在这种或那种社会生产上面,这种社会生产的关系,我们恰恰就称之为经济关系。”^{[5]139}更为确切地说,是个人“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4]147}。人以社会活动方式而存在,在生产劳动中把握自然规律,探求实现人的发展的基本途径,从中形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诸种关系。“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6]只有在丰富的全面的社会关系中,人们才能消除生产和交往的自发性,把生产和交往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获得充分的、不再受外界强力控制的自主活动。人的发展没有终点,在由当下走向未来的道路上,人类将不断获得对自己本质的追求、选择、创造和实现,最终实现全面自由发展并成为社会的主人。

因此,从人本身出发考察社会发展,在理论上彰显了马克思社会发展观的人文关怀向度。社会发展所追求的目标和基本出发点,就是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并使之向更高的方向前进,“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7]。基于这一理论,社会发展本身是社会客体与主体在历史过程中所发生的合目的性变化,人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处于核心地位,主体尺度是评价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准。但这并非要取消生产力尺度存在的合理性,而是探讨如何在不阻碍社会发展和不损害人的长远发展目标的前提下,

最大可能减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和非正义性,避免人的现实生活遭遇苦难和困境。

对人的发展现实境遇的关注和考察,构成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重要主题和问题意识。人的发展问题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若不以社会整体为考察和研究对象,就不可能获得完整而科学的认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启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考察。马克思在该手稿序言中提及,“我打算用不同的、独立的小册子来相继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最后再以一本专门的著作来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关系,并对这一切材料的思辨加工进行批判”^{[1]111}。尽管马克思写这些小册子的计划没有实现,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初步实现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总体考察,它是马克思此前所进行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和历史研究的一次较为全面系统的综合性成果的反映。尽管马克思说探讨“只限于国民经济学本身专门涉及的这些题目的范围”^{[1]111},但实际上他已经立足于对异化劳动的分析,解析了资本主义现实中的个人生存境遇和发展问题。

马克思的理论研究逐步拓展到了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部历史,从“家长制的,古代的或是封建的”社会直至深入到“现代社会”^{[5]53},研究成果的结晶是他在1858年重新整理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一工作在《资本论》创作的过程中得以深化。马克思对人类学进行了研究,阅读了大量的人类学、考古学的著作并做了详细摘录和评论,完善了关于史前社会的研究,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以此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做出全面考察,明确提出,资本主义时代是一个“直接处于人类社会实行自觉改造以前的历史时期”,“实际上只是通过极大地浪费个人发展的办法来保证和实现”^[8]物即资本的增殖。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

度看,一方面,物化消除了早期人类社会对自然依赖的原始状况,使社会关系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种由市场联结在一起的物的联系使各个生产者在交换中彼此平等;另一方面,物化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为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被物的外壳掩盖着的真实关系,人对物的依赖导致人的发展的不自由、不全面。

纵观资本发展的历史,总是伴随着野蛮,总是会表现出其最丑陋的一面,往往是货币成了人们追求的唯一目标。同时,货币把所有东西都降低为某种抽象的观念,在自己的运动中把自己降低为某种量化的存在。马克思在分析了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历史暂时性之后指出,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建立现实基础,而这又是社会长期发展的自然产物。

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人与物、资本与劳动、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矛盾的基础上,明确将分工和私有制看作人的发展异化问题的根本原因。由于私有制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物的增长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呈现出对立关系,人不是被看作人,而是被贬低为一种创造财富的物。由此导致的结果必然是“物对人的统治,人仅仅成为创造物质财富的手段,使人不能真正发展;资本占有劳动,人成为资本的奴隶,使人不能平等发展;机器支配人,人成为机器的一个零件,使人不能自由发展;分工限制人,使人不能完整发展”^[9]。所以,要消除这种对立,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只有诉诸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统治以及消灭私有制基础上的分工,将人和社会从私有制及其阶级统治中解放出来,才能破解人的发展的异化问题,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因此,总的说来,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

个人生存的现实境遇。对此,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深刻指出:“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即将到来的崩溃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10]英国学者莫里斯·布洛克则对马克思的整个理论论证做了如下概括:“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挑战形成了一整套基本理论,其中包括对决定人类历史的社会基本力量的论证;对历史进程如何演化出各种制度的论证;对那些只有通过理论工作上的极大努力,通过对大量历史文献的考证才能弄清其起源的种种思想的论证。”^[11]由此可见,在对现实的批判过程中确立对问题的理论论证,是马克思研究社会 and 人的发展问题的重要的、基本的思路和方法,也是他的思想极具深远影响的重要原因。

二、人的全面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的话语内核

马克思曾经说过:“毫无疑问,在理论上把现实中随时都要遇到的矛盾撇开不管并不困难。”^{[1]616}而这些在进行理论抽象时所“撇开不管”的“矛盾”,却是人类在现实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要一步一步地经历其形成、发展和解决的全部过程,因而这必然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人类生活现实中社会发展取向的偏离,人与社会及自身的协调严重失衡,产生人类困境和生存危机,就是忽视个人之为个人的特殊性、具体性和独立性,就是离开个人的发展空谈社会,实际上就是背离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

一个理论要想指导现实社会的发展,必须在实践中具备可行的具体条件,使得理论研究具有可操作性。社会主义自诞生以来,在从理论变为实践的过程中,不断经受着历史发展、时代转换和所处国际环境赋予的各种考验和风

险,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产生了无法比拟的震撼和影响。列宁把落后国家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探索比作“攀登一座还没有勘察过的非常险峻的高山”^{[12]448},因为这是“一个全世界从未有过的事业”^{[12]175},因此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从本国具体实际出发,用科学的理论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依据不断发展变化的实际确定自己的路线、政策和策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生机勃勃地不断发展。

问题是时代的呼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断强化问题意识,积极面对和化解前进中遇到的矛盾。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我们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1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我国发展起来以后由大国走向强国的新的历史方位中,人的发展所面临的更为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特别是区域差别和城乡差别,制约着人的全面发展。这就要求我们不仅仅在价值观上唤醒对人的发展的尊重和关注,更重要的是要直面现实问题,回应人民日益多样化、差别化、全方位的需要,紧紧围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状况及其特点,以全新的理论话语做出回答和阐释。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指出:“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14]这一论述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当代中国的与时俱进,是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的深刻解答。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四位一体”的战略布局等等,其实现都离不开人的主体作用。把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已然成为解决人的发展问题的话语内核。

社会发展的旨归必然是人的生存状态的改善、生活质量的全面提升和生活方式向人的本质的逐步复归,归根到底是人与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利益协调和满足问题。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现代经济体系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标志的人的发展实践的新变化,内在地要求我们必须注意从人的发展多种形态共处的社会实践出发,科学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在现实性上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始终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包括社会治理理念和各种措施,都致力于从根本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使社会最终在共建共享中重建价值共识,走上有利于人的本质力量充分发挥及其才能全面发展的康庄大道。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的全面发展路向

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理论的现实启迪意义,就在于提出了社会发展的主体性原则和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矛盾的解决,这三者互为条件,因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民主法治的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每个人的全面发展,这都是基于现代性问题的中国表达,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前瞻性思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同时也要继续鼓励大胆试验、大胆突破,不断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15]将改革进行到底不是空喊口号,如何确保不在改革深水区栽跟头,不仅需要

一种壮士断腕的决心与勇气,还需要直面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以整体性思维谋划全局,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与时俱进地研究分析人民群众需要的时代特点和演变发展规律”^[16],创造性地探索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的重要路向。

其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在谈到人的发展时,马克思反复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归根结底是社会生产力的产物。人的发展是以人的生命存在为前提条件的,其吃喝住行等一系列基本需要,只能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才能得到满足,生产力的发展、交往的普遍性是个人全面发展的条件,也是人类实现自身全面发展的一条历史必然道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要解放人和开发人,让全体人民进一步释放劳动潜能,依靠创造性劳动实现人的个性自由和全面发展。

其二,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破除体制机制弊端。制度是一种既定的力量,规制和限定着人的发展方向和程度,是人的发展的基础框架和前提条件,能否体现、保障和促进人的发展也就成了衡量制度好坏或合理与否的重要标准。全面深化改革,解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要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应立足于激发每个人的价值创造能力,努力解决体制改革中遇到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消除束缚人的发展的制度弊端,使制度本身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焕发出更大的生机与活力,为人的自我价值实现提供自由宽松的环境、氛围与舆论上的强有力支持。

其三,解决民生短板,促进发展成果人人共享。马克思多次论述了生产资料社会占有的必然性。显然,使个人在以社会名义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能够自觉而主动地驾驭自己

的社会关系,走向对社会财富、知识、权力和资源的共享,才能拓展个体发展的空间和程度。社会发展的目标是“为了一切人和完整人的发展”^[17]。坚持共享发展理念,强调分配公正,“不是均等的分配,而是关注分配原则、分配形式的公平性,关注在社会成员或群体之间进行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配置的问题”^[18]。我们应在发展中不断消除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全体人民都能公平公正地分享与其奋斗实干相匹配的发展机遇和成果。

其四,坚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诉求,让群众得到实惠。当前的核心问题是继续健全与市场经济相关的法律法规,发挥个人在公开平等的市场竞争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调整和缩小人们之间的利益差距,优化利益分配格局,最大限度地缓解社会冲突。我们应通过精准扶贫以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进步,增强人民群众在共享发展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之,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就是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一个也不能少;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

其五,健全公平优质的教育体系。教育“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19],通过这种方法,使人在其中能体验到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体验到自己是人。从教育角度来说,“发展最终所要求的是在人的方面的改变,这种改变是获得更大发展的先决条件和方式,同时也是发展过程自身的伟大目标之一”^[20],教育上去了,现代化的人才涌现出来了,才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因此,提高

教育质量,努力让全体人民享有更全面更优质的教育,通过教育使每个人更富创造性,是打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基础。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列宁.列宁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07.
- [3] 李秀潭.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再认识[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220.
-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95.
-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30.
-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03.
- [9] 韩庆祥.马克思开辟的人学道路[J].江海学刊,2005(5):30.
- [10] 列宁.论马克思主义[M]//列宁专题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55.
- [11] 布洛克.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M].冯利,覃光广,陈为,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3.
- [12] 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13] 本报评论员.积极面对和化解前进中遇到的矛盾——二论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N].人民日报,2015-01-28(01).
- [14]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1-12.
- [15]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80.
- [16] 石建勋.读懂主要矛盾,读懂新时代[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10-20(01).
- [17] 佩鲁.新发展观[M].张宁,丰子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17.
- [18]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65.
- [1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57.
- [20] 英克尔斯.人的现代化[M].殷陆君,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6-7.



引用格式:崔龙燕,石秀秀,黄娟.对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生态批判[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6):17-25,35.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8.06.003

文章编号:1009-3729(2018)06-0017-09

对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生态批判

The ecological criticism of consumerist lifestyle

崔龙燕,石秀秀,黄娟

CUI Longyan, SHI Xiuxiu, HUANG Juan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摘要:生活方式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既以生态环境为基础和前提,又对生态环境产生重要影响。工业文明时代,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占据主流,它主张通过无限度消费物质产品来追求高人一等的精神感受和社会评价,这实质上是一种异化消费的生活方式。福特主义的生产模式、消费主义价值观念、大众传媒和跨国公司,分别是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形成的经济基础、思想根源和重要条件。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是造成今日地球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建设生态文明是一场涉及生活方式的革命性变革,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是绿色发展的基本要求。与工业文明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决裂,构建简约适度、绿色低碳、健康文明的绿色生活方式,是迈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

生态文明;
消费主义;
绿色生活方式

[收稿日期]2018-09-2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3BKS048)

[作者简介]崔龙燕(1990—),女,山西省长治市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

[通信作者]黄娟(1963—),女,上海市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

生活方式与生态环境相互影响。生活方式是影响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是造成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构建绿色生活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指出,要培育绿色生活方式,推动全民在衣、食、住、行、游等方面加快向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方式转变,坚决抵制和反对各种形式的奢侈浪费、不合理消费^[1]。

目前,学术界关于生活方式、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绿色生活方式都有一定研究,但综合探讨这些问题的研究成果较少。鉴于此,本文拟基于生态文明视角,借鉴生态马克思主义关于消费批判的相关理论,分析和探讨生活方式与生态环境的内在关系、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实质与表现、绿色生活方式的构建与深化等问题,尤其对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生态影响进行深刻反思,以期为推动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向、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思路和方法。

一、生活方式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最为基础的条件,生活方式是人类存在和生活的方式,二者紧密相关、相互影响。生活方式的形成既依赖于生态环境,又会对生态环境产生重要影响。

1. 生态环境是生活方式的基础和前提

马克思曾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站在稳固平衡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2]。恩格斯也强调:“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和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3]人与自然是共生共荣的有机整体,自然界是人类生活之源,人靠自然界来生活,人与自然之间有着密切的生存依赖关系。人的生活方式是指人们消费物质资料的方

式,而人的生活则包括物质生活、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4]。这些论述揭示了生态环境与生活方式的内在关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类生活资料的主要源泉,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人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物质资料基础之上的,也必然以生态环境为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环境构成了人的存在和发展的自然基础。自然界的优先性和生态环境的基础性,决定了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生态环境。

2. 生活方式是影响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

生活方式是人们在长期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稳定的生活模式和态度。“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5]人们的生活方式虽然以生态环境为基础,但并非消极被动地接受自然的塑造和影响,而是对生态环境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具体表现在生活方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中。

(1) 不同时代的生活方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生活方式是一个历史范畴,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生活方式总是随着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的不断变化,呈现出动态发展的趋势。迄今为止,人类先后经历了采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三个时代,正在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不同时代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不同。与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是奴隶社会落后的生活方式;与自然经济相联系的,是封建社会的生活方式;工业文明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使人们的生活由温饱型进入到富足型^[6]。原始落后的生活方式敬畏自然、依赖自然、保护自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微乎其微;农业文明的生活方式建立在对土地充分利用和拓荒垦种的基础上,对生态系统造成一定

程度的破坏;工业文明时期,高消耗、高污染、高浪费、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占据了主流,给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灾难,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

(2) 不同性质的生活方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人是兼具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存在物。对此,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生活方式是人的社会化的重要内容。由于经济水平、文化层次、生活观念、人生追求、地域差异等因素的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千差万别,不仅呈现出不同的性质和样态,而且会产生不同的生态效应。从东西方的对比来看,普遍流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对生态环境具有极大的破坏性。这种生活方式虽然已渗透到我国,但尚未占据主流,我国崇尚简约消费的生活方式,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相对较少。从城乡对比来看,高消耗、高浪费的生活方式在城市较为普遍,农村相对保持着节俭、节约的风格,形成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这正是城乡生态环境差距较大的一个原因所在。从贫富对比来看,富人阶层的奢侈浪费的生活方式,加大了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污染;穷人阶层的勤俭惜物的生活方式,易于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此外,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和高碳污染的生活方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不同。

二、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形成与实质

消费主义既是一种经济发展方式,又是一种价值观念,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是物质主义和经济主义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表现。西方学者让·鲍德里亚将消费主义定义为一种生活方式,即其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实际需要,而是为了满足不断被刺激起来的欲望;人们所消

费的主要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8]。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形成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福特主义的生产模式、消费主义价值观念、大众传媒和跨国公司,分别是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形成的经济基础、思想根源和重要条件,其实质是在异化消费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生活方式。

1. 经济基础:福特主义的生产模式

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并非凭空产生,福特主义、后福特主义的生产模式所造就的大众消费,是消费主义形成的经济基础^[9]。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与消费矛盾不断加深的结果。从生产的角度来看,最大限度的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而剩余价值的最终实现依靠市场。从消费的角度来看,生产出来的产品只有被人购买、消费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薪资微薄、购买力不足、消费水平低下,这种状况的消费影响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平衡,进而危及到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鉴于此,费雷德罗克·温斯洛·泰勒提出科学管理理论,强调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把“蛋糕”做大的同时,增加工人的工资以提高工人的购买力。随后,美国汽车大王福特吸取了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精髓,以技术革新为手段,创造了福特主义的生产模式。这种生产模式不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加了工人工资,而且使工人有更多闲暇时间进行消费,且消费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只要工人能够在生产中经受住福特主义流水线的苛刻、呆板和快节奏,就有机会购买私房、汽车,就有能力去旅游、度假等^[9]。福特主义生产模式直接导致并造就了大众消费时代,催生了消费主义,而消费主义的盛行,又逐渐演变为西方发达国家流行的生活方式。

2. 思想基础:消费主义价值观念

二战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欧美国家

经济的繁荣,消费主义价值观念在西方发达国家逐渐唱主角。消费主义价值观念是指人们把消费主义作为价值取向,肆无忌惮、毫无顾忌地消耗物质财富和自然资源,并把人生幸福与生活消费直接挂钩的价值观念。消费主义价值观念是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形成的思想基础。一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指出,消费主义价值观念的基本特点是鼓励所有人把消费活动置于他们日常关注的中心位置,同时在每一个已获得的消费水平上加强不满足的体验^[10]。也就是说,消费主义价值观念的核心理念是消费至上,现实中生产体系的扩张、商品种类的丰富、商品数量的增长,都是为了满足人们不断产生的消费欲望。在消费主义价值观念诱导下,人们为消费而消费,完全扭曲了消费的本质和意义,将“消费就是一切,一切为了消费”等信条视为人生的根本意义和终极目的,由此陷入疯狂的物质追求中。消费主义价值观念不仅严重误导人的价值取向,导致人生观、价值观上的享乐主义,而且逐渐影响人们的生活态度,进而演化为消费主义生活方式。

3. 重要条件:大众传媒和跨国公司

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兴起于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思想文化途径和经济途径业已向发展中国家扩散,进而影响发展中国家人们的生活方式。大众传播和跨国公司是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扩散的重要渠道。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指出,生产和消费的辩证法决定了资产阶级必然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宣扬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从而导致人们消费伦理的转换和消费主义价值观的盛行^[11]。一方面,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占主导地位,为了维持其绝对优势,他们借助电影、报纸、广告等传播媒介恣意张扬、推波助澜,由此加速了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向其他国家的传播;另一方面,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技术、人才、资金优势,以跨

国公司为载体,在全球推行消费拉动生产的策略,利用多种渠道极力宣扬消费主义生活方式,赋予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以普世性,将其嫁接、融合进其他国家的文化之中。文化是影响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随着消费主义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也在国际化。

4. 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实质

从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形成过程来看,消费主义与资本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消费方式进行批判,明确提出“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的命题和观点,指出消费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异化消费。所谓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了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12]。换句话说,消费主义不是为了满足“够了就行”的真实需要,而是为了满足“越多越好,多多益善”的虚假需要。这样,人们在消费过程中,就会完全扭曲消费的本质,就会把幸福和人生追求等同于对物质商品的占有和消费,并以此作为实现自我价值的唯一途径。这样一来,人的消费活动就成了与人的需要目标本身无内在联系的一种程式化活动。因此,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实质上是一种异化的、具有破坏性且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三、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是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

综上所述,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是一种以购物和消费为主要内容,以过度消费、奢侈消费、炫耀消费为具体表现,具有占有性、破坏性的生活方式。科布认为,社会的整个推动力是经济进步,但这种单一唯度的进步意味着生态灾难^[13]。加里·加德纳也认为,我们今天看到的大多数环境问题都能跟消费扯上关系^[14]。这些论断表明: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既是工业文明

生活方式的主要表现,也是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

1. 奢侈消费及其生态影响

工业文明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变革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促使奢侈消费不断滋长。随着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和产品知识的不断丰富,人们越来越不再只满足于消费普通商品,而是开始逐渐将消费目标转向奢侈品^[15]。奢侈消费是将奢侈品视为高端生活的标志、衡量成功的标准、彰显地位的尺度,通过消费奢侈品、享受高档服务等,来满足自身需求和欲望的消费行为。大量购买名牌产品、出入各种高档场所、享受各种高消费服务等,都是奢侈消费的表现形式。如今,奢侈消费在我国已出现大众化的趋势。麦肯锡2017年中国奢侈品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有760万户家庭购买了奢侈品,超过马来西亚或荷兰的家庭总数,是法国或意大利家庭总数的2倍,中国消费者的奢侈品年支出超过5000亿元人民币。麦肯锡2018年中国奢侈品报告显示,中国消费者依旧是全球奢侈品行业的最大客户来源之一,2017年贡献了全球市场近32%的销售额^[16]。这些数据表明,中国人在全球奢侈品消费中贡献卓著,奢侈消费在我国已日渐成风。然而,当人们执着于奢侈消费的同时,却忽视了这一行为将会产生的生态影响。奢侈品是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非生活必需品,对奢侈品的狂热追求和过度消费,会造成自然资源的额外浪费;奢侈品的生产材料、精美包装、运输运送,将消耗大量资源、能源和材料,会导致自然资源、能源的巨大消耗;奢侈品使用会产生大量废弃物,最终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因此可以说,奢侈消费是造成生态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2. 过度消费及其生态影响

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物的丰富使消费的多样性由可能变为现实,当人们去追逐无限

扩张的更多消费时,就形成了过度消费。过度消费是指将大规模的消费和高水平的生活视作社会发展的基本手段和个人生活的本质追求的消费行为^[17]。毫无节制的购物、肆无忌惮的消费、毫不吝舍的浪费等,都是过度消费的具体表现。当前,我国过度消费现象较为严重。以网购为例,随着淘宝、天猫、京东等网络购物平台日渐崛起,“双十一”“双十二”迎来盛大的“消费盛宴”,人们陷入疯狂购物的浪潮中。国家邮政局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双十一”期间(11~16日),全国邮政处理的邮件、快件达15亿件,比去年同比增长35%。^[18]然而在人们沉浸于购物的狂欢之时,却没有意识到一场生态灾难正在降临。正如巴巴拉·沃德所指出的,对消费品的喜新厌旧成风,无限制的使用能量,我们的前途只能是生态系统的灾难^[19]。因为疯狂的网络购物,也在疯狂地制造着垃圾。据统计,我国每年因快递包装过度浪费的瓦楞纸板约18.2万吨,相当于年均砍掉1547公顷的森林;每年约有260多万吨塑料倾倒入海洋;我国垃圾堆存侵占土地累计80万亩。^[18]这些数据既反映出人们过度消费的疯狂之态,也揭示了过度消费的生态影响。过度消费消耗的主要是自然资源,并通过物质循环过程以废物的形式返回自然界和我们生存的环境之中。这势必导致“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恶性循环,造成自然资源的巨大消耗、严重浪费,而大量废弃物所造成的垃圾过剩,将远远超出地球生态圈所能承受的限度,甚至超过生态系统的自修复能力,导致严重的生态失衡和破坏。这种生活方式一旦延续下去,势必会加剧生态危机,甚至会毁掉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最终必将导致人类走向毁灭。

3. 炫耀消费及其生态影响

工业文明时期,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琳琅满目的消费品,促使炫耀性消费呈现出不断增长

和蔓延的趋势。炫耀消费是指个体通过公开地消费财富,向他人传递地位信息、强化自身形象的特定消费行为^[20]。过分喜爱奢侈品,过度追求高档次、高品位的商业服务,举办豪华生日宴、婚礼,以及为了摆阔一掷千金、大肆挥霍等,都是炫耀消费的具体表现。这种消费行为不仅会严重影响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也会对生态环境产生严重污染和破坏。由于炫耀消费中消费者追求的是产生或服务能提供的一种象征性感受价值,包括身份或阶层的象征、时尚与先锋、好玩与趣味性等,并非真正占有商品的使用价值,所以,炫耀消费是一种基于面子心理、攀比心理、虚荣心理的额外消费和非理性消费,它消耗了原本可以节省的资源、能源和财物,以至于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炫耀消费不断蔓延,必将加重资源、能源的巨大消耗,造成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和迅速枯竭,加剧人类物质消费的无限性与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引发严重的资源危机和生态危机,对人类社会永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四、绿色生活方式的内涵

既然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是造成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那么构建绿色生活方式势必成为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之一。而绿色生活方式应该是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1. 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

简约即节俭、节约、简省之意;适度即适合要求的程度,适当之意;简约适度的绿色生活方式,即指以勤俭节约为原则,追求简约生活、适度消费的生活方式。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 简约生活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追求简约生活是绿色生活方式的题中应有之义。近年来,在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盛行的同时,世界范围

内也掀起了简约生活的浪潮。面对环境污染、资源匮乏等生态问题的共同威胁,如何实现从自然的征服者向生命共同体的平等公民的转变,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21]。目前,已有数百万的美国人在抵抗消费主义的喧嚣,持续了近20年的“国际罢买日”运动已在全世界多个国家得到积极响应;各式各样的环保运动和绿色运动包括素食主义、慢食运动、放慢生活节奏运动如雨后春笋;英国大学的物物交换商店、创造性节约等运动都是对消费主义的宣战。此外,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小约翰·科布身体力行践行素食主义;知名民间环保事业倡导者廖晓义倡导“乐活生活”。这些都为我们构建简约生活提供了借鉴。我们应以节约资源为目标,在衣、食、住、行、游等方面厉行节约,通过节水、节能、节电、节物等行动,促进自然资源节约,追求简约生活。

(2) 适度消费

印度国父圣雄甘地曾警示人们:地球可以满足人类的需要,但无法满足人类的贪婪。联合国提出的《21世纪议程》也指出,地球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不适当的消费和生产模式,导致环境恶化、贫困加剧和各国发展失衡。若想达到适当的发展,需要改变消费方式,以最高限度利用资源和最低限度产生废弃物^[22]。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做到适度消费,要根据经济能力和合理需要理性购物、理性消费、适当消费。少买不必要的衣服,加强旧衣利用;适量选购食物,杜绝餐桌浪费;理性选购住房,避免严重的资源浪费。总之,从抑止过度消费入手来减轻生态环境所承受的压力。

2. 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之“绿色”为环保、健康、纯天然之意,“低碳”指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是指通过减少碳的排放量,减轻大气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的生活方式。绿色低

碳生活方式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 绿色出行

人的生活离不开出行,如果为了减少碳的排放量而停止借机动设备或工具出行活动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我们可以尽量选择绿色出行方式。绿色出行方式是对环境影响最小的出行方式,它既节约能源、减少污染,又益于健康、保护环境。在这方面,欧美一些国家可谓采用绿色出行方式的典范。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77%的民众在繁忙时间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丹麦500多万人口拥有400多万辆自行车,几乎人手一辆;在以“自行车城”著称的哥本哈根市,超过1/3的市民每天骑自行车上班或上学。^[23]在德国、芬兰、法国、荷兰、瑞士等国,浪漫的自行车旅行和悠闲的徒步旅行成为两种极受欢迎的旅游方式。我们应借鉴国外的这些做法,在出行时尽可能选择步行或骑自行车,多选用公共汽车、地铁或共享性的交通工具。这样既能减少资源能源消耗,也可以实现零排放、零污染,或少排放、少污染,从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2) 绿色居住

绿色居住不是以大、奢华、高碳为美,而是以绿色、简约、环保为美。首先,应合理购买住房,要根据经济收入、购买能力、人口数量,选择面积适宜的住房,避免资源过度浪费和产生环境污染,增强二氧化碳减排和节能降耗效果。其次,应简约简单装修。生态文明时代家庭装修的主导风格理应是简约装修。简约是家装节能中最为合理的装修风格,通透的设计有利于通风和空气流通,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资源、能源、建材的浪费,应该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再次,我们应注重节能减排降耗,要选择节能砖建造住宅,以自然原色为住房主色,减少装修木材、铝材使用量,采用节能的家庭照明方式,选择节能冰箱,适时将电视机、微波炉、空调、电脑

等电器断电,以此减少能源的消耗和二氧化碳的排放,节约资源、能源,保护生态环境。

3. 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健康不仅指生理健康、身体没有病,还指有良好的心理状态和社会适应能力,即心理健康、行为健康。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既有益于人的身心健康,也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 绿色饮食

民以食为天。在生态文明新时代,人们的饮食应当是绿色饮食。绿色饮食主张在消费食品的过程中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以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我们应尽可能选择购买本地生产的食品,少购买从国外进口或跨地区空运的食品,以减少食品运输过程中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应选择当季水果和蔬菜,少购买反季节水果和蔬菜,因为反季节水果和蔬菜一般是在温室中种植的,温室种植往往需要消耗更多能源;应选择简单包装的食物,因为包装材料大多由纸、塑料、铝制品等制成,在生产过程中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选择简单包装的食物,拒绝使用复杂包装的食物,可以直接降低碳排放量。

(2) 全面生活

人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具有多种需要。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24]这就是说,新时代人的生活需要变得越来越丰富、全面。然而,消费主义生活方式、过度的物质追求,却把人们带入一个无意义、无方向感的空无世界。马克思曾指出,“一个人,他的生活包括了一个广阔范围的多样性活动和对世界的实际关系,因此过着一个个多方面的生活”^[25]。换句话说,人过着一种全面的生活。只有追求全面生活,人们的消费才会由单一的物质消费转向丰富的多样消费,

由物质追求转向高层次的精神追求,这样既能减少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对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效应,又能丰富人的生活,使人们获得更多幸福感。

五、绿色生活方式的构建

绿色生活方式是一种与生态文明目标相一致的生活方式,它既不会自发形成,也不能一蹴而就,需要人们运用生活理性对生活方式进行自觉选择,通过采取一定措施加以构建。

1. 树立简约消费观

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所持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生活观,往往会对人们生活方式的选择产生重要影响。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消费主义价值观的诱导,并通过消费购物、物质享乐表现出来。然而,如果物质财富成为人类崇拜的上帝,意识形态成为人类的禁锢,科学技术成为束缚自身的枷锁^[26],那么人类不可避免地将在对象化活动中陷入被异化、物化的悲惨命运。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不仅不会给人们带来幸福和自由,相反,它必然会进一步强化过度生产和异化消费,从而造成对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破坏,并加深业已存在的生态危机。因此,在消费观上,我们应实现由“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转变,树立简约消费观。简约消费观是指:通过消耗尽可能少的自然资源来满足人们合理的生活需要,优化生活质量,同时防止生活废弃物导入自然系统^[27];崇尚低碳绿色,以自然为友,简约适度是其核心理念。构建绿色生活方式,应自觉摒弃消费主义价值观念,以简约消费观、科学的生活理念引导人们积极追求简约生活、绿色生活;应使人们意识到物质消费并不是幸福本身,它只是人的幸福体验的一个重要载体,真正的幸福应该是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合理、健康、绿色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幸福生活指数

提升为落脚点。唯有践行绿色生活方式,才能实现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幸福生活。

2. 培育绿色生活风尚

滴水难成海,独木不成林。构建绿色生活方式不是某个人的事情,而是全社会、全人类共同的愿景和行动。美国的马克·佩恩和扎莱纳所著的《小趋势——决定未来大变革的潜藏力量》一书中有一句经典之语令人深思:“在今天的大众社会,只要让百分之一的人真心作出与主流人群相反的选择,就足以形成一次能改变世界的运动。”^[28]同样,绿色生活方式能否成为生态文明新时代的主导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选择与当今占主流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相反的绿色生活方式。因此,应号召公众选择绿色生活方式,在全社会凝聚起构建绿色生活方式的磅礴之力,共同为构建绿色生活方式而努力。不仅如此,我们还应建立健全社会化参与机制,鼓励各级政府、社会组织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绿色活动,如开展植树节、爱鸟日、保护母亲河等活动,以植树节、国际湿地日等重要生态纪念日为契机,深入开展环境教育;创办各类绿色文化节和绿色产业发展论坛等活动;同时启动“绿化庭院、美化家园、绿色生活”等绿色行动,动员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绿色生活活动,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凝聚推进绿色生活的合力,唤起人们的绿色生活意识,培养和提升人们的绿色生活能力,使绿色生活成为社会良好风尚。

3. 加强绿色生活教育

构建绿色生活方式,应最大限度地消除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对人们思想产生的负面影响,深入开展绿色生活教育,不断增强人们的绿色生活意识。绿色生活教育,可以通过家庭、学校、社会和每个人的自我教育等进行。家庭是绿色文化教育的启蒙之地,是培育绿色生活意识的出发点。父母应加强对子女绿色生活理

念的培育,使子女形成尊重自然、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的心理态度,自觉养成良好的绿色生活习惯。学校是绿色生活教育的主阵地,应将绿色生活理念、绿色生活方式等内容融入日常学习课程,“以文化人”,为使学生养成绿色生活与消费习惯打下良好的理论和知识基础。社会是人们生活的重要空间,对绿色生活方式的构建至关重要。应加强社区的绿色生活理念的培育功能,加强社会组织的绿色生活的传播功能,加强社会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促进国民绿色生活方式的形成。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应自觉修炼生态智慧,做到以自然为友、绿色化生活、生态化生存,将绿色生活方式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推进绿色生活方式的自我养成。

六、结语

综上所述,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受到生活方式的重要影响,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是一种异化的、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是造成人类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在今天这个生态文明新时代,为应对生态危机,必须与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彻底决裂,构建绿色生活方式。绿色生活方式不仅是表层生活的绿色化,本质上是我们生活主体的心灵绿化,是对物欲的自我限制和高尚生活的自觉追求。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只能把人类引向自我毁灭的深渊,唯有绿色生活方式才能把人类社会引向可持续发展之路。绿色生活方式的构建与形成,必将引领人们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推动人类的美好生活梦想早日实现。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5-04-25(01).
- [2]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05.
-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
- [4] 黄承梁.生态文明型生活方式才最时尚[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02-22(05).
-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5.
- [6] 方世南.生态文明与现代生活方式的科学建构[J].学术研究,2003(7):50.
-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
- [8]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227.
- [9] 高文武,关胜侠.消费主义与消费生态化[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21.
- [10] WILLIAM. The limits to satisfaction[M]. McGill-University Press,1988:100.
- [11] 王雨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07.
- [12] 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慎之,梁树发,黄继锋,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493.
- [13] 科布,杨志华,王治河.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生态文明观——小约翰·B.科布访谈录[J].求是学刊,2016(1):13.
- [14] 默里,谷义仁.绿色中国[M].姜仁凤,译.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88.
- [15] 王婉,王鹏宇.知识经济下的新奢侈品及新奢侈消费:概念与内涵界定[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5):24.
- [16] 2017中国奢侈品报告发布:爱时尚、钟情设计师品牌 23-34岁成消费主力[EB/OL].(2018-01-17)[2018-08-14].<http://news.163.com/18/0117/20/D8CL7BGB000187-VE.html>.
- [17] 李菊霞.反思我们身边的过度消费——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视角[J].理论视野,2012(1):33.



引用格式:崔玉娟. 格伦德曼对“支配自然”观念的阐释及其理论价值[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9(6): 26-35.

中图分类号: B0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8.06.004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8)06-0026-10

格伦德曼对“支配自然”观念的 阐释及其理论价值

Grundmann's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the domination of nature and its theoretical value

崔玉娟

CUI Yujuan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

摘要:格伦德曼反对西方绿色思潮对“支配自然”观念的批判,洞察到近代理性主义哲学二元对立的理论缺陷是“支配自然”观念遭受批判的根源所在,在恢复近代理性的形而上学内涵的基础上,将支配自然解读为以理性为指导、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前提、以人的利益为参照的利用自然。这就驳斥了那种将“支配自然”观念视为生态危机根源的错误观点,论证了“支配自然”观念作为解决生态问题的出发点的合理性。由此出发,格伦德曼通过将支配自然与共产主义联系起来的方式对马克思的“支配自然”观念进行了有力辩护,认为马克思把支配自然视为人类力量完全释放的前提和基础,把共产主义视为人对自然的合理支配达到顶峰的社会。格伦德曼对于“支配自然”观念的这一独特阐释,为现代社会发展生产力奠定了哲学基础,开启了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价值立场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新时代,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

关键词:

格伦德曼;
支配自然;
人类中心主义;
马克思主义

[收稿日期] 2018-07-28

[作者简介] 崔玉娟(1982—),女,河南省开封市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人在自然中的特殊地位以其对自然的支配为特征,不论是在人对人的依赖性阶段、人对物的依赖性阶段,还是在人的自由发展阶段,支配自然都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前提。然而近年来,西方绿色思潮却将“支配自然”观念视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并对其进行了尖锐批判。德国左翼学者、哲学家、生态社会主义第三代代表人物格伦德曼洞察到近代“支配自然”观念遭受批判的根源之所在,通过对近代理性的批判和对“支配自然”观念的阐释,将“支配自然”与人类对待自然的特定方式区别开来,驳斥了那种将“支配自然”观念视为生态危机根源的错误观点,论证了将“支配自然”观念作为解决生态问题的出发点的理论合理性。格伦德曼对于“支配自然”观念的这一独特阐释,对于今天我们正确认识生态问题的根源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拟基于对近代“支配自然”观念所遭遇的批判的考察,以及格伦德曼对“支配自然”观念的阐释和对马克思“支配自然”观念的辩护,揭示格伦德曼“支配自然”观念的理论价值,以期为解决当代生态问题提供参考。

一、近代“支配自然”观念的形成及其所受到的批判

当代生态危机的出现使“支配自然”观念成为绿色理论的批判焦点,但“支配自然”观念真的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吗?考察近代“支配自然”观念的形成及其所受到的批判,是把握“支配自然”观念与生态危机的关系、理解格伦德曼对“支配自然”观念进行当代阐释的理论前提。

“支配自然”观念并非产生于近代,而是“隐含于人类文明所固有的‘解放旨趣’之中”,是“一种与‘文明’相伴而生的始源性的‘冲动’”^[1]。“支配自然”观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内涵。近代“支配自然”观念是在

继承古代和中世纪的带有神性色彩的“支配自然”观念,以及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理性主导下的“支配自然”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在古代和中世纪,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为低下,人类认识能力有限,人们相信自然是有“精神属性”的,因此,对自然的态度主要表现为畏惧,对自然的支配也带有鲜明的巫术和神祇的烙印。虽然基督教实现了对自然神灵的罢黜,导致自然的去神圣化,为人类肆意地支配自然消除了一些心理障碍^[2],但它强调人对自然的支配权并不是产生于人类自身,而是上帝所赋予的。因此,此时的“支配自然”观念依然带有浓厚的神学色彩。文艺复兴强调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自我价值的肯定,是人类运用理性来支配自然的开端,它开启了自然的祛魅化历程。弗朗西斯·培根等人更是确立了以理性为手段来支配自然的观念。启蒙运动时期“支配自然”的观念与精密科学和技术相结合而形成了稳定且权威的意义,即通过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来支配自然以满足人的利益和需要。但这种理性主义的“支配自然”观念在被欧洲文明所普遍接纳以后,却因为与资本主义工业的深度结合而发生了异化,变成了凸显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的具有实证主义、功利主义倾向的“支配自然”观念。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生态问题的全球性爆发,使关于生态危机的研究成为各种理论探索的焦点,“支配自然”观念由此便作为生态危机的根源而受到激烈批判。具体来说,对“支配自然”观念的批判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支配自然”观念的认识论批判。“深绿”思潮的思想家们认为,人类只是作为生态系统中的普通成员而与自然构成相互依存的有机统一体,并不具有高于其他生物物种的地位。但是,近代“支配自然”观念在使人类摆脱

了对于自然的畏惧之后,却又将其推向了奴役自然的另一极端。在这种观念的主导下,人的主体性意识膨胀,把自身视为“万物的尺度”,为了所谓的“自我实现”而不断地进行各种征服与掠夺自然的活动。与此同时,自然却被简化为人类改造和利用的客体。“深绿”思潮的思想家们认为,自然在本质上是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的统一体。但是,现代“支配自然”观念强调人的主体性,以满足人的利益和需要为唯一的参照点,这就导致自然失去了其内在价值,成了仅作为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他物和纯粹的物质存在,成为人类用以满足自身各种需要和非理性欲望的客体,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由此被简化成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这种“支配自然”观念应用到具体的社会层面,必然表现为人类为了谋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或满足其异化消费的需要而变本加厉地强化对自然的掠夺。由于人们坚持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认识论立场,无视自然的极限,看不到自然生态系统是人类不可或缺的家園,更不可能产生保护生态系统的意识,这就使生态危机的产生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因此在“深绿”思潮的思想家们看来,“支配自然”观念是生态危机的深刻根源。

其二,对“支配自然”观念的理性基础的批判。首先,马克斯·霍克海默从理性主观化的角度对“支配自然”观念进行了批判。霍克海默在将理性区分为客观理性与主观理性的基础上,指出主观理性致力于“世界的非神秘化”,忽视自然的内在本質,将其视为纯粹的“质料”或“抽象的物质”,试图把主观的原则还原为客观的规律,为服务于人的目标而盲目地追求对自然的支配^[3]。这种理性的自然观本质上已经蜕化成了工具理性,在这种工具理性的主导下,自然必然成为人类任意宰割的被动客体,生态危机的产生也就无法避免。其次,路易·皮埃

尔·马尔库塞从技术理性的角度批判了“支配自然”观念。他认为,技术理性“把科学与哲学、科学与伦理分离开来,导致了一种对自然的定量化研究和工具主义、操作主义的思维方式”^[4],这种技术理性作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通过将人的需要简化为物质需要的方式,使人沦落为到物质消费中去寻求幸福的“单向度的人”。这就导致人类不断通过技术增强对自然的征服和奴役,而技术的滥用必然进一步导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其三,对“支配自然”观念的意识形态批判。威廉·莱斯认为,技术理性主导下的支配自然隐含着对人的支配。因为支配的基本特征是“为承认主人的权威而斗争”,而只有服从意识才能成为支配的相关物,因此,支配的对象也只能是人而不是自然。^{[5]109}他还指出,迄今为止一切社会阶段的支配自然都“意味着由个人或者社会集团完全支配某一特殊范围的现有资源,并且部分或全部排除其他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利益(和必要的生存)”^{[5]122}。但近代意义上的“支配自然”观念将作为支配自然的主体的人抽象化,模糊了不同的人类个体的支配意志之间的差异和冲突,掩盖了人对自然的支配主要是通过通过对自然资源的占有而实现的对人的支配这一本质,使人热衷于追求借助技术而实现自身需要的满足,而忽略了技术理性作为某个特殊集团的工具对于人类的支配作用。威廉·莱斯由此认为,技术理性主导下的“支配自然”观念还具有意识形态的特质。

其四,对马克思的“支配自然”观念的批判。不仅近代以来的“支配自然”观念本身受到严厉的批判,作为“支配自然”观念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马克思的“支配自然”观念也受到来自各种理论流派的学者们的批判。他们大多将马克思看作近代主体形而上学的追随者,批判马克思基于二元对立的思维逻辑而将自然视

为被动客体的做法。让·鲍德里亚在《生产之镜》中就认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基础是征服自然的物质生产”^[6],这表明马克思没有对物质生产概念进行批判性反思,更没有彻底超越资本主义所遵循的支配自然的逻辑。因此,马克思的“支配自然”观念仍然是一种隶属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奴役性概念。本顿认为,马克思以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必须建立在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基础上为由,主张发展生产力,支配自然,但其“支配自然”观念并未超越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而是仍将自然视为人类改造的对象和被动客体,因此,马克思的“支配自然”观念不但无益于生态危机的解决,反而会造成生态危机的恶化^[7]。

二、格伦德曼对“支配自然”观念的阐释

格伦德曼认识到,支配自然作为人类理性的基本特质和人类文明的基本诉求,不应受到道德上的谴责,这是他对“支配自然”观念进行积极阐释的根本原因所在。鉴于西方学者将“支配自然”观念作为生态问题的根源,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类中心主义遭到普遍质疑的后果,格伦德曼通过对“支配自然”观念的反思,指出“深绿”思潮所代表的所谓环保主义者对“支配自然”观念的批判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认为“支配自然”观念本身并不是生态问题的根源,人类对待自然的特定方式即人类在工具理性和经济理性主导下所采取的支配自然的行为才会造成生态问题。以此为理论基点,格伦德曼在批判近代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对“支配自然”观念作了阐释,深刻地将其解读为理性地控制自然,从而割裂了“支配自然”观念与生态危机的必

然关联,维护了人类的“支配自然”观念及其行为的合理性。基于这一立场,格伦德曼对理性的异化进行了批判。

一方面,格伦德曼批判了近代理性蜕化为工具理性。格伦德曼认为,理性的确立导致人对自然的態度由之前的畏惧自然转变为支配自然,但这种自然观的转变并未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逻辑,人与自然仍然机械地对立着。不同的是,人作为主人凌驾于自然之上,成了这一关系中的主体,而自然则作为人类改造的对象孤立于人类之外,成了人类征服和支配的对象。在这种自然观的主导下,人们把内涵丰富、深刻的理性简化为赤裸裸的、实用主义的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把知识和思想还原为技术和手段,把自然当作被动的客体,试图通过技术手段来实现对自然的征服和主宰。格伦德曼由此认为,在工具理性的主导下,自然只是作为满足人类各种非理性需要与欲望的资源库而存在,人类对自然的支配以自然的工具性价值为目标,他们忽视了自然内含的科学、美学、娱乐、道德、环境等人文价值,也无法意识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这才是造成当代生态问题的症结所在。

另一方面,格伦德曼批判现代理性异化为短期的经济理性。格伦德曼认为,近代理性虽然促使人类摆脱了对于自然的依附而确立了自身的主体性,但与此同时,理性在资本的挟制下,排除了理性的形而上学内涵,将短期的经济理性视为理性本身,致力于追求“专横的利益直接性”^{*}。格伦德曼指出,这种短期的经济理性执着于对抽象的交换价值的追求,并将其还原为经济价值,导致人们只关注自身行为的直

* 所谓“专横的利益直接性”,是社会学家默顿所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指的是行为人对预期的直接后果的首要关注,排除对该行为的深层次或其他间接后果的关注。这种行为的合理性表现在它可能使特定目标得以实现,但它阻碍了其他价值的实现。

接经济价值,专横地将首要利益与直接的经济利益相等同,从而将其他利益尤其是生态利益视为长期利益并对其采取抑制的策略。格伦德曼强调,正是在这种短期的经济理性的主导下,自然作为人类的资源库而遭受日益严重的掠夺,而人则被异化为“理性经济人”,他们盲目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实现,最终酿成了生态领域中“公地悲剧”。这一切,都是资本惹的祸!

格伦德曼在对理性主义观念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将支配自然与肆无忌惮地征服自然、操控自然区别开来,支配自然由此就成为以理性为指导、以人的利益为参照、在掌握自然规律基础上的对自然的利用和开发。具体来说,格伦德曼对“支配自然”观念的阐释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的。

首先,人对自然的支配是以理性为主导的支配。格伦德曼认为,“支配自然”观念被误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主要是由于理性与资本逻辑相结合使得理性丧失其价值维度而异化成了工具理性与经济理性,但并不能由此而否定理性本身,更不能拒斥理性在“支配自然”观念中的核心作用。格伦德曼由此论证了理性的当代性,并提出对自然的支配只能是以理性为主导的支配。格伦德曼驳斥了霍克海默和西奥多·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对现代技术和理性的悲观态度,并指出这种态度主要来源于他们自身的一个致命错误,即“将西方理性的某些结果等同于理性本身”^{[8]16}。他还表示,这种态度蕴含着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抵触,只能将人类引向一种反理性的乌托邦。但鉴于乌托邦计划只有在认可现代技术的高度复杂性的前提下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这就形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悖论,因此,对理性的拒斥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谬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格伦德曼指出,人类对自然的支配必须以理性本身为指导才能

获得成功。但这种理性绝不是短期的经济理性,而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体。在这种理性的自然观的指导下,自然的工具性价值得以扩展,它不仅包括短期的经济价值,还涵盖了美学、伦理等长期的、非经济价值,它超越了短期的经济利益,将生态利益也纳入其中。这种意义上的“支配自然”观念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维,绝不会造成生态问题。

其次,人对自然的支配是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前提的支配。格伦德曼强调支配自然并不等同于对自然的侵犯,也不意味着违反自然法则。相反,人类必须在服从自然的基础上才能支配自然。正如人类不能用绿色的小麦做面粉也不能用铁锤来演奏乐器一样,任何违反自然规律的人类行为都无法取得成功。因此,尊重自然规律是人类支配自然的行为能够达到既定目标的根本前提,人类不能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而无视自然规律、肆意支配自然。不过,承认自然具有内在的客观法则并不是完全否定人对自然的支配,人可以在认识这些规律的基础上利用它们服务于人类的目的。正如橡树不是为了提供封酒瓶之用的软木塞而生长,是人类将自己的目的施加于自然之上。但由于自然并非来自于人类也不是为了人类的目标而存在,而是独立于人类社会之外的一种事物、一种存在,所以,“人类不能去规定它,而只能去认识它、利用它”^[9];反之,人却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必须有此自知之明。因此在格伦德曼看来,人虽然可以将自己的目的施加于自然之上,但不能对自然为所欲为,其支配自然的能力并非无限。他引用弗朗西斯·培根在《新工具》中的观点表达了自己的这一态度:人是自然之仆和阐释者,人们只有通过不断观察和思考,才能更为深入地理解自然,从而更好地指导自己的行为;并且,“人类所能做的只是将自

自然界中的某些部分结合或者分解开来,剩下的工作由自然机制来完成”^{[8]62}。

最后,人对自然的支配是以人的利益为价值取向的支配。格伦德曼认为,支配是主体遵循某种目标对客体进行有意识地控制的行为,与支配主体的利益始终联系在一起。以传说中能够点物成金的迈达斯国王为例,他求神让自己触碰到的东西都变成黄金,结果他的女儿甚至他的食物和水也因此都变成了黄金。我们能够说迈达斯国王的这种行为是一种合理的支配吗?很显然,他并不能因此而支配他自己的生 活,他甚至都无法维持自身的生存。从这种意义上说,他所获得的其实是一种自我毁灭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增加了力量所有者的利益,而是损害了他的根本利益。由于“支配的结果必须要符合支配者的利益”^{[8]61},所以这种威胁到支配者根本利益的支配决不是明智的、真正的支配。同样,如果人类支配自然的行为产生较大的消极影响,并危及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触及人类自身的根本利益,那么这种支配由于完全违背了人类支配自然的初衷,因此,也不是合理的支配。

总之,格伦德曼认为,支配自然是人类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对自然进行的理性支配。因此,“支配自然的概念只能被理解为有意识地控制自然的同义词”^{[8]2}。在这种意义上,支配自然不但不是生态问题的根源,反而是解决生态问题的出发点。由此出发,格伦德曼进一步对马克思的“支配自然”概念乃至马克思的自然观进行了辩护,从而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生态思维的内在一致性。

三、格伦德曼对马克思的“支配自然”观念的辩护

格伦德曼进一步对马克思的“支配自然”

观念作了积极解读,提出马克思确实主张支配自然,但马克思的“支配自然”观念是以拓展人的能力同时又确保所有人类能力的释放只会带来有益后果为目标,超越了“不是人类支配自然,就是自然压制人类”^[10]的机械论立场。格伦德曼通过对马克思的“支配自然”观念的这种辩护并将其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生产力主义区分开来,从而维护了马克思自然哲学思想的当代性。

其一,格伦德曼毫不讳言马克思秉持“支配自然”的观念。他首先从自然的客观性入手阐发了马克思的“支配自然”观念。他指出,马克思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划分为占有自然、占有且改变自然两种不同的形式。占有自然是在自然界能够为人类提供丰富的生活资料的前提下才会出现的一种形式,但这并不是人类生活的一种正常状态,因为即便是在以狩猎和采集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原始社会,自然界也无法无止境地 为人类提供充足的生活资料。因此马克思认为,只有占有且改变自然才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主要形式。鉴于现存的自然资源不足以满足人类的各种需求,因此人类只有在某种程度上操纵和控制自然过程,才能实现基本需要的满足,从而维持自身的生存。马克思正是为了突出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能够控制自然界的某些部分而使用了“支配自然”这一术语。格伦德曼还从技术分析的维度论证了马克思主张支配自然的必然性。他提出,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生产劳动,就是把自然客体转化为可利用的生产与生活资料,而技术则是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手段,没有技术这一前提,人类将什么也不能生产,“通过工具和技术的使用而支配自然是解决人处于自然之中又对抗自然这一悖论的全新方案”,但由于“每一个技术,甚至是最柔软的技术,都构成了对自然的支配”^{[8]18},因此,支配自然是马克

思自然观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二,格伦德曼把马克思的“支配自然”观念阐释为有意识地控制自然。如前所述,所谓“有意识地控制自然”就是人类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对自然进行的理性支配。格伦德曼因此认为,马克思的“支配自然”观念蕴含三层内涵。(1)马克思所主张的支配自然是以理性为指导的控制自然。格伦德曼指出,马克思的自然观深受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影响,弗朗西斯·培根和勒内·笛卡尔等启蒙思想家的自然观则是其直接理论来源,这就决定了马克思的“支配自然”观念的理性特质。这里的“理性”是超越但包括工具理性与经济理性的价值理性,即真正理性,包含着生态关切,因此,他所主张的支配自然,既不是以直接的经济利益为目标,也不是以满足人的虚假需要为宗旨,而是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前提,以人的自我实现为旨归。(2)马克思所主张的支配自然是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前提的利用自然。格伦德曼指出,马克思的支配自然思想受到弗朗西斯·培根的影响,强调在服从自然的基础上去征服自然。因此,他在强调支配自然时,绝不会采取用绿色小麦磨制面粉的行为,也不会做出以锤子击打小提琴的荒唐举动,他会在深入探究自然规律的基础上,运用这些规律以实现对自然科学而合理的支配。卡尔·施密特对马克思的这一观点进行了阐释,指出人类必须掌握他们所要改造的自然客体的具体形态和基本规律,因为所有对自然的支配以有关于自然的各种联系和过程的知识为前提,如果无视自然规律,那么人类就只能灭亡。^[11](3)马克思所主张的支配自然是以人的

利益为参照的开发自然。格伦德曼表示,人的利益是马克思所主张的支配自然的出发点和归宿。在马克思看来,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人与自然休戚相关,人类支配自然的行为所造成的任何生态破坏都会损害到人类自身的利益,因此必须坚持依赖自然与支配自然的辩证统一。格伦德曼正确地看到,马克思是出于人类的利益考虑而批判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生产虽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却损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危及人的自由发展这一根本利益,这是资本主义遭到批判的根本原因。因为支配的结果必须要符合支配者的利益,“一个没能考虑到改造自然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的社会,很难说是成功地支配自然的社会”^{[8]92}。

其三,马克思所主张的支配自然是以消除人的奴役效应*为目标的控制自然。格伦德曼通过将支配自然与共产主义联系起来的方式对马克思的“支配自然”观念进行了有力辩护。他认为,马克思把共产主义阐释为人类力量的完全释放,而支配自然则是消除人的奴役效应的前提,支配自然由此就成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基础。格伦德曼更是将共产主义阐释为人类支配自然的顶峰,并从以下几个方面对马克思作了有力辩护。(1)马克思把共产主义阐释为人类力量的完全释放。格伦德曼指出马克思将真正的财富定义为人的自我实现,把共产主义看作是全面发展和完全自主的社会,是复归人的真正本质的社会。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

* 所谓奴役效应,格伦德曼认为,马克思把它理解为来自于自然或社会的力量对人施加的影响,它强调的是人由于被外在目的所操纵而束缚了他的本质力量的发展,而消除奴役效应就是要解除作为异化力量的自然和社会因素对人的支配,实现人类力量的完全释放。

于和最适合于他们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物质变换”^[12]。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强调的是真正的人类本质、真正的人类社会的实现;马克思提出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也是为了追求人类本性,其根本宗旨是人类力量的完全释放。格伦德曼还认为,尽管资本主义创造了迄今为止最为丰富的物质财富,但马克思鉴于资本主义社会对于人的奴役效应而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因为他确信“只有一个能够释放所有人类力量的社会才是真正的‘人类社会’”^{[8]234}。(2)马克思把支配自然视为人类力量完全释放的前提和基础。格伦德曼把支配自然与马克思关于必然性领域的论述联系起来。他认为,未经改造的自然只会迫使人们去工作,人类只有通过技术手段将第一自然转化为第二自然(即可支配的自然)并在理解这种转变的情况下,才能从奴役效应中解放出来,即“人们只有在人的对象化、在第二自然中才能摆脱自然的束缚获得自由”^{[8]11}。鉴于此,马克思将支配自然视为人类自我实现的基础。格伦德曼还指出,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存在于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之中,是人类生存的永恒前提,即便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人类仍然需要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变换以解决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料问题,这是一个无法消弥的必然性领域。因此,共产主义永远不会是一个纯粹的自由王国,它只有以必然性领域为基础才能繁荣发展。^[13]马克思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把支配自然视为人类力量完全释放的基础。(3)马克思把共产主义视为人对自然的合理支配达到顶峰的社会。格伦德曼指出,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解放不仅意味着物质的丰裕、工资奴隶的消除,而且还包括精神财富的丰裕和个体对自身生活条件的有意识控制”^{[8]232}。也就是说,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看作消除了资本统治以及由之而

产生的人的异化与虚假消费问题的真正的人类社会。基于人与自然相统一的关系,共产主义将消除资本对于人的奴役效应,由此,人类不再为了狭隘的经济利益而肆意掠夺自然资源或破坏生态环境。相反,出于自身的长远利益考虑,人类会在全面把握人与自然之关系的基础上,理性地控制人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从而将其维持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稳定的界限之内。因此,共产主义条件下的所有自然和社会条件的发展都是他们共同的有意识地控制的产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是人类对自然的支配不断积累的顶峰”^{[8]93}。

四、格伦德曼“支配自然”观念的理论价值

综上,格伦德曼不仅批驳了西方环保主义者曲解“支配自然”观念的理论根源,而且还对马克思的“支配自然”观念作了积极解读和有力辩护。格伦德曼对“支配自然”观念的积极阐释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价值。

其一,为现代社会发展生产力奠定了哲学基础。工业主义盛行所导致的全球范围内的生态危机,迫使人类开始反思自身行为的合理性,“支配自然”观念由此被视为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而代表人类支配自然能力的生产力也被要求对这一问题负责。西方环保主义者甚至提出生产力发展与自然的繁荣是不相容的,为了自然和人类的利益应当限制或废除工业主义观点。对此,格伦德曼提出,人类无法回到“围绕圣熊跳祭祀之舞”的时代。他深刻分析了支配自然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强调广义的人类学层面的生产力发展意味着人类对自然的支配不断增加,因此支配自然是满足人类生存的必要前提,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形式。这就从生存论的层面论证了生产力发展的正当性。他还指

出,支配自然虽然具有正当性,但是威胁到人的生存利益的支配自然是应当摒弃的。这就将生产力发展本身与破坏生态环境的生产力发展区别开来,从而确保了生产力发展的合理性。格伦德曼还指出,人类对自然的支配不断增加意味着他们日益获得更多的自主性,共产主义则意味着一切自然和社会条件都是人类共同支配自然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主义是人类对自然的支配达到顶峰的社会。也就是说只有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社会才称得上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把生产力发展与共产主义联系起来。而共产主义作为未来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也就赋予了生产力发展以必要性。

其二,开启了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价值立场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新时代。在生态问题全球性爆发、绿色思潮勃兴的历史背景下,西方环保主义者纷纷将批判矛头指向“支配自然”观念,指责它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鉴于支配自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核心主张,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和否定就成为了当时西方绿色思潮的主流思想倾向。针对“深绿”思潮对于“支配自然”观念的诘难,格伦德曼明确提出,“支配自然”观念不应该对生态问题负责,相反,生态问题的出现恰恰证明了人类支配自然的不足。为了证明自己的这一观点,格伦德曼对“支配自然”观念进行了独特的阐释。他通过对近代理性的批判,超越了近代理性对价值和利益的狭隘理解,在坚持自然没有内在价值的基础上赋予自然工具性价值以超越经济价值的其他价值,并在主张人类只能以自我为中心的前提下拓展人类利益的视阈,将长期利益、环境利益等都纳入其中。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支配自然是以理性为指导、以人类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控制自然。由此可以看出,格伦德曼对“支配自然”观念的阐释是以鲜明的人类中心主义立

场为理论基石的,不同的是,他超越了近代狭隘的、短视的人类中心主义或者说强式的人类中心主义,将人类中心主义理解为扩展的、长期的人类中心主义。格伦德曼正是通过对“支配自然”观念的积极阐释,驳斥了西方绿色思潮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与否定,维护了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的理论合理性,开启了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价值立场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新时代。

其三,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西方环保主义者指责马克思是主张支配自然的技术决定论者和生产力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生态思维甚至是与生态主张相冲突,就连隶属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阵营的泰德·本顿也主张以“适应自然”观念代替马克思的“支配自然”观念。格伦德曼通过对马克思的“支配自然”观念的积极阐释对这些错误观点进行了批驳。他将支配自然与支配自然的特定方式区别开来,并指出正是人类支配自然的过度方式才造成了生态问题,而马克思的“支配自然”观念是以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为理论基石的,它充分意识到人与自然是休戚相关、和谐共生的统一体。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14]。格伦德曼所主张的支配自然,是在确保自然生态系统稳定的前提下进行的。这种支配超越了人与自然机械对立的二元论立场,扬弃了对自然的征服和统治意识,蕴涵着生态哲学所主张的整体主义和有机论思维。这为解决今天困扰人类的生态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具有鲜明的当代性。

参考文献:

- [1] 田海平.从“控制自然”到“遵循自然”[J].天津社会科学,2008(5):12.

- [2] 王正平. 环境哲学[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4:220.
- [3] 王雨辰. 从技术政治学到审美政治学[J]. 国外社会科学, 2009(1):14.
- [4] 莱斯. 自然的控制[M]. 岳长龄, 李建华, 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3.
- [5] 张一兵. 马克思与自然的支配[J]. 求是学刊, 2007(1):33.
- [6] GRUNDMANN R. Marxism and ecology[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
- [7] 刘湘溶. 生态伦理学[M].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80.
- [8] BENTON T. Marxism and natural limits: an ecological critique and reconstruction[J]. New Left Review, 1989(178):75.
- [9] 施密特. 马克思的自然概念[M]. 欧力同, 吴仲昉,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8:97.
- [10]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928.
- [11] 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928-929.
- [12] 习近平.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50.

(上接第25页)

- [18] 3500亿双十一疯狂过后 一个大麻烦让马云都发愁[EB/OL]. (2018-11-13) [2018-08-14]. <http://edu.sina.com.cn/z1/2018-11-13/doc-ihmutuea9703592.shtml>.
- [19] 沃德, 杜波斯. 只有一个地球[M]. 吕瑞兰, 李长生, 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165.
- [20] 王春晓, 朱虹. 地位焦虑、物质主义与炫耀性消费——中国人物质主义倾向的现状、前因及后果[J]. 北京社会科学, 2016(5):31.
- [21] 刘勇, 何苗.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生成逻辑[J]. 理论与评论, 2018(3):31.
- [22] 柴素芳. 大学生幸福观教育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7.
- [23] 崔晓玲. 丹麦:绿色经济风头正劲[J]. 中国对外贸易, 2012(7):60.
- [24]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17-10-28(01).
- [2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296.
- [26] 闵浩宇. 论构建绿色生活方式的社会化途径[J]. 新西部, 2014(24):.
- [27] 刘德海. 绿色发展[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193.
- [28] 佩恩, 扎莱纳. 小趋势——决定未来大变革的潜藏力量[M]. 贺和风, 刘庸安, 周艳辉, 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3.



引用格式:吴伟. 城市社会的发展范式及其未来走向[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9(6): 36-44.

中图分类号: B0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8.06.005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8)06-0036-09

城市社会的发展范式及其未来走向

Development paradigm and future trend of urban society

吴伟

WU Wei

上海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 上海 200082

摘要:社会发展、人的发展体现为城市发展,推动城市发展的动力有不同的形态,从而形成不同的城市发展范式,各个范式之间的纠缠又生成城市发展的一般范式,如“资本—政治—社会”“情感—历史—文化”“科技—人文—生态”等。随着我国城市的不断发展,城市问题、城市矛盾的日益突出引发人们对城市发展的反思。要发掘中国特色城市发展的根基所在,把伦理范式、有限范式等融合进中国特色城市发展的总体性范式,则需要构建以包容性、兼容性与公共性为基调的城市空间与城市制度,构建与中国特色城市社会相适应的历史文化,以有限范式的自觉合理应对中国城市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代价与风险选择,以“此在单元”的微观视域推动中国城市社会发展,树立以城市的未来引领中国城市社会发展的实践理念与实践意识。如此,才能以城市命运共同体打开城市的未来。

关键词:

城市社会;
发展范式;
总体性范式;
城市命运共同体

[收稿日期] 2018-07-26

[基金项目] 上海财经大学 2018 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CXJJ-2018-385)

[作者简介] 吴伟(1985—),男,河南省民权县人,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空间哲学、城市哲学。

城市社会具有强烈的后现代性语境。亨利·勒菲弗^[1]把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城市社会。城市是人的聚集,是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的聚集。因此,人的发展、社会发展与城市发展具有内在一致性。城市是作为可能性存在的人的一种定在,是不确定的人的活动的一种确定性。同时,城市也是现代社会问题与社会冲突的集聚地,城市发展是人的发展、社会发展的张力之所在。对城市发展趋势与规律的探索,对城市发展的内涵、功能、作用的研究,意义重大:一方面具有社会存在论意义,另一方面对中国城市化的建构路径具有价值论意义。在反思的意义上,城市发展需要不同学科、不同逻辑、不同城市问题的相互交流与交融,在思想的深层激荡中,探寻城市社会的一般发展范式,激活城市发展的深层动力,实现城市的自信与自觉,在已有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不断追求城市社会发展更好的可能。在结构主义语境下,城市社会的发展由单个范式主导,但是其他发展范式并未消失,而是在某个主导性范式的作用下形成“范式纠缠”。反思这些发展范式,探索城市发展的规律,树立可行的城市发展目标,对确立总体性城市发展远景规划具有重大意义。本文拟通过对城市社会发展范式的历史考察,探寻中国城市社会的总体性发展范式与城市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以明确中国城市社会发展的目标、价值与意义,推动中国城市社会的发展。

一、城市社会的“资本—政治—社会”范式

资本的目的是实现自我增殖。资本范式注重城市物质空间扩张、物质财富增长的经济发展理念。相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优越性表现出强大的资源配置能力,使社会的剩余财富不断投入到生产与再生产的扩张

链条上,通过货币把人与人之间的复杂性、多样性的关系简单化和齐一化。无论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都是通过理性祛魅奠定了世界货币化的哲学基础,而机器大工业把人与人、人与自然时空压缩与集聚在一起,工业城市的历史地位得到确立并且飞速发展起来。城市的外延,诸如人口增长、城市空间、经济指标等,成为衡量城市发展的指标,城市的发展即是资本的集聚与分工的细致化,现代社会由此迈入城市社会。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资本在实现自我增殖的同时也孕育着与之相适应的政治范式,寻求资本发展的政治合法性。不同的资本样态,在不同的境遇下生成不同的政治形态,总的发展趋势是:传统城市的神圣性转换为世俗性,城市成为民主与自由的表征,城市政治生命决定了国家政治生命,城市成为现代民主的政治舞台,城市的权力架构与权利诉求突变为政治范式的核心构件。因此勒菲弗认为,城市作为一种空间,其空间生产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蕴。人们通过资本通约把自己的生活世界转变为可以量化的世界,社会变成消费社会,城市的扩张引起消费的集聚,从而刺激城市的再度扩张,于是城市逐渐成为一种生活和生产空间,日常生活范式随着资本范式的侵入演变成一种消费逻辑。

“资本—政治—社会”范式所推动的社会发展展现出巨大的魅力,社会以生产为目的,政治为生产扫清障碍,社会生活成为再生产的转化器。于是现代性城市的蓝图就被这种发展逻辑勾勒出来:高楼大厦琳琅满目,商业中心与高档住宅成为城市的涟漪中心,围绕这些中心形成了大都市。资本、政治、社会三者之间的相互纠缠奠定了城市社会发展的一种路径,彰显了现代城市社会利益共同体的生成。在物质力量与物质文明层面上,其他的发展范式在以资本为主导的范式面前,相形见绌,城市社会因此披

上了理性主义的外壳,成为现代文明的标志性载体。首先,资本范式改变了等级制社会处理社会剩余劳动的方式,打破了物质文明的等级制,开拓了物质文明的大众化,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城市发展的功能性发生了改变。其次,资本范式打破了等级制的权力结构,自由和平等的理念与追求使人类社会前进了一大步,世俗性权力与权利为每个人都可以生而触及,城市发展的价值性得以极大丰富。最后,资本范式最大限度地开发人的潜能,塑造符合资本发展的完成人,并形成城市发展的资本有序性。

“资本—政治—社会”范式并不是资本完全占居主导地位,在城市社会中,依然存在着政治引领资本和社会生活的范式样态,也存在着社会生活引领资本与政治的范式样态,这里只是表明三者之间存在天然的亲和力。人类社会并非只有这一种发展范式,倘若如此,那么作为母体的等级制社会如何也产生不了“资本—政治—社会”范式,等级制社会的周期式振荡也无力培育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城市问题与城市冲突也不断提醒我们反思“资本—政治—社会”范式的内在矛盾。

其一,城市社会主体性的滞涨。“主体是关系结构中的主动方、主导者。主体性是作为主体,也就是作为对象性关系与对象性结构中的主动方、主导者所具有的特性……人的主体地位,就是人对具体对象性关系的自觉、主导与控制程度的提升,人的主体性就是人在具体地自觉控制对象性关系的过程中所生成、展开、积累的素质、能力和特性。”^{[2]170}主体性的发展,一方面是能力的不断提升而凝聚为具体性;另一方面是主体性的不断拓展而表现为结构的多样性。而货币关系作为抽象的一般关系,封闭了主体多样性不断生成的可能,致使社会创新能力、创新意识、创新责任不断下降。主体性的不

合理性引导社会追求消费与奢华,制造消费幻象、消费等级、享乐意识,无欲无节制的生活成为城市社会发展的现实幻象。城市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力停滞了,合理的主体性被扬弃,不合理的主体性、单一的主体性又使得城市社会陷入功利主义泥潭,这就是主体性的滞涨效应,同时也是标准化主体的具体确立。

其二,城市空间的隔离与主体间性的断裂。城市是人的聚集地,也是历史的空间存在方式,城市的封闭性给人们带来安全感与安全的生活,这是城市认同与城市内部交往的一个层面。但是,社会精英所主导的城市空间生产正在消解城市的活力。城市空间的隔离也是特权的标志,社会分工与社会阶层的产生必然导致空间的隔离,并广泛地体现在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在资本主导下,城市空间在不断扩张的同时,也在制造着富人区和贫民窟,使老城区逐渐成为相对贫困的地区。这种情况也出现在城市与城市、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它们之间的交流成为不可能,空间隔离成为空间生产的目标。在唯物史观视域下,这就是资本发展产生的两个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城市空间隔离被放大,主体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断裂,城市主体权力与权利的断裂,使城区差异、地区差异、国别差异上升为社会矛盾并引发社会冲突。

其三,城市空间弹性的缺失。空间弹性是社会发展的张力,它既是私人性与公共性的统一,也是流动性与差异性的统一。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权利的差异是城市发展的动力因素,但这种差异如果过大或固化又会造成城市空间的固化。“资本—政治—社会”发展范式造成的城市空间弹性的缺失,一方面导致空间的私有化,另一方面又导致空间的固化,使私有制变为资本运行的手段,人的自由与平等变为货币的自由与平等,启蒙运动的天赋人权理念

变为实体性的天赋财权,君权神授的贵族等级制变成资本等级制。程序性的公平只是形式上的公平,其结果必然产生贫富差距,最终导致生产与生活的无序、无限制,引发经济周期性振荡和经济危机,在政治上的固化表现为政治献金,在社会生活上的固化表现为碎片化的符号社会。马克思^[3]据此把资本主义划分为两个阶段,即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并指出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这同样说明了城市空间的固化,因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就是城市社会发展弹性的萎缩过程。对此,大卫·哈维在《资本的限度》《社会公正与城市》《资本的城市化》等著作中作了批判性的分析和研究。

二、城市社会的“情感—历史—文化”范式

“情感是人与世界、人与自身等关系的一种深层触发,是人性之总体性、完整性的一种内向性确立与升华……情感是人作为总体性、精神存在的一个本体性内容,是人存在与行动的一种重要的本源性的支撑与深层动力,是人的生存与活动具有意义与动力的重要原因……情感最根本的问题是,作为对象性存在物,人自身的归属问题,是从根本上可以把自己托付给谁的问题,是信任谁,把本体论的信任交付给谁的问题。”^[4]情感的精神性存在属性,往往被误认为是非理性的东西。情感的非线性与偶然性是理性摒除的对象,的确需要普适的理性加以规制。然而情感的非理性特征并不能否定情感的稳定性。国家情感、宗教情感、民族情感、家庭情感、职业情感、阶级与阶层情感等作为社会关系,一方面维持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另一方面也维系

社会关系的稳定,情感的形成与发育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提供了精神纽带。例如,资本的发展就是将情感转化为契约精神,把合同变成信任的载体,使商业精神从情感的种子里逐渐培育出来,成为城市社会情感的一个重要维度。情感虽不能被还原为“经济—政治—社会”范式,但是情感的产生并不是一个自然生成过程,不但其内容逐渐丰富,也有自身的变化与演进规律。在战争年代,国家情感与民族情感会上升为社会主要情感;在和平年代,职业情感与家庭情感又会上升为社会主要情感。例如,在中东地区,石油利益的争夺是导致危机的一个原因,宗教冲突与宗教情感的矛盾激化也是危机的诱因之一。情感范式的稳定性与确定性的重要支撑和来源是历史传统。历史传统是人们在生产与再生产活动中调适自身的一种积淀,也是任何文明持续存在的重要依据与文明主体的标志;历史是人们确定性生活的塑造机制和凝聚机制。在城市社会中,历史传统内含的社会认同、社会情感与心理、社会信任与社会依赖感、归属感的重要场域就是城市。马克斯·韦伯认为,历史意蕴是政治权力获取合法性的重要方式。没有历史支撑的政治权力必然被政治逻辑边缘化。片面强调现代性的正当性,完全颠覆历史传统的社会发展是无根的,不仅仅是短视,而且也将导致文明发展的深层动力不可持续,以及规模发展与内涵发展的断裂。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认为,历史与文化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与动力,任何强制性改变和抛弃历史与文化的行为必然阻碍社会进步,文明断裂的原因就在于对历史与文化的干预。历史遗迹虽然淹没在城市社会,但是历史文化通过不断演化、不断融入当代人的生存与生活方式,会形成历史的发展与转换,不断打开人们的文化范式。文化范式强调人的精神性和主体性。在城市社会中,城市一方面是地理空间性场域,另一方面

是文化有机体与文化共同体,在继承历史文化的同时不断表达城市主体的内在需要,形成鲜明的内在特质,并且把这种内在特质外化、对象化和符号化。在这个意义上,文化范式是主体性的精神定在,城市文化是社会发展的精神根基。

在城市社会,“情感—历史—文化”范式的深层本质是城市精神,城市精神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在当代社会的表现,“城市精神作为城市理性、当代社会理性的核心,是以市民社会为形成、实践主题,为大多数城市人群所认可、遵守的共同意志”^{[2]193}。首先,城市精神的本质内容是社会认同,即对社会存在、社会关系的主体性观念的凝结,是市民的共同意志的集中表达。在城市中,个人的能动性在社会关系结构中被放大,但个人的城市权利并没有被取消,人们的个人意志与情感上升到了社会层面,获得了社会化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由此而形成的城市精神是包含个体的社会公共性,是推动城市发展的前提条件与重要因素。其次,城市精神是城市社会的灵魂,不同的城市具有不同的城市精神,不存在统一的世界性城市精神。城市精神的特殊性与多样性源于城市之间差异性,只有承认这种差异性,才能认识到占主导地位的城市精神,确立具体的城市价值观,实现城市精神、城市情感、城市文化的自觉与自信,构建城市社会的软实力。然而,目前,城市精神也存在着发展困境,即城市精神构建的自觉性缺失。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情感的撕裂性。情感的开放性与封闭性已是现代城市社会中人们生活的两条平行线,情感的合理性载体缺失,导致情感的释放依赖于酗酒,甚至是毒品。情感的碎片化使情感与情感之间撕裂,情感的这种固化使得情感的本质属性即共同感丧失。碎片式的情感富集与情感黏性,造成情感之间的排斥和以情感划分

的圈子文化。情感的断层又进一步造成情感冲突,致使情感的本体性安全无处安置。

其二,历史传统生成的危机性。城市社会与历史传统的连续性问题是指,历史作为过去式是不是标志着落后?城市社会的自身传统如何形成?是否可以用一个城市标准作为所有城市发展的目标?城市社会发展的目的是否意味着东方文明向西方文明学习?就当下而言,城市发展呈现出这样的特征,即历史传统被精英文化所控制甚至抹去。究其原因,这一方面是因为既有历史文化的消失与压缩,另一方面是因为新的历史文化形成的动力缺失,从而造成城市精神危机。例如,既有历史文化中的春节,家乡的与城市的始终是两个味道;返乡文化和春运文化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新的历史文化。如何构建新的历史文化仍然是今天值得探索的一个重要问题。

其三,文化的裂变性。城市是多样文化的集聚,差异性文化形成不同样态的亚文化,文化的差异性既是主体间的差异性,也是人的精神需求的细化。文化危机一方面是文化的自信缺失与过度自信,另一方面是虚无、孤独的主体性危机。文化的非自足性要求城市文化与经济发展、生态发展、制度发展和政治发展有机统一。文化发展的空间不能盲目从属于其他发展范式,既要避免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文化工业,也要走出让·鲍德里亚所指出的符号文化的迷魅,这是城市社会面临的时代问题。

三、城市社会的“科技—人文—生态”范式

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是反映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实践能力的重要指标。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在改变人们社会生活的同时,也改变着人与自然的交往方式。科学技术范式的核心是揭示人与自然的关

系问题。黑格尔认为,自然是非独立存在的,有其内在运行的规律,自然的逻辑就是自然的主体性。随着人们实践能力的集聚与实践场域的变化,科学技术问题也成了城市问题。城市社会发展的科学技术范式在宏观上分为人类中心主义和反人类中心主义。以笛卡尔以来的理性主义为标志的人类中心主义,一方面,承认人在人与自然关系之中的先在性与优生性,认为人的发展就是征服自然,向自然无限地索求生产生活资料;另一方面,认为科学技术的研发与推广激化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导致自然资源不断枯竭,直至影响到人们的生活,造成了生态危机。法兰克福学派与之后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派批判科学技术的这种不顾后果的工具理性属性,将这种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激化称为浅层生态观。美国生态学家、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奠基人利奥波特认为,强调人是自然界的主人就是人类中心主义。以利奥波特为代表的反人类中心主义者认为,自然也具有生命,自然的神圣性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意识上与自然及其他生物进行移情式交流,只有尊重自然的一切生命,尊重自然的内在逻辑,人们才能获得幸福。在微观层面上,科学技术的聚集产生了大城市。以城市为中心重构生态圈,工业的时空聚集打破了原来的生态循环,使传统农业向工业和商业靠拢,科学技术在不断解决城市问题的同时也诱发了新的城市问题。例如,城市的热岛效应、二氧化碳排量的增加导致的气温升高,需要人工制冷技术加以解决,而大量的空调设备又造成大气层臭氧量的降低,导致新的全球性气温升高。

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传播息息相关,科学技术只有传播到不同国家与地区,才能通过不同的具体环境产生新的发展,通过人们实践的多样性不断进步。一种科学有不同的技术方式,进而产生不同的生产方式,这是科学技

术推动社会发展的必然逻辑。例如,中国的四大发明传播到西方后,极大地推动了西方的航海技术的发展,加速了西方商业文明的发展进程。科学技术的发展有时会采取极端的方式,二战时期围绕战争的科学技术奠定了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例如,破解发报机密码的机器成为计算机的雏形,导弹技术的研发激发了人们的月球梦,原子能的研究使人类走进核能时代。然而,这些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使得人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人类不断反思的过程。美国哲学家诺顿认为,应该建构一种新的人类中心主义,既利用自然又保护自然,以代替资本主导下的浅层生态观。然而我们不能盲目地批判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工具理性所包含的效率原则是不能被剔除在生态范式之外的,我们应探寻科学技术的目的性价值被忽视的原因,以保障科学技术的手段性价值得以合法运行,使之成为科学技术范式的一个有效的附属环节。

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不代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科学技术所带来的负面问题引发人们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并进一步将思考延伸至科技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视域。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是人之最高价值与诉求,人的实践活动与动物活动的主要区别在于人有精神需要、精神活动。科学技术属于人的精神活动的求真层面,人只有在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中才能不断丰富人自身的实践能力。艾比尼泽·霍华德^[5]从人文主义出发,认为城市社会的生态逻辑首先是生态意识下的社会与自然和谐共处,其次是构建与自然空间和谐的适度城市,最后是在主体互利互惠的原则下建设田园城市。帕特里克·格迪斯^[6]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虽然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但思想并不是同步前进,也极易产生思想的牢笼与停滞。他把工业时代划分为旧技术时代与新技术时代,认为

旧技术时代的主要特征是浪费、掠夺、生活恶化与无限享乐,最终引发社会战争,而新技术时代以新技术为手段,重新审视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生活意识,通过教育重新点燃人们的信仰精神,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建构城市之美与城市精神,以生态学为目标建设差异性 & 个性化的生态城市。刘易斯·芒福德^[7] 提倡文化城市,主张城市社会的生命性与生态性,认为城市发展的经济追求与欲望思维是造成城市问题的罪魁祸首,城市是现代人们生活的母体,整体的生命城市是一种秩序,这种秩序须能包括社会组织和个人的,最后包括人类的全面功能与任务,只有构想出这样一种新秩序,我们才能为城市找到一种新的形式。

对科学技术范式与人文社会范式的反思共同指向与激活了生态范式,并彰显了其所内含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属性。但是,科学技术范式把生态范式扩展为单一的自然范式,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为了间接关系,并且把人的感性抽象化;人文社会范式强调人的精神性与主体性,过度强调人文的社会性,又走向了历史虚无主义。这两种范式的不同旨趣造成了人们在知识论层面上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分裂。盲目迷信科学技术范式的万能,会压制伦理范式产生极端的利己主义与功利主义,把政治范式压缩为强权主义思维;盲目迷信人文社会范式的万能,会把人转变成主观任意性的原子式个人,致使人的复杂性、多样性与历史性的社会整体被解构。生态范式的合法性意蕴在于生态的空间性与城市性,在于生态的对象性关系构建。生态范式不仅包含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也包含自然与自然、人与自身的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同时也是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恶化。生态范式必须同时包含以上几种关系,才能形成人类社会的整体性生态。生态范式首先应该包含生态意识,其深层本质

是城市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其次是对自然的敬畏,即把自然、社会与人自身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再次是倡导有限生态,保持城市社会的有序性与多样性,避免系统之间的过度侵入,提倡城市的全面生命本质;最后是主张生态调试,通过内化生态理念,不断调试城市的生态关系,确立具体的生态制度与生态行动,实现人创造城市与城市创造人的统一。生态范式内在于科学技术范式与人文社会范式,这种内化自身具有复杂性,在知识论上表现为新的知识群,并成为当下城市研究的热点,如智慧城市、生态城市、伦理城市、海绵城市等。生态范式的激活过程展示了城市发展与社会发展的高度统一。

四、中国城市社会的总体性发展范式与城市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由具体发展范式之间的纠缠而形成的一般发展范式,只是分析现代城市社会的一个视角,“城市是人们积极的聚集行动发生的场所”^[8]。城市社会的发展逻辑同样也是各个具体发展范式的综合,是包含多样性的总体性发展范式。城市社会的发展不是范式的细化,而是综合性的城市反思与城市自觉,即在各个范式的交融中不断寻找城市发展的可能性范式。城市社会的总体性发展并非构建一个完美的范式体系,范式的反思与自觉和城市社会的问题是同构与共谋关系。城市社会发展的问题性与复杂性催生一般发展范式与应用性发展范式,这就需要人们打破经济学、政治学、逻辑学、历史学、生态学、宗教学、艺术学、美学与哲学等学科之间的视界隔阂,超越经济人、道德人、政治人与社会人之间的主体性鸿沟。随着城市社会的发展,城市社会的发展范式也不断被激活与延展。新的城市问题不断引发新的反思,上文中提及的几种发展范式在逐渐成为显性范式的过程中也会不断诱发新的城市问题,这些显性范式在城

市社会历史舞台上的主导性将逐渐暴露出自身的缺陷,成为城市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阻碍。与此同时,这种阻碍会把隐形发展范式激活或者促成新的显性发展范式的诞生。城市社会的空间固化问题进一步凸现出创新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创新范式是理解城市生命与生态、城市衰败与城市繁荣,加速和保障城市活力的重要机制。城市问题的深化引发人们对伦理范式的语境与内容的思考转换,伦理范式的开放性与非自足性要求我们不断建构弹性的伦理关系。现代城市社会的发展既面临新的机遇又面对新的挑战,使城市社会蕴含高度的不确定性,并赋予城市社会成为具有新特质与新内容的风险社会。城市社会的总体性发展范式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构建包含着时代问题意识、批判意识与实践意识,对发展范式的研究无疑有助于中国城市社会的发展,确立中国城市社会发展的目标、价值与意义。

事实上,城市化本身就是一个成就与问题复杂交织的过程。1990年代中期,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仅为30%左右,目前已达到50%左右,并可能继续以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快速推进。据预测,未来二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70%以上,基本建成城市社会。^[9]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在东部发达地区,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正如L. S. 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的,“每个时代都要编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编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10]。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也会不断产生社会冲突与矛盾,诸如城乡二元结构、贫富差距、生态恶化、信息安全、户籍羁绊、高房价与城市公共交通等。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我们要深度把握中国城市社会的一般性和特殊性,通过不同城市样态,不仅在城市

内部形成相互交融,而且在城市与城市之间形成相互交流与和谐的样态。中国城市社会的总体性发展逻辑的指向是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在城市社会发展阶段,这个指向性就是中国城市命运共同体的弹性构建,既形成城市交往的共同秩序,又保持城市交往之间的差异性张力。就目前中国城市社会的发展阶段与发展问题而言,中国城市社会的总体性发展范式构建与城市命运共同体的形成需要以下几点的支持。

其一,构建以包容性、兼容性与公共性为基础的弹性城市空间与城市制度。城市社会的弹性张力的核心是保持差异的流动性,差异与流动可保障主体间性与城市间性的动力和效率,抵制阶层与城市固化。各个具体的、具有不同生活与文化背景的主体平等进入、相互尊重、相互融合、相互学习,可以把异质性的主体整合成一个有机的命运共同体,突出政府在现阶段的主导作用,建设公共设施,宣传公共价值理念。营造异质性范式与主导性范式的共在空间,确保城市权利与权力的统一。

其二,构建与中国特色城市社会相适应的历史文化。深刻理解中国历史文化底蕴是把握中国特色的关键。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和民族性格的实现方式与体现,是中华文明的独特内涵展现,是中国城市社会个性在世界性城市社会中的独特存在。传承优秀的历史文化是创新城市社会发展范式的出发点,是走出模仿逻辑困境的指南针,同时也是中国城市社会发展的精神根基,亦是城市社会从外延型增长向内涵型增长转换的软实力发展的关键所在。

其三,以有限范式的自觉合理应对中国城市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代价与风险选择。中国城市社会发展过程中所突显的时代问题的易变性与复杂性,要求我们在解答所有城市问题时要避免采用一元范式或一般范式。当今城市发展

风险较以往社会发展阶段表现出高度的综合性与杂糅性,而社会发展并不是没有任何代价的,需要人们在风险面前承担自身的价值性选择代价。城市命运共同体的合理构建,需要确立有限范式自觉以破除风险困境,这种有限范式自觉包括主体性有限、生活有限、消费有限、生产有限、生态有限等。有限范式是把握城市现实与城市理想之间张力的桥梁,通过不断调适主体性与对象性关系之间的特殊性与不确定性,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与长远利益的实现。

其四,“此在单元”的微观视域是推动中国城市社会发展的落脚点。“此在单元”是不同的家庭、社区、日常生活的实在场域,是人们的共性与个性基本关联单位,城市命运共同体合理性构建是宏观性政策与各项制度实现的合法性路径与社会发展的稳定基础。“此在单元”之间的差异性及其共融性,是宏观环境正义化与公平化在实践中使人们获取幸福感和满足感,以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所在。因此,鼓励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细心经营家庭与社区的紧密性,给城市社会不断注入活力且形成城市行动与行为合力,是克服奥尔森所指出的“集体行动悖论”的有效方式。

其五,以城市的未来引领中国城市社会发展的实践理念与实践意识。人的发展史与城市发展史具有统一性,人的未完成性也是城市的未完成性。在逻辑上,黑格尔辩证法中的“正、反、合”逻辑中的“合”就是人的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合”在哪里,黑格尔将未来“合”于绝对精神;在理论上,黑格尔把历史变成逻辑预设,未来成为一种合理的恐惧,未来向度定义为历史

的虚无与神秘,也是历史的宿命。城市未来的可能性范式与此截然不同。它不是城市的虚无,而是必然与偶然的统一,是人与自然、历史的统一。城市的未来与城市的历史的贯通就是批判性的城市问题求解从自在到自为再到自觉的过程,城市的未来的筹划亦是城市的物质空间性存在与精神性存在的统一,城市意识的超越性与精神性是城市未来发展的必然环节,由此使得城市的未来变为现实。

参考文献:

- [1] 勒菲弗. 空间与政治[M]. 李春,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65.
- [2] 陈忠. 空间与城市哲学研究[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
-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1.
- [4] 陈忠. 现代性的情感逻辑:历史生成与城市调适[J]. 学术研究,2015(1):12.
- [5] 霍华德. 明日的田园城市[M]. 金经元,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
- [6] 格迪斯. 进化中的城市:城市规划与城市研究导论[M]. 李浩,吴骏莲,叶冬青,等,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8:33.
- [7] 芒福德. 城市发展史[M]. 宋俊岭,倪文彦,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2.
- [8] 科斯托夫. 城市的形成[M]. 单皓,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7:37.
- [9] 陈思. 关于城市化的哲学沉思——论城市哲学的建构[J]. 城市问题,2011(2):2.
- [10] 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M]. 吴象婴,梁赤民,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9.



引用格式:纪德尚. 新时代社会治理系统的共建与共治[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9(6): 45-53.

中图分类号: D625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8.06.006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8)06-0045-09

新时代社会治理系统的共建与共治

Co-construction and co-governance of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in the New Era

纪德尚^{1,2,3}

Ji Deshang

1.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管理学院, 河南 郑州 451191;
2. 河南工程学院 人文社科学院, 河南 郑州 451191;
3. 郑州大学 软科学研究中心,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新时代创新社会治理, 需要以系统治理的方式来治理社会。系统治理是在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合作共建、协同共治的社会治理方式。多元主体的合作共建是推进系统治理的现实基础, 重点是解决多元主体合作的系统建构问题。推动多元主体从共建到共治, 关键是创新社会治理、改进社会治理方式, 重点是解决多元主体良性互动和协同运行问题。通过社会治理系统的共建共治, 可构建新形势下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多元主体合作共治新格局, 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目标。

关键词:
社会治理;
系统建构;
共建共治

[收稿日期] 2018-09-2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BSH120)

[作者简介] 纪德尚(1952—), 男, 山东省青岛市人,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社会治理协同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管理学院院长, 教授, 硕士生导师, 河南工程学院特聘教授, 郑州大学软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 社会学、社会治理。

改革开放40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今日之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相适应的社会变迁正在使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处于深刻变革之中。为适应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对以往创新社会管理实践探索的理论提升,对创新社会治理、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从创新管理到创新治理,意味着党的治国理政方略在处理国家与社会之关系上的重大转变,即由自上而下政府一元主导的社会管理向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协同共建共治的系统治理的转变。

国内外学者对治理问题早有关注。国内学者对治理问题的研究始于1990年代末,主要从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等视角对治理概念、社会治理、社会协同、社会组织协同社会治理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形成了很多具有重要价值的意见;国外学者关于治理问题的研究始于1990年代前后,从多个视角分别对治理、合作治理、社会组织协同治理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相继形成了多中心治理、网络治理、协同治理等不同的学术流派。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关于社会治理问题的研究,从公共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视角研究的居多,从系统建构视角研究的甚少。鉴于此,本文拟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到中共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重大命题出发,依据系统理论分别从社会治理系统的构成特质、内在关联和良性运行三个方面展开研究,探讨社会治理的存在方式、主体构成及其特定功能;从系统建构的关联性出发,通过对党的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相互关系的定位分析,揭示多元主体谁领导、谁负责及其互动关系的非加和规律;从共建共治社会治理系统整体优化视角出发,提出系统治理的多元共治、合作共治、系统共治的具体途径和方式方

法,以推动我国社会治理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实现社会共治的目标。

一、社会治理系统的存在方式和基本特征

当前,有关社会治理创新的探讨,内含有社会治理系统建构的问题。所谓系统是指由若干要素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在系统科学看来,社会治理也是以系统的方式存在的,它由党委、政府、社会组织 and 公众等多元主体(要素)组成,因而具有多元共治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功能。对社会治理系统与要素进行结构分析,有助于从系统与要素、要素与要素相互作用的关系出发,通过结构优化实现社会治理系统的整体优化。

1. 社会治理系统的存在方式

系统论认为,一切事物都是以系统的方式存在的。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指出,“系统的定义可以确定为处于一定的相互联系中并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组成部分(要素)的总和”^[1]。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认为,系统是“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部分结合成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2]。上述定义指出了构成系统的四个要义:一是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二是系统由若干要素组成;三是系统的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四是系统具有特定功能。系统论认为,上述这四个方面是构成系统的必要条件,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条件,系统都不能成立。从系统的要义出发,社会治理作为管理社会事务的活动,也是以系统的方式存在的。这个系统既有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又有社会协同、公众参与,且在多元主体(构成要素)的相互作用中形成协同治理的特定功能。

既然社会治理是以系统的方式存在的,那么它必然遵循系统存在与运行的规律。首先,

社会治理系统不能由单一主体构成,或者说单一主体不能构成系统。同时亦表明,以往自上而下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模式由于缺乏广泛的社会参与,因而是不完善的。其次,社会治理在存在方式上具有非加和性。虽然社会治理系统由多元主体构成,但它不是多元主体的简单叠加,而是在整体上具有 $1+1+1>3$ 的非加和性能。这种非加和性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系统治理的整体性质是任何单一主体所不具有的;二是系统治理的功能也不是任何单一主体孤立存在时所具备的。上述分析表明,社会治理以系统的方式存在,有它自身存在和运行的规律,其存在和发展不是单纯追求政府或某一治理主体的优化,而是谋求多元主体共治中系统的整体优化。社会治理作为系统存在及其所表现出来的特质,对我们认识系统治理的性质,进而把握其中的规律有重要启示。

首先,它为我们揭示了社会治理系统普遍联系的具体形态。在唯物辩证法看来,事物是普遍联系的。那么社会治理系统如何体现这种联系?这种联系的机制是什么?人们如何把握这种机制?系统规律告诉我们,社会治理系统是以制度化、组织化的方式存在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制度体系,包括国家的行政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3]。社会治理体系是社会建设领域里的一种基本的制度建设,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内含有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的内容。而机制创新的过程是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组织化的展开过程,其组织形式的显著特征是体现中国特色:由党委领导和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共同组成。从关联性看,社会治理系统是一个既有组织和等级又具有结构和功能的系统整体,其中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构成了系统的结构,而系统结构的排列组合方式与优劣,则决定着系统的功能。所以,认识社会治理系

统的内在机制,有助于我们从研究系统的结构变化入手去把握系统的整体功能。

其次,它为我们建构社会治理系统及其运行机制提供了具体方法。系统的本质特征是整体性,它要求我们从系统的整体出发,根据系统与要素、要素与要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去把握系统。据此,我们对社会治理系统的认识,可以从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的关联性关系切入,通过对不同主体在社会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所具有的职责、所发挥的作用等的考察和分析,探究系统建构和系统运行的规律。这种方法就是从整体到部分、再回到整体的“整—分—合”的方法。这种方法,有助于我们深化对系统治理内在规律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正确处理党和政府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因为社会治理系统的建构,在构成要素上不仅要解决多元主体由谁领导、由谁主导、由谁协同、由谁参与的主体结构问题,而且要在系统治理的功能行为上解决好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合作共治、良性运行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坚持以系统治理的方式治理社会,可以为复杂条件下创新社会治理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2. 社会治理系统的基本特征

任何系统都是在动态变化过程中随发展而不断趋于完善的。社会治理以系统存在的方式存在,以系统运行的方式运行,是一个践行社会治理创新和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治理系统的建构与运行,始终是从社会治理系统的全局出发,是在多元主体的相互关联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中综合地、精确地考察对象。社会治理系统主要具有以下特征。

其一,整体性。整体性是指系统的整体性质具有非加和性,即“整体大于它的各个部分之和”。系统治理所追求的目标是系统治理的整体优化,所以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既要从整体

出发确定和把握目标,又要从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中把握方向,还要从实际效能上实现社会治理的整体优化。具体来说,就是在推进社会治理过程中,应从多种可行途径中选择一种最佳的方案,使社会治理系统运行处于最佳状态,使社会治理系统的功能达到最优目标。在这里,整体优化既是当前创新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又是创新社会治理所追求的结果。在当前,深化对社会治理系统的认识,必须具有系统化的视野,对其进行整体性的思考,并在这一价值目标下夯实多元主体的共建基础,寻求多元主体的共治实效。同时,在多元主体合作共治中,要求不同主体的局部利益必须服从社会治理的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社会治理的长远利益和发展大局。

其二,结构性。结构是事物的存在方式,也是社会治理系统的基本特征,因为社会治理系统是由若干主体组成的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所谓结构就是多元主体在社会治理系统中的排列组合方式。在由多元主体构成的社会治理系统中,主体不同,其地位和作用也不同,其中党委处于领导核心地位,政府处于主导和连接地位,社会组织和公众处于协同参与地位。不同主体的地位是由其所扮演的角色和职能所决定的,而且不同主体的职能彼此是不可替代的。在这个意义上,虽然不同主体在社会治理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但其目标是完全一致的,正是在这种一致的目标下形成了特定的合作共治关系。据此,优化社会治理系统的关键是优化系统的结构,优化不同主体在系统中的相互作用方式,规范不同主体的职能范围,规避不同主体可能出现的越位、缺位、错位和虚位问题。一言以蔽之,依托结构优化,实现社会治理系统的整体优化。

其三,有序性。有序性是保证社会治理系统存在和运行的先决条件,它要求构成社会治

理系统的多元主体在角色、职能、作用等方面界限清晰、层次分明、井然有序,同时围绕共同的目标在系统与要素、要素与要素之间保持良好的合作共处关系。所谓层次分明,是指相对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系统是其组成部分;相对于基层社区治理,其又是高一级治理系统。在当前,保持社会治理系统的有序性,要求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在法律制度规范下履行各自的职责,政府根据有限原则条件开展有效的政府治理活动,社会组织根据社会协同条件开展有效的自我调节活动,居民根据参与治理约束条件开展有效的自治活动。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协同建立不同主体之间的上下结合、良性互动关系,从而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有序化。

其四,动态性。动态是指事物作为系统存在的运动、发展和变化。社会治理是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管理社会事务的活动,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决定了社会治理系统必须根据变化及时作出相应调整,这就使得社会治理系统具有了动态性特征。研究社会治理,必须关注社会治理的动态变化。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社会的开放性加剧了社会治理生态的复杂性^[4],而社会治理外部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各类社会组织和社会自治力量的快速兴起,加快了治理格局从政府一元主导的社会管理模式向多元主体共建的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社会治理格局的变动,体现了社会治理的动态变化,同时也是发展的观点在社会治理领域的生动体现。

其五,目的性。目的是指人们在从事活动时所要达到的目标和实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这一总目标出发,创新社会治理的目的性要求,是打造共建共治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相对于以

往的社会管理模式,从共建到共治是一个在国家治理总目标下的社会治理结构创新和系统重构问题,其中创新重在改进社会治理体制,重构重在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系,通过目标和体制创新与实践模式创新的结合,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的科学化和现代化水平。

二、社会治理系统的内在关联

从系统论来看,以系统方式存在的社会治理系统是由多元主体构成的,且在运行过程中其系统与要素、要素与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政府治理与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之间存在的关联性,为通过系统整体的优化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之间的良性互动提供了可能。

1. 社会治理系统与要素之间的关系

不少学者认为,社会协同旨在通过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以解决单个组织不能解决或难以解决的问题。这种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是系统论在思维领域的具体体现。对于社会治理系统来说,为了使多元主体的协作更加富有成效,首先要把握社会治理系统与要素之间的关系,即构成社会治理系统的要素数量和不同主体的形态。从社会治理主体数量分析来看,我国的社会管理长期以来是党和政府一元独大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不仅与社会治理系统多元社会主体合作共治理念相悖,而且很难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下管理社会事务的要求。因此,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了改进社会治理的要求,同时提出了系统治理的模式。系统治理模式特征决定了单一主体不能构成系统治理。所谓系统治理,是指由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和相互作用关系构成的治理方式。所以,在创新社会治理中,除了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之外,还需要社会组织和公众作为治

理主体参与其中,通过整合多元主体的优势,形成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开放治理体系。

从社会治理系统多元主体的形态上看,由多元社会治理主体构成的社会治理系统,由于不同主体的功能定位不同,其所扮演的角色及其与系统的关系也有所不同。各级党组织在社会治理系统中处于领导地位,坚持党的领导既是中国社会治理的鲜明特色,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定律^[5]。所以,创新社会治理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坚持党的领导,确立党在其中的领导地位。各级政府在社会治理系统中处于主导地位,在创新社会治理过程中扮演着引领者和组织者的角色;在政社分开、边界清晰的条件下,政府的主导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各类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系统中处于协调地位,其作为共建共治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主体,是协调社会治理、激发社会活力的重要社会力量。公众参与在社会治理系统中处于基础地位,是创新社会治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重要体现。实践证明,没有公众参与,真正的社会治理难以形成。在社会治理系统中,尽管不同社会治理主体形态各异,但其地位则是平等的,共建共治方式是合作的,社会治理目标是完全一致的。根据社会治理系统与要素之间的关系,由多元主体构成的多元合作共治系统是社会治理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在这一进程中,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就是在多元主体良性互动中,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和专业化水平。

社会治理系统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要义正如中共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在这个系统中,系统与要素的关系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其中任何一个主体都不能脱离社会治理系统而孤立存在,因为各主体只有

在社会治理系统中才能发挥各自的功能和作用,脱离这个系统,各主体就会失去各自相应的功能。党和政府只有在这个系统中,才具有社会治理的领导和主导地位,才能发挥领导和主导作用。同样,社会组织和城乡居民只有在这个系统中,才具有社会治理的主体地位,才能发挥社会协同和基础性的作用。而这些特质是由系统整体的非加和性所决定的。

系统的非加和性揭示了社会治理系统与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其内在规律:一是社会治理系统由多元治理主体构成,且与多元主体的性质密切相关;二是社会治理系统的整体性质依赖于多元治理主体的性质,并且以非加和性统一于系统整体行为之中;三是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只有在与其他主体的相互作用中才能对系统整体发挥作用。根据上述分析,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旨在更好地发挥社会治理系统的整体功能,只有正确处理社会治理系统与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才能使整体优势更加突出、治理更加有效。

2. 社会治理系统诸要素之间的关系

社会治理系统由多元社会治理主体构成,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构成了系统的结构。这表明,在系统治理模式中,多元主体中的多元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关联的。坚持系统治理,就要从社会治理系统诸要素的关联性出发去把握对象,且在目标一致的合作共建、协同共治中,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其一,党的领导与其他社会治理主体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不仅是由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的,而且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体现出来的最大政治优势。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一个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个是在完善

和发展这个制度的同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同一目标的两个方面,它们既是在党的领导下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又是在党的领导下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总要求。所以,从国家治理到政府治理,再到社会治理,都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坚定“四个自信”,确保社会治理在正确道路和方向上前行。

其二,政府治理与其他社会治理主体的关系是主导与协同的关系。国家治理是一个多层次、立体网络化的治理体系,政府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履行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维护公共秩序和安全等重要职能。在社会治理系统中,政府治理是社会治理的主导力量,但仅靠政府治理难以有效实现既定社会治理的目标,还必须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力量,依托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的合作共治,才能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在这里,政府治理与其他社会治理主体的关系是一种主导与协同的关系。正确处理这种关系,必须在创新社会治理过程中加快推进政社分开、管办分离,以制度化的方式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理清政府与社会的权责边界,规避政府可能出现的越位、缺位、错位等行为。应通过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力度,为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的协同创新提供新的空间,为政府与社会在共建共治共享中实现良性互动和优势互补创造条件。

其三,社会组织与政府治理的关系是一种合作协同关系。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的协同力量,是在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下协同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依法构建现代组织体制和工作体系,动员组织社会力量和城乡居民共同参与社会治理,通过整合社会力量协同政府和社会形成目标一致的社会治理行动。其中,社会组织凭借所承载的协同社会治理、服务城乡居民的职能,及时反映人民群众的诉求,协助政府化

解社会组织内部和外部的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有序,同时根据权责和购买政府服务,为城乡居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此外,社会组织还对政府治理具有重要的社会监管作用。当前,加强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共治关系,需要政府加大对社会组织的扶持力度,同时又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监管,通过精心培育壮大社会组织,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组织的内生动力,使社会组织体系建设和制度建设日趋完善,使之在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在脱贫攻坚、服务群众、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等方面与政府友好合作,更好地发挥应有的社会协同作用。

其四,居民自治与党和政府的关系是一种基础性的协同关系。居民是基层社区治理的主体,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本单元,其重要性正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意见》所指出的,“城乡社区治理事关党和国家大政方针贯彻落实,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城乡基层和谐稳定”。加强和完善社区治理,基层党建是关键,应在创新社区基层党建工作,发挥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基层政府是主导,应在理清基层政府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权责边界基础上,为社区治理提供财力、物力和指导,优化社区治理政策法律环境,发挥基层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主导作用;自治组织是基础,社区与群众性自治组织是社区治理的协同力量,又是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主要渠道,应通过提高和改善居民保障水平,激发居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在不断推进社区群众性自治组织规范化建设中,依法有序地组织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充分发挥群众性自治组织和公众参与协同社会治理的基础作用。

三、社会治理系统的共建和共治

社会治理系统的构建,旨在更大范围内发

挥社会治理多元合作共治的实际效能;社会治理系统的运行,旨在通过共建社会治理系统的良性互动实现多元主体的共治。从社会治理系统的构建到运行,需要建立一套符合国情民意的价值理念,引领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的共建;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运行规划,保障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的共治。

1. 社会治理系统的共建

共建是社会治理系统的建构基础,也是社会治理系统功能发挥的基本前提。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系统构建中,如果说共建是系统治理的基础,那么共治就是实现系统治理的手段,而共享就是系统治理的目的。在复杂条件下实现政府治理与其他多元主体的合作共建,在理念创新上体现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而这种转变就是以系统建构的方式体现在多元主体的社会共识之中,具体化在多元主体合作共建的过程之中。为此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作出努力。

其一,树立共建意识。意识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创新社会治理是以系统的方式存在的,旨在实现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共同管理社会事务。而在以往的社会治理实践中,由于党和政府一元独大、大包大揽处理社会事务,缺乏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尽管费力而艰辛,仍难以达到有效治理社会的预期。在社会治理系统建构中,树立共建意识,就是要从社会治理的实际出发,通过改变既有的思维定式,在深化政府与社会合作意识、协同意识、共建意识的基础上,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在实践中不断开创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协同、多元主体合作共建的新局面。

其二,强化共建理念。共建理念是社会治理系统建构的前提性认识和建设思路。理念是共建的理论向导,用先进理念引领社会治理,就是要从共建意识出发,坚持由政府主导、社会组

织和公众参与多元主体构成的系统治理。系统治理体现的共建理念,吸取了西方治理有价值的思想,把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政府与社会组织和公民聚集起来,在共建中实现共治。这种共建理念反映了国家对当前社会运行和治理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治理理念、体制和方式的重大变革。这种变革是从中国的国情和实际情况出发,在坚持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前提下,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系统,通过先进理念的价值引领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

其三,推进共建进程。在新时代推进社会治理系统的共建是一个过程,必须把制度和体系建设放在社会治理格局的基础性、战略性的地位上来认识,形成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推进共建进程,必须筑牢共建基础。这既需要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也需要加快社会体制改革,推进政社分开、管办分离,提高社会组织协同社会治理的功能。此外,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对公众参与的社会培育,发挥广大群众的首创精神,提高居民自治的能力和水平。只有夯实社会治理系统的共建根基,才能在目标一致的条件下建立多元主体的良好的合作氛围,形成友好合作和协同共建的新机制,从而为社会治理的共治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2. 社会治理系统的共治

在社会治理系统的建构过程中,共建是共治的前提和基础,共治是共建的归宿和目的。由于产生的历史背景、具体国情不同,我国社会治理系统的共建共治在国家制度层面,与西方社会治理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既具有中国特色又体现中国经验,既有中国特色共建的内在逻辑,又体现中国经验的合作共治,是内在逻辑的

共建与外在共治功能的统一。

其一,社会治理系统的多元共治。所谓多元共治就是指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的合作共治,其在治理方式上表现为摆脱重政府包揽、轻多元参与的局限,主张由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社会的治理。也就是说,社会治理的主体不再是政府独占,而是包括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和公众三方参与的共同治理。由此体现出来的多元共治特征,一方面使社会治理除发挥政府组织的作用和优势外,还可以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公众的独特作用和优势,促使社会治理系统在多元主体共治下的整体优势得到进一步优化和全面提升;另一方面,由于不同主体在社会治理系统中又各自存在局限,多元主体的共治既可以规避各自的局限和短板,又可以有效防范和减少多元主体各自的越位、缺位、错位,最大限度地缩减社会治理过程因不同主体局限的聚合所带来的治理风险。

相对于政府一元独大的管理模式,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最大特点,在于它可以把多元主体置于社会治理系统之中,实现多元主体的优势互补,克服多元主体各自的局限,实现社会治理系统的整体优化。而从新时代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的要求讲,它可以解决社会治理领域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和公众参与热情,促进社会进步,减少社会治理成本。

其二,社会治理系统的合作共治。所谓合作共治意味着社会治理模式不再是政府组织的单向运作,而是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合作共治的过程是一个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过程,它一改以往自上而下政府主导一切的运作方式,更加注重多元主体的民主参与,依托上下双向互动和多元主体友好合作,实现对社会和公共事务的多元合作治理。多元主体合作治理建立在平等协商、民

主参与的基础上,尽管不同主体在治理过程中的职能不同,但他们民主参与合作治理的地位是平等的,采用的是平等协商的方法。在地位平等、民主协商的条件下可以不断强化多元主体的合作意识,深化多元主体的合作共识,不断提高合作共治的效能和治理水平。

社会治理系统从共建到共治,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但要真正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共建共治,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推进社会治理的重心向基层下移,针对基层社会组织发育和居民参与不足、公共领域发展不够成熟等问题,不断加强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充分激发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的主体意识,提高基层社区治理能力,实现其与政府职能转变和赋权增能的有效对接,为社会治理系统的共建共治奠定坚实的基础。

其三,社会治理系统的协同共治。在社会科学中,协同是不同行动者之间,以一方为主的协调与合作,二者之间是和谐非均衡关系^[6]。社会治理系统既是一个合作共治的系统,又是一个协同共治的系统。多元主体在社会治理中,既是一种合作关系,又是一种政府主导下的协同关系。这一关系可为创新社会治理的共建共治提供有力的理论支点,同时还可以为推进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协同社会治理的实践探索提供方法。

在社会治理系统共建共治中,协同治理是创新社会治理最基本的方式,也是改进社会治

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的具体体现。由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的社会协同共治,既是党的领导、政府主导下的社会治理过程,也是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基本职能。在新时代,要想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目标,我们必须锐意改革,有所创新,坚持问题导向,把政府治理与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结合起来。因此,在创新社会治理中,必须确立多元主体的社会协同的重要地位,通过为社会组织和公众赋权增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多元主体在社会治理系统共建共治中的协同作用。

参考文献:

- [1] 贝塔朗菲. 普通系统论的历史和现状[J]. 国外社会科学,1978(2):66.
- [2] 钱学森,许国志,王寿山. 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J]. 上海理工大学学报,2011(6):520.
- [3] 俞可平.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J]. 前线,2014(1):5.
- [4] 郑家昊. 政府引导社会管理:复杂性条件下的社会治理[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2):14.
- [5] 房世刚,梁懿文.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党的执政能力提升的若干思考[J]. 观察与思考,2016(3):100.
- [6] 王思斌. 论社会工作对社会管理的协同作用[J]. 东岳论丛,2012(1):17.



引用格式:王再武. 运动式治理的动员技术探究——以 X 县开展“五水共治”为例[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6):54-61,89.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8.06.007

文章编号:1009-3729(2018)06-0054-08

运动式治理的动员技术探究

——以 X 县开展“五水共治”为例

Analysis of mobilization technology in sports governance

—Taking five water co-governance in X county for example

王再武

WANG Zaiwu

中共台州市委党校 基础理论教研室,浙江 台州 317000

摘要:运动式治理在社会治理中广泛存在,它是在常规治理机制失效的背景下为应对治理过程中遇到的重大和棘手问题而开展的突击性治理活动。动员技术是运动式治理有效开展的必备要素。通过对浙江省 X 县“五水共治”案例的分析可知,地方政府实施运动式治理的动员技术主要包括:(1)以政治挂帅克服运动式治理的阻力;(2)以文山会海突显政府的高度重视与治理运动的顺利推进;(3)以项目化运作获取各方的支持;(4)以运动式宣传树立典型、营造氛围。运动式治理虽然有效,但并非社会治理的常态,从长远来看,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是社会治理机制的发展目标。

关键词:
地方政府;
合法性;
运动式治理;
动员技术;
常规机制

[收稿日期]2018-09-25

[作者简介]王再武(1981—),男,浙江省仙居县人,中共台州市委党校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基层社会治理。

2004年6月3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署名刘效仁的报道短文——《淮河治污:运动式治理的败笔》。这篇报道文章针对淮河治污的现状,指出淮河10年来治污的成效甚微,有的地方污染依然严重,甚至比以前更甚,并借水文工程师的话对运动式治理的效果提出了质疑,同时对运动式治理淮河失效的原因进行了剖析,认为仅靠运动式治理、行政命令式的单方推动,要根治淮河污染之痼疾,显然勉为其难;仅靠高压态势下的暂时的关闭停工,甚至靠不惜血本的用自来水冲洗河道,一旦“零点行动”过后,污染必然故态复萌,甚至变本加厉^[1]。该报道反映了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让政府面临着重大的治理困境,表明运动式治理在实行过程中已异化为应付式治理,强调运动式治理是失效的,既不能治标也不能治本。

学术界对运动式治理早有关注,并形成了不少研究成果。冯志峰^[2]较早地从宏观上论述了运动式治理的定义、特征和缺陷;叶敏^[3]比较了政治运动与运动式治理的内部结构和异同,分析了从政治运动到运动式治理的演变机制,考察了运动式治理出现的原因;唐皇凤^[4]以治安治理中的严打政策作为研究对象,具体考察了三次严打政策的发动背景、打击对象、主要做法和治理成效,认为运动式严打是社会治理面临资源瓶颈情况下作出的理性选择;冯仕政^[5]将1978年以后的运动式治理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从合法性的角度对其形成、形态和历史演变进行了探讨;周雪光^[6-7]则从社会治理的有效性角度,以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为主线,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制度逻辑,认为运动式治理机制是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为应对常规治理失效而出现的,但是在现代社会中这一机制的合法性受到质疑,需要创造出新的

组织治理模式。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运动式治理已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不少成果。但既有研究鲜有对运动式治理动员技术进行研究的,而动员技术是运动式治理过程中的重要环节。鉴于此,本文拟以 X 县开展的“五水共治”作为案例,以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关系为主线,对运动式治理中的动员技术进行分类总结,并对其运行机制作深入分析,以进一步提高政府治理的成效。

一、X 县开展“五水共治”的概况

1. X 县简况

X 县地处浙江省 T 市西部,属于欠发达地区,面积约 2000 平方公里,人口约 50 万,下辖 20 个乡镇街道、418 个行政村(社区)。该县水资源总量达 25 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量达 5644 立方米,是 T 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 3 倍、全省人均水资源的 2 倍。永安溪自西向东贯穿全境,是 X 县的母亲河、椒江流域的源头,流域面积 2310 平方公里,有大小支流 38 条,两岸分布着 X 县的大部分乡镇、村庄,是该县经济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该县森林覆盖率达 80%,是 T 市的生态屏障。

2. X 县开展“五水共治”的背景

2013 年底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委十三届四次全会提出“要以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为突破口,倒逼转型升级”的要求,即“五水共治”。“五水共治”的直接起因是,2013 年初,浙江多地环保局长被网友悬赏邀请下河游泳,引起了媒体对浙江乃至全国各地水污染的高度关注。网友、媒体的高度关注引起了浙江省人民政府的重视,进而转化为政府的治理行为。而其深层原因则在于“五水共治”是一石多鸟的举措,既扩投资又促转型,既

优环境更惠民生^[8]。对于 X 县来说,医药化工是其支柱产业,但又对该县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压力。与此同时,X 县又坚持生态立县,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旅游业,这对环境尤其是水环境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两者之间的矛盾无形中倒逼 X 县进行产业的升级和转型,而“五水共治”恰好给其产业转型提供了重要契机。

3. X 县“五水共治”工作进度

2013 年底中共浙江省委十三届四次全会后,“五水共治”作为 2014 年全省的重点工作被明确下来,X 县迅速行动,截至 2014 年 8 月初,其主要工作进度具体见表 1。该工作进度主要是依据官方发布的有关“五水共治”的正式文件而制定。

二、X 县“五水共治”运动式治理的动员技术分析

所谓运动式治理,简单说就是以开展运动的方式进行治理,它是指由各级政府、政府部门或领导干部发动的,以干部为主要的动员和参与对象,针对政府治理中遇到的重大和棘手问题而开展的一种突击性运动^[3]。那么,政府开展运动式治理的合法性基础又在哪里呢?按照马克思·韦伯对权力合法性来源的分析:第一种权威来自传统和习俗;第二种权威来自领袖个人的超凡禀赋和魅力;第三种权威来自法理,即法律上赋予的权威。据此我们可以说 1978 年之前的中国即是一个典型的魅力型权威体制,领袖个人的超凡魅力赋予了领袖行使权力的合法性基础。1978 年之后,魅力型权威逐渐开始让位于法理型权威,政治运动逐渐被各类以社会治理为目的的运动所取代,运动式治理开始成为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处理各类在原有常规行政系统中难以解决的治理困境的有力武器。政治运动与运动式治理的区别见表 2。

表 1 2014 年 X 县“五水共治”工作进展表

时间	内容
2月11日	召开“五水共治”工作动员大会(全县)
2月13日	公布《X县“五水共治”宣传计划》(县治水办)
2月20日	成立“五水共治”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县委办)
2月20日	通过“五水共治”工作禁令(县委常委)
3月6日	公布《“百河百村水陆共清”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县委、县政府两办)
3月12日	发出关于关停禁养区范围内畜禽养殖场所的通告(2014年县政府4号文件)
3月25日	公布“五水共治”工程项目招投标事宜通知(县政府办)
3月19日	公布推行河长制实施意见(县委)
4月25日	成立“河长制”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县政府办)
4月8日	公布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实施意见(县委)
4月22日	公布X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三年行动计划(2014—2016年)(县政府办)
5月8日	公布《X县2014年“五水共治”项目投资计划》(县政府办)
5月29日	公布《X县2014年度主要污染物减排计划》(县政府办)
6月17日	发出开展“五水共治”项目督查工作通知(县委、县政府两办督查室)
6月26日	成立X县永安溪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项目建设领导小组及指挥部
7月3日	公布《X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材料供货流程》(县治水办)
7月1日	公布《X县治污水2014年实施计划》(县治水办)
7月9日	公布《X县防洪水工作实施方案》(县治水办)
7月9日	公布《X县排涝水工作实施方案》(县治水办)
7月9日	公布《X县保供水工作实施方案》(县治水办)
7月9日	公布《X县抓节水工作实施方案》(县治水办)
8月8日	公布《X县政府性投资项目财政资金拨付审批规定》(县政府)

虽然 1978 年以后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开始从魅力型权威体制向法理型权威体制转变,我们党从习惯于发动政治运动到开始启用运动式治理与常规治理相结合,但是我国的魅力型权威体制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正因为如此,运动式治理在动员技术上必然对政治运动有所继

承和延续。X县“五水共治”即具有此特征。该县在实施运动式治理过程中所采用的动员技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政治挂帅:一切运动都是政治运动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以揭发和批斗为特征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实际上在1978年后就逐渐消失了。但是,1978年之后的各类运动,即使如招商引资等明显没有太强政治性的运动,也无不被政府部门打上浓厚的政治色彩。政治性既是运动式治理的一大特征,也是运动式治理的一大策略。这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政策的合法性需求;二是追求运动结果的有效性需求。合法性越强的政策,越需要由更高级别的领导所强调、由更高规格的会议所通过。“五水共治”便是上由省委书记牵头、由高规格的省委全会讨论通过,下由X县县委书记和县长亲自担任领导小组组长负责实施和落实的。在当前我国法理型权威尚未正式确立之前,我国社会治理的人治色彩依然很浓,领导的高度重视一般会被认为是工作取得成功的关键。

所谓运动式治理的政治挂帅,就是说运动式治理往往既是一项政治要求,同时也被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所谓政治要求,就是上级领导或上级领导部门的要求,领导的坚定意志必须得到执行,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对于政治任务,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去理解。其一,体现领

导意志。因为领导意志的最终实现必须借助于常规行政管理系统,领导的意志常常通过相应的程序转化为官方正式的集体的意志,有的甚至可以转化为政策、法律。其二,政治组织机构是落实政治任务的保障。“五水共治”便是从省到县市(甚至到乡镇)都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办公室。例如,X县成立了由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的县“五水共治”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抽调了专职人员17人,X县水利、农办、环保、建设规划、农业等部门和各乡镇(街道)均成立相应的工作机构^[9]。其三,政治纪律是落实政治任务的“红线”。所谓“红线”就是谁也不能碰。X县在召开本县“五水共治”动员会不久即由县委常委会议讨论公布了“五水共治”工作禁令。该工作禁令的出台,一方面反映了执法和守法的机会主义倾向,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政府管理部门需要借助这一运动来推动常态机制下难以推进的工作。

2. 文山会海:一种工作实施的主要方法

运动式治理的第二种动员技术是会议和文件。尽管中央八项规定对于会议和文件都作了简化要求,但这只是原则性规定,针对的是一般性的会议和文件。对于地方政府而言,面对特殊情况、政治任务,会议和文件不但不能减少,反而要增加。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彰显地方政府对该项治理运动的高度重视和扎实推进。

会议和文件向来是行政领域的常规性治理工具。只不过法理型权威越是充分有效的国家,其会议和文件出现的频率就越低。因为法理型权威强大的国家常常是法治高度健全的国家,社会治理的手段主要是常规的行政规则和法律体系。而在非法理型权威的国家,由于规则 and 法律的权威尚未真正树立起来,社会治理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靠领导的意志。

表2 政治运动与运动式治理的区别

对比项	政治运动	运动式治理
动员主体	领袖、中央政府	各级政府、政府部门、领导干部
动员对象	干部和群众	以干部为主
动员范围	全国性	局部性、地方性
动员目的	实现领袖意志,追求革命纯洁	实现领导意志,破解治理困境
推动机制	以观念强制为主	以权力强制为主
行动效果	浪费资源,百姓遭殃	可以治标,但不治本

会议作为一种工作方法或动员技术,其优势主要体现在:一是在会议现场可构建领导与下级的权力关系。话语权是权力的重要体现。会议现场的台上与台下的布局、发言者的滔滔不绝与听众的沉默不语的强烈对比、领导意志观念的鼓动和传递与听众默默记录和领会的区别,无不凸显出政治领域中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格局。二是会议具有统一思想、下达任务、明确奖惩的重要功能。会议的现场感和权力秩序感,会让参会者具有更强烈的参与感和紧迫感,使得会议所要达成的一系列目的、任务更加容易实现。例如,针对“五水共治”,就召开过从省级到村级干部的视频动员大会。这种直接借助会议落实工作的方法,尤其适合运动式治理,可以更好地凸显领导和上级部门的高度重视。三是会议形式多样,可以应对不同阶段的不同工作重点。比如,在运动开始阶段,会有动员大会、誓师大会、部署会等;在中间阶段,会有讨论会、座谈会、推进会、研讨会等;在最后阶段,会有反馈会、考核会等。

在中国政治的运作中,文件是一个重要的构成^[10]。文件是党政部门决策的载体和领导意志的外化,也是行政系统执行人员的行动依据。文件往往与会议相伴随,因为文件的内容往往需要靠会议去传达。开展运动式治理,更离不开大量有针对性的文件,如重要会议通过的决议文件、主要领导讲话文件、各类规定规则文件、各种实施方案文件、计划规划文件、总结汇报文件、考核要求文件等。

3. 项目化运作:“打包”与“抓包”

运动式治理的第三种动员技术是以“打包”和“抓包”为主要特征的项目化运作。所谓“项目”,在此是特指中央对地方或地方对基层的财政转移支付的一种运作和管理方式^[11]。所谓“打包”,就是指按照某种发展规划和意

图,把各种项目融合或捆绑成一个大的综合工程,使之不仅可以利用财政项目政策来动员使用方的资源,而且可以加入地方意图,借项目之势,实现目标更加宏大的地方发展战略和规划。而“抓包”既是地方政府打包过程的延续,又是村镇主动争取项目的过程。

具体而言,“五水共治”的“打包”就包括了项目的融合和资金的融合,即地方政府在国家或上级政府部门的转移支付或专项资金补助下,将原本分散的项目融合包装成一个大的项目。例如,X县将原本属于水利部门的饮用水工程、水库建设、河道整治、防洪堤坝建设,属于城建的污水管道铺设工程,属于环保的污水处理工程,以及属于城建、国土、农办的农村环境整治工程等项目,综合列入“五水共治”项目,并且将各种项目资金统一在新的项目名义下使用。例如,X县在2014年工作总结中就提到,2014年县财政安排10亿多元用于“五水共治”重点项目建设,制定下发了《X县2014年“五水共治”项目投资计划》,共涉及治水项目59个。其中,治污水项目计划投资53422万元,防洪、排涝水项目计划投资34294万元,保供水和抓节水项目计划投资15802万元。为确保治水资金到位,积极向上争取国家、省级生态补助和项目补助资金,还整合县财政、发改、水利、农办、环保、建设规划、农业等资金,以做到集中力量办大事。^[9]

除涉及“五水共治”项目本身各类项目被打包整理并加入X县自身的发展意图外,X县还围绕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五水”工作,将X县开展的其他工作如新农村规划、旅游规划、产业发展规划,以及小城镇建设、美丽乡村建设、中小河流重点县建设、森林城市建设等各类建设内容与之结合起来^[9]。这种“打包”加综合的操作方法,其原因之一即

在于地方政府要应付各级政府部门的不同指令和不同考核要求,在实用主义的考量下,一个项目有时候既可以用来作为某一个上级指令的成果选项,同时又可以被用来应付另一个与之相关的上级部门考核。比如,农村环境整治项目,既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项目,也可以作为“五水共治”的工作内容;河道整治既是美丽乡村建设或中小河流重点县建设的一项内容,同时也可以作为“五水共治”的工作项目。

“抓包”一方面是指本级政府抓上级政府或上级部门“发的包”(国家、省市或部门项目资助或财政转移支付),另一方面是指基层如村镇抓县级政府“打的包”(国家、省市、部门发包后通过县级政府整合后到达村庄)。前者主要是地方政府通过营造发展模式、打造地方特色,以及同上级政府部门甚至是私人搞好关系的方法来争取上级“发的包”,使上级的专项补助资金能够向本地倾斜。对于后者,即村镇“抓包”问题,其背后也有着相似的逻辑。X县下面的GQ村村支书在回答“五水共治”过程中“为什么县里和镇里会把那么多钱投给你村而不是别的村?道理是什么?”的问题时讲道:

首先,项目投入到哪个村,主要看领导对哪个地方关注得比较多。GQ村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是省级农房改造示范村,以文化旅游开发为主,上级领导到访频繁(2003年习近平曾来参观过)。这些项目既是各部门需要完成的相关任务,也是GQ村需要的配套设施。其次,项目投到哪个村,与该村的干部是否团结有关,也与主要干部的工作能力关系很大。如SQ村主任工作能力非常强,乡干部非常器重。乡镇现在喜欢“狮子型”干部,会冲,会干,会摆平。另外,乡镇干部现在普遍急功近利,热

衷于做能立竿见影的工作,如果项目三五年才会见成效,他们肯定不会感兴趣。因为他们往往热衷于见效快的、可以给他们带来政绩的项目。

通过对项目的“打包”和“抓包”,地方政府既能将多项常规工作纳入到运动式治理的项目框架内,完成上级政府的指令和要求,又能够从上级部门获得各种资金支持。地方政府可以将这些项目和资金投到对自己的政绩和形象提升帮助最大的村庄,在投放(实际上是转发)过程中,能够通过对投放对象的取舍达成对村庄的控制。

4. 运动式宣传:树立典型、营造氛围

运动式治理的第四种动员技术是以宣传机器全方位开动、树立典型和营造氛围为主要特征的运动式宣传。在运动式治理过程中,为了论证一项运动开展的合理性、必要性,也为了实现该运动治理的有效性,大张旗鼓地开展宣传活动是必不可少的技术或策略之一。

宣传是一门观念的营销艺术。它通过各种传媒技术,将宣传者的理念、追求,经过精心地包装和加工后,向受众进行灌输、宣传和推广,其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后者了解、认可、支持前者的主张和做法,以此为其特定治理策略提供民意上的合法性基础。宣传的性质和主要做法类似于广告学和市场营销学中的推广和营销:不断重复地播放、无孔不入地覆盖、简单明了的字眼、字面上的暖意和温情、有意识的方向引导等。尽管有些宣传本身被不少人指责为“选择性报道”(只报喜不报忧)、“倾向性引导”,但作为一项被党政系统熟练操作的技术,其在运动式治理中还是有诸多价值的。

那么在运动式治理过程中,宣传工具是如何发挥引导民意、论证运动合理性、体现政府执

政效能,以及全方位发挥运动式宣传的功能的呢?以“五水共治”为例可总结如下。

其一,突出领导的带头和表率作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而最好的榜样就是领导。领导的带头和表率作用的发挥,一是通过讲话,二是通过行动。讲话主要有会议讲话、电视访谈等,行动体现为实地考察等活动。在X县“五水共治”中,县级主要领导除第一时间组织动员大会、发表动员讲话、号召全县人民通过治水建设美丽X县外,还带领有关人员参与河道捡垃圾等活动。正如由该县水利局提供的新闻稿件上所提到的,2月8日上午,X县开展“五水共治”清三河活动,县四套班子领导及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共100多人来到母亲河永安溪石壁段清理垃圾,全面拉开该县节后“五水共治”行动序幕^[12]。突出宣传报道领导的带头和表率作用,主要是为了表达领导对于开展运动式治理的高度重视,以及工作本身的重要性,有助于接下来工作的推进。

其二,突出各部门各乡镇街道的积极协同配合。由于“五水共治”不单单是水利和环保等部门的工作,而是涉及到乡镇街道等基层组织的工作,所以就需要通过宣传报道营造一种各单位、各部门、各乡镇街道齐心协力、共同为“五水共治”献计出力的氛围。

其三,突出群众的广泛参与。随着“文革”式的政治运动退出历史舞台,运动式治理开始逐渐成为我国社会治理活动中的常态现象。运动式治理的动员对象虽主要是体制内的领导干部,但在宣传上则必须突出群众的广泛参与^[9]。因为只有突出群众的广泛参与,营造出干部、群众齐心协力的景象,才能更好地体现运动的合法性。

其四,突出典型人物、典型事迹和典型工程。创造典型、宣传典型向来是宣传工作的主

要内容之一。正如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所指出的,“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13]。树立典型就是宣传工作中一般与个别相结合工作方法的具体运用,旨在通过突出个别来引领和代表整体。“五水共治”作为一项运动式治理,也特别突出了对典型的宣传。例如,在全县开展“治水先锋·闪光言行”评选活动,对治水过程中涌现出来的一大批“治水先锋”进行挖掘评选;开展“治水标兵户”评选行动,选出“治水标兵户”2475户。同时,对评选的先进典型人物、案例,通过媒体进行总结推广,营造全民治水的良好氛围。^[9]当然,为了表明治理的严肃性,对于一些不良现象也要适当通过“抓典型”进行曝光。

其五,突出宣传形式的多样性。电视问政、征文、知识竞赛、文艺演出、演讲、讲座、宣讲、捐款等皆是运动式治理的宣传形式。如X县围绕“五水共治”就举办过电视问政,邀请大学教授开讲座,在乡镇开展“草根讲师”宣讲等活动。这些多样化的宣传形式,可以较好地营造出一场领导重视、利国利民的运动正在有条不紊地开展的景象。

其六,突出外界的好评。借他人之口来评价自己、宣传自己,是宣传操作的重要技术之一。因为他人评论,会在外观上给人以更加客观的印象。上级领导批示、外界媒体报道、群众的正面评价等皆是这种宣传技术的常用方法。例如,X县“五水共治”工作情况总结中就提到,“全民治水”的工作方法受到了省政府顾问王建满的批示肯定,同时也得到了省市“五水共治”督导组的好评^[9]。浙江在线、浙江水利网、《TZ日报》等省内媒体频率较高地转载X县关于“五水共治”的新闻,以及全国性的媒体如

人民网、《中国建设报》等媒体专题报道,都对该项运动加分不少。在有关“五水共治”的新闻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大量关于群众高度评价政府终于给了农村一个整洁的环境这样的报道。这些来自各方的外界好评,共同营造了运动式治理工作的一种领导高度肯定、群众非常满意、工作开展卓有成效的喜人局面。

三、结语

国家常规治理机制的失效及其所面临的现实难题,是政府采用运动式治理的根本动因,这一做法具有一定的历史惯性。运动式治理的首要目标不是治本而是治标,而在治标的过程中,为了快速有效地开展工作,原本常规的工作往往被泛政治化地解读与处理。运动式治理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往往被各类频繁的会议和文件加以反复强调,这种政治任务在实际的落实过程中,往往以项目化操作的形式被包装处理,政治任务项目化操作反映了不同层级政府部门之间的互相博弈。在整个运动式治理过程中贯穿始终的是宣传,可以说,运动式治理所达成或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是同宣传机构的塑造和打造密切相关的。实际上,在我国社会治理行为中,运动式治理业已常态化,也就是说运动式治理一个接一个地发生,只是它们发生在不同的领域,持续的时间长短不一。随着时间的推移,类似于X县“五水共治”的运动式治理机制会逐渐转为常规机制,直到新的运动式治理机制出现,以应付那已经呈现治理失效的机制(如治水机制)。

事实上,对运动式治理问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更早。根据周雪光^[7]的研究,孔飞力在其《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和黄仁宇在其《万历十五年》中就已经对国家为应对常规官僚制度失效而采取的超常规行动的逻辑进行了

分析,只不过没有明确使用“运动式治理”这个词。周雪光^[7]认为,中国社会治理的困境由来已久,运动式治理在历史上就曾反复发生过,即当常规机制失效时,天子常常会中断常规机制而启动运动机制。但当运动机制不断启动、不断打破常规机制后,常规机制和运动机制的边界会变得模糊,运动机制本身不断被常规化、常态化甚至同化后而陷入惰性和无效当中。当前中国正在发生的各种运动式治理,实际上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今天的国家领导人与当时的国君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如何统治——或用今天的术语来说,如何治理——一个辽阔庞大的国土以及居住其中的数以亿万计的民众?^[14]

实际上,政府部门对运动式治理的局限并非一无所知,政府部门在某些运动式治理的实施方案或者工作总结中,也经常提到建立长效机制,如在X县“五水共治”的工作情况汇报材料中就提到要建立并完善“五水共治”长效监管机制。可见政府本身也是意识到运动式治理并非常态,建立长效机制使治理常态化,才是政府治理的目标之一。

因此,讨论运动式治理,不得不让我们进一步思考如何能够摆脱那种不断地陷入运动式治理陷阱的深层因素。因为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

参考文献:

- [1] 刘效仁. 淮河治污:运动式治理的败笔[EB/OL]. (2004-06-03)[2018-07-20]. [http://www. people. com. cn/BIG5/huanbao/1073/25429-93. html](http://www.people.com.cn/BIG5/huanbao/1073/25429-93.html).
- [2] 冯志峰. 中国运动式治理的定义及其特征[J]. 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2007(2):29.



引用格式:周文娟.“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变革路向研究[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6):62-70.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8.06.008

文章编号:1009-3729(2018)06-0062-09

“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变革路向研究

Study on change direction of educational reform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lus era

周文娟

ZHOU Wenjuan

南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通 226019

摘要:人工智能技术是实施“人工智能+教育”的先决条件。它在通过收集与解释信息来感知和描述事物方面具有认知、预测、决策和集成解决四项功能,影响和规约着今后教育改革的实现方式与发展路向。人工智能在产生碎片化学习与深度学习、催生与之对应的认知理论、代替教育者完成程序化重复劳动、促使教师职能转变、倒逼学科设置优化等方面,直接影响教育变革。“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变革的路向,应以互联网思维整合全球优质教育资源,以实现扁平化连接,使教育变革服从于经济全球化创新人才培养定位,进而就课程设置、教育资源、教育模式、技术平台、学习机制、教学评价和教育管理等方面,展开教育系统的全方位重构。

关键词:

“人工智能+”;
碎片化学习;
个人知识管理;
扁平化链接;
O2O 教学模式;
技术平台

[收稿日期]2018-09-10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信息化研究课题(20172165)

[作者简介]周文娟(1968—),女,山东省青岛市人,南通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融合。

人工智能研究的历史已有 60 多年,国家的支持是人工智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美国政府长期支持人工智能的研究及其在各个领域中的应用,将“大脑计划”“先进制造”“智慧城市”等作为其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欧盟 2009 年开启“蓝脑计划”,2013 年启动“人脑计划”,2016 年建设了神经信息、大脑模拟、高性能计算、医学信息、神经形态计算、神经机器人六大平台;2015 年,日本发布“机器人计划”,并拟以 10 年投入千亿日元巨资用于研发人工智能;2016 年美国又发布了《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好准备》和《国家人工智能研发战略规划》报告。发达国家的这些举措直接促进了全球人工智能的开发应用。

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亦发展迅猛。2016 年 5 月,国家发改委等部委联合发布《“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计划 2018 年培育形成千亿级人工智能市场的应用规模。随之由乌镇智库发布的《乌镇指数: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6)》明确提出,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主要为智能评测、个性辅导、儿童陪伴等。2017 年 3 月,我国《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列入“人工智能”相关内容,同年 7 月国务院又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对“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方向进行具体指导。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人工智能+教育”的研究亦十分踊跃。截至 2017 年 12 月,“中国知网”全数据库检索发现相关文献 476 篇,其中闰志明等^[1]界定了教育人工智能的内涵,马玉慧等^[2]研究了我国人工智能教育的应用发展路径,刘清堂等^[3]对智能教学技术进行了展望,彭绍东等^[4-8]对人工智能与未来教育展开了广泛探讨。综上文献分析,“人工智能+”正全面影响我国当代教育的变革与发展。

然而,当前教学变革并非一帆风顺,学校教育尚未能系统整合和发挥网络信息技术的集成优势,“人工智能+教育”依然停滞在“传统教

育+网络信息课程”的简单叠加状态,难以满足信息时代随时随地学习的需要。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信息技术应用尚流于形式,虽有慕课等开放课程和多种在线作业批改等教学形式,但这些貌似信息技术化的教学仅是将线下课堂搬上了网络,其实质仍是信息技术辅助教学的基本形态。其二,慕课虽在解决教育公平共享等方面成效凸显,使学校教育告别几十年一成不变的传统教育模式,然而,其教学模式与学科教学对应不足,教学形式单一,规模浩大但师生沟通寥寥,知识吸收内化环节不同程度地被忽视。其三,虽然当前可用于教学的各类资源如知识库、学习平台和作业批改网比比皆是,但这些教育资源各自为政难以被充分利用,教育资源优化整合举步维艰。其四,由于缺乏系统研究,难以形成完整的变革思路,信息递送平台和管理体系建设薄弱,教学变革雷声大雨点小,难有实效可言。

综上现状分析不难发现,学校教育亟需基于人工智能,展开教学系统重构的系统性研究,实现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线上线下资源、教学、管理等系统的深度融合,创新动态开放的课程构成和教学模式,改变教学机制与学习范式,进而构建智能化、精准化、个性化的教育新常态,使“人工智能+”教育变革落到实处。鉴于此,本文拟通过辨析认知人工智能的功能效用,对“人工智能+”对教育变革的影响、变革理念与实现路径展开深入探讨,以推动“人工智能+教育”的发展,提高学校教育实效性。

一、人工智能的功能效用

互联网在经历了信息单向展示的 Web 1.0 门户时代(1994—2002)、用户可参与信息生产实现双向互动的 Web 2.0 搜索/社交时代(2002—2009)、移动互联并初步智能互联的 Web 3.0 大互联时代(2009—2017)之后,于 2017 年正式进入了当下以信息过程模拟人的

思维意识并服务于人的“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 AI)时代。

智能系统包含动态感知、智慧识别、自动反应三要素^[9],人工智能的主要功能效用是构建算法模型以替代人的工作,并在与人的交互中使算法模型不断优化,从而更加智能地服务于人。也就是说,人工智能技术具有收集与解释信息来感知和描述事物的认知、预测、决策和集成解决四项功能。认知功能是指通过收集与解释信息来感知并描述世界,如图像识别、语音转换文本等;预测功能是指通过推理来预测行为和结果,如搜索引擎可根据用户行为推荐广告、电影等;决策功能是实现具体目标,广泛应用于路线规划、新产品研发等;集成解决功能则是指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等介质结合生成的多种集成应用,如自动驾驶、手术机器人,以及能够响应外部刺激的家用学习机器人等。上述人工智能的基本功能均适用于学习。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网络信息技术建构了有史以来人类相互之间最广泛且最直接的信息沟通渠道,人工智能就是建立在这一技术基础之上的。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既能以标准化资源满足数亿用户的普遍性需求,又可依据不同用户的特点,做出不尽相同的个性化反馈,进行动态化和有针对性的信息推送。人工智能可凭借无线传输、智能移动连接,在人与人、人与信息、信息与信息之间实现极低边际成本的信息聚集和智能互动,产生超大效应的规模信息,使知识信息有效流动,并快速更新迭代。人工智能技术是实施“人工智能+教育”的先决条件,其功能特性始终影响和规约着今后教育改革的实现方式与发展路向,因此研究教育智能化必须从认识人工智能的基本功能效用开始。

二、“人工智能+”对教育变革的影响

2017年被称为“人工智能元年”。自智能

程序 AlphaGo 战胜世界顶级围棋手李世石那一刻起,人工智能热潮便顷刻之间席卷全球且愈演愈烈。目前人工智能不仅被写入我国政府工作报告,还被列入中国“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规划^[9],上升为国家战略部署。我国《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明确要求,“要在各级各类学校逐步建立由校领导担任首席信息官(CIO)的制度,全面统筹本单位信息化的规划与发展”,并要求“各级各类学校要主动把教育信息化纳入本校总体规划,深入开展信息化教学与管理应用”,“将教育信息化作为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纳入学校建设基本标准和区域、学校评价指标体系”,“切实落实国家关于生均公用经费可用于购买信息化资源和服务的政策”^[10]。由此可见,人工智能已成为继“互联网+”和虚拟现实之后信息技术的又一崭新爆破点,将给各行各业带来巨大的机遇和挑战,亦将无可避免地影响当代教育变革的发展进程,并在以下方面对教育变革产生直接影响。

1. 产生碎片化学习与深度学习

人工智能借助于高度发达的网络传输技术实施智能化信息推送,使知识信息获取便捷快速,由此产生出日趋常态化、无所不在的碎片化知识获取方式。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2016年我国成年国民数字化阅读方式(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iPad 阅读等)的接触率为 68.2%,较 2015 年的 64.0% 上升了 4.2 个百分点;从人们对不同媒介接触时长来看,成年国民人均每天手机阅读接触时间最长。我国成年国民人均每天手机接触时长为 74.40 分钟,比 2015 年的 62.21 分钟增加了 12.19 分钟。^[11]可见,在移动互联网日臻智能化的今天,高度个性化的知识学习方式已经在全社会悄然普及。

深度学习的本质是构建一种具有多种隐藏层的机器学习模型,通过进行海量的数据训练,获取具有价值的特征,最终实现正确的分类或

准确的预测^[12]。深度学习^[13]正是通过应用基于卷积神经网络^[14]的学习机器设备,以日臻智能化的教学辅助手段,帮助学习者在掌握一定认知规律的基础上进行高效度的知识强化训练,使学习者的认知能力与学习成效得到更为有效的提升。

2. 催生与之对应的认知理论

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碎片化和移动学习的知识信息获取方式,已大大溢出了知识内化建构的认知边界,使传统教学研究所倚重的行为主义、认知主义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已无法诠释上述学习动机改变的机制^[15]。随着网络时代应运而生的关联主义,充分揭示了信息技术条件下知识获取机制的普遍规律,认为知识信息是一种可以无限连接的网络,在知识信息网络中每一学习个体、资源库和客体事物都可能成为一个知识节点;所有节点的相互连接形成知识网络,网络节点之间知识信息的传递流动产生知识流,并在传递流动中会被不断更新迭代。关联理论认为,网络信息时代的知识探索已经在人脑智力结构之外发生,信息终端设备和技术操作正成为人类知识获取和储存的另一重要途径。也就是说,随着信息与传播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人类学习方式最终必然走向人工智能化。作为一种系统的学习理论,关联主义认为学习者随时获取的碎片化知识信息,必须经过逻辑性整理,才可深度聚合形成系统的知识结构,因此倡导学习者应依据个体学习目标,通过归纳、分类、组织等科学管理手段,使其不断更新转化为可系统应用的知识库存,形成知识结构并付诸应用。基于这样的认识,关联主义提出了“个人知识管理”(Personal Knowledge Management,简称PKM)的知识管理策略。PKM具体包括:明确自己的信息需求;制定知识获取计划;设定信息等级,确定哪些信息可以丢弃,哪些信息需要收取;确定如何和何时处理信息;为需要归档和保存的知

识建立规范;创建个人的文件系统,可以兼顾管理自己的学习、生活和其他知识活动;为不同用途建立信息目录、书签和索引;经常评估/评价所存储信息和目录的价值,并适时更新。^[16]

3. 代替教育者完成程序化重复劳动

不断减轻人类劳动是技术持续进步的主要动力。因此,开发人工智能的目的是为了把人类从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使之有更多的精力去从事高价值的创造性劳动。当前,可供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技术主要有语音识别、图像识别、人机交互等。语音识别和语义分析技术,可卓有成效地辅助教师开展口头教学,纠正学生获得的部分不正确知识等;图像识别技术则可以帮助教师从事教学排课、阅卷批改等工作;而人机交互技术可以协助教师为学生在线答疑解惑。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的机器人助教代替人类助教与学生在线沟通交流竟无学生发现,这充分表明了人工智能在这方面的应用潜力^[17]。总之,“人工智能+教育”最重要的作用,是帮助教师摆脱程序化重复劳动的束缚,使其能够有更多的精力去创新。

4. 促使教师职能转变

如上所述,人工智能不仅在教育技术层面,而且在知识传播和知识研究层面将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也就是说,“人工智能+”终将促使教育以机器代人实现智能教学。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教育人工智能能够完全取代教师。因为从教育本质的角度审视,教师不仅需要传授知识,更需要以思想情感引导塑造学生的内在品德素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形象地将教育比作是用一颗心灵唤醒另一颗心灵的心灵培育工程。教师作为这一工程的实施者,他们所具备的情感、智慧与创造特质,远非现在的人工智能所能企及。从这一角度来看,不管未来人工智能在知识搜集、数据分析储备、信息传播路径与手段方面将有多大幅度的提升,人类教师的善良等精神特质仍然是

人工智能无法替代的。

因此,教师在坚定自身教育责任与义务的同时,也应认识到在“人工智能+教育”条件下,教师亦亟待转换自己的现有角色,开拓变革思路,以重新认知人才培养目标,将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转变为创新教育的契机,及时实现教师职能由知识输出者向教育引导者转变。

5. 倒逼学科设置优化

“人工智能+”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领域,在其带动相关领域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会对某些领域造成冲击,致使这些领域的工作岗位不断被取代或改变。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语音数字技术,对于外语翻译行业的挑战便属此例。总之,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正迫使学校教育不断调整学科专业方向与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包括设立新学科、改造传统学科和撤销某些不合时宜的、过时的学科,倒逼教育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需求。当前,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发展战略,迫切需要加快国际型人才培养,而迅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正是倒逼学校教育加速优化学科设置、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动因。

三、“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变革的理念与实现路径

如上所述,“人工智能+教育”客观地发生在教育价值出现全球化取向、学习认知发生颠覆性改变,以及人工智能学习方式显示全天候、移动性和碎片化转向等多重变革的社会环境之中,而并非少数人的突发奇想。“人工智能+教育”开启的教育变革,除需要与日趋智能化的网络信息技术实现深度融合外,还需要针对人工智能的功能特性,以互联网思维整合全球优质教育资源以实现扁平化连接,使教育变革服从于经济全球化创新人才培养的定位,进而就课程设置、教育资源、教育模式、技术平台、学习机制、教学评价和教育管理等,进行教育系统

的全方位重构。

1. “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变革理念

教育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柱资源,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结构的全部构成要素。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标准是教育的根本依据。教育变革不可仅囿于一般教学方法的探索,必须依据国家发展战略与时俱进地变革教育理念,调整学科设置,精准定位培养目标。与此同时,还需要在此基础上整合一切技术与社会资源,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和教育水平。实施“人工智能+教育”的变革,虽然尚不足以解决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全部教育问题,但它必然会成为当代教育变革不能回避的根本任务。

社会发展是教育变革和教育发展的源动力。不久前,我国提出提升中国国力进而繁荣全球的“一带一路”倡议,教育变革无疑要呼应国家这一宏伟战略决策。也就是说,当代教育不可仅满足于对学生的单一专业能力的有限培养,更需要关注学生通晓国际文化、具备国际意识与视野的培养,需要使他们在具备专业知识的同时,掌握敏锐洞察、有效沟通、解决国际问题的能力、持续保持国际先进水平并不断更新知识的能力。总之,当代“人工智能+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必须是突破专业技能和一般性交际能力界域,国际视野和全球化实战能力兼具的综合人才。

2. “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变革的实现路径

(1) 优化课程设置

人工智能所具备的技术能力,为“人工智能+教育”的国际化课程设置、获得更为广阔的资源优选空间,以及更加高效的信息传输途径,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为切实造就具有国际视野和全球竞争力的创新型人才,课程设置首先应突破现有专业局限,延伸必要的国际化教学内容,并在丰富多彩的教育资源基础上,加大解决国际性问题能力的实践课程比重,提

升学生专业知识的内化和实际应用能力。

当前我国学校教育教学结构中,人们大多将知识内化不足归因于学生过度依赖教师讲授,普遍认为是学生自主学习意识薄弱,致使课程设置脱离现实应用、授受形式缺乏更新,以及课程知识滞后社会发展。因此,“人工智能+教育”课程设置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利用大数据跟踪技术扁平化连接教育资源以实现国际共享,进而设定动态开放的课程结构,以具有国际视野的知识信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只有实现这样的课程设置,才可能实现国际化能力培养的教学目标。

(2) 整合教育资源

众所周知,教育资源是进行教育教学的基本要素^[18],直接关系教育的规模和成效。然而,当前学校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网络开放资源的质量不高,未能形成应有的知识结构系统,严重制约我国整体教育水平的有效提升。因此,“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变革亟待面向全球整合更多教育资源,以卓有成效地提高教育成效。

扁平化是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变革的重要资源策略,产业链思维形成学校教育资源的多向度扁平化生态链接和充分共享,不仅可以有效地克服学校教育形式固定、重复的弊端,有利于开展各种不同层次的精准教学和个性化学习,还可以大幅度减少教育资源建设费用^[19]。因此,充分利用互联网低边际成本和巨大规模效应优势,整合优质教育资源使之形成多方优质教育资源相得益彰。不断优化的扁平化生态链接,是弥补当前学校教育优质资源不足的重要途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主动介入国际教育序列,参与全球性教育交流活动,落实全球优质资源的链接共享,与时俱进地跟进全球教育的发展。近年来,国家十分重视国际教育交流,全国公立高校大多有教育部支持的国际合作办学项目。尽管目前仍有部分

国际名校对此持谨慎态度,未能与我国高校全面建立对等合作,但鉴于全球“人工智能+教育”的发展态势迅猛,更大空间范围内的国际教育资源整合势在必行,与更多国际名校间优质教育资源的扁平化链接共享指日可待。

(3) 融合教育教学模式

毫无疑问,“人工智能+教育”需要与之匹配的教育模式方能取得应有的效果。在学校教育中,教育模式是教育的逻辑系统,是构成课程、教材、教学活动的规划。区别于教学计划的具体性和可操作性,教育模式是以一定教育思想建立起来的教育程序框架。当前,快速发展的物联网已由PC走向个人移动终端,线上线下(O2O)已成为当代社会生活的新常态,并上升为人工智能时代颠覆传统价值思考的法则。这就要求“人工智能+教育”必须实现线上线下深度融合,采用教育手段多样化、学习形式泛在化、线上线下教育资源和空间融合的O2O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符合当今时代移动化和碎片化的信息接受方式,能集聚大量协作教学的链接资源与国际化课程,创新课程结构、教育资源、教学评价与教学环境,打破地理时差实现跨时空的互动交流,协调完成课程教学。

(4) 搭建技术平台

“人工智能+教育”除采用线上线下的O2O教育模式外,还需要建立与之相应的教育技术平台,以支撑跨越时空的教学互动和交流体验。这样的教育技术平台,需要适合手机、平板、智能穿戴和机器人设备,以及家居家电等一切终端设备应用。具体来说,“人工智能+教育”技术平台需要具备以下方面的基本技术功能^[13],方可满足各学科专业教育选择使用。

其一,在线与离线的语音合成功能。在线语音合成是将文字信息转换成声音信息,由音库提供多种具有不同特色的发音以供学习者选择。现有技术已经能够使合成音在音色、自然

度等方面接近实现一般人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教学语音标准。离线语音合成虽也是将文字信息转换成声音信息,但其具备离线语音合成的功能,即不联网也能让机器像人一样开口说话。这些合成语音一般都由多音色、多语种丰富的情感语料合成,可依照需求选择合适的音量、语速,让合成的音色自然逼真。当前的语音合成技术还能够满足专属个性的语音定制需求,只需要提交个性化发音人的语料,即可为学习者提供深度个性定制的语音发音,并可使用智能硬件使学习者跟机器进行语音信息交互。

其二,语音听写功能,即使用语音输入法将语音信息转换成文字信息,以增强阅读体验。当前,把语音以 ≤ 60 秒的速度转换成对应的文字信息,让机器能够听懂人类语言并达到超过95%的准确率,这也是人工智能的一大技术能力,已具备支持中英文多语种与粤、豫、川等方言识别,以及以180字/分的语音输入速度方便快捷地实现信息沟通的技术能力。人工智能还可基于用户语音特征建立个性化的词条语言模型,用于调整识别参数而持续优化识别效果,提高个性化词条识别准确率。由于使用超大规模语言模型,语音听写对所识别语句能智能预测其对话语境,同时具有提供智能断句和中英文标点智能预测的能力。

语音听写功能包括语音转写、语音评测和机器翻译等功能。语音转写作为人工智能的一项强大功能,其基于深度全序列卷积神经网络能为信息处理和数据挖掘提供基础,目前可将5小时内时长的音频转换成相应的文本数据。这一技术可将学习交流通话转换成文字存稿,以利后期快捷检索和使用学习信息。

人工智能语音评测对于语言学习而言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功能,通过智能语音技术,软件系统可自动对接收到的语音做出水平鉴定,对发音正确与否进行评价和问题分析。其核心技术包括标准发音水平自动评测、发音水平自动评

测和不同语种发音自动比对评测三个部分,目前涵盖中文和英文两种语种,提供字、词、句的标准与流畅度的评分语言考试,亦可应用于各类口语考试和协助日常教学、辅助课堂作业布置,从而提高教学效率。

机器翻译则是大量国际化课程链接教学必不可少的技术支撑。机器翻译基于神经网络翻译框架,通过整合注意力网络机制和循环神经网络,完美模拟人脑翻译机制生成流畅的译文,目前支持中、英、日、韩等多种语言语音到文本的互译翻译。这一技术能够地道、流畅且忠实地表达原文内容,可辅助快速阅读、文档资料翻译、日常社交沟通与外语口语学习等。

(5) 创新学习机制

传统意义上的学习机制是学校教育体制的产物,而“人工智能+”的学习机制则是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深度学习的具体体现。如前所述,高速发展的网络和人工智能信息技术,使碎片化学习等泛在学习方式日益常态化。但这些碎片化、间断性学习方式所获得的知识信息,并不能直接建构起完整的知识结构系统以应用于工作实务。因此,需要立足“人工智能+”和深度学习技术功能,以PKM汇集归纳整理碎片化知识信息,实现信息加工和知识系统建构。当前“一带一路”建设对国际化人才的需要,要求我们改变以往重在记忆和再现知识的传统教学方法,全面强化学生的知识应用与再学习能力。为此,需要引入AI深度学习的智能化功能,打破时空地域范围,超越以教师和书本为传播载体的传统教育方法和教学体制,综合利用人工智能知识信息链接、个性化跟踪反馈等功能特性,建立适应瞬息万变的全球化竞争挑战的教学机制,帮助学生自主建构个性化的专业知识结构体系。

(6) 构建多元教学评价体系机制

不同于传统教学评价,“人工智能+”条件下的教学评价要求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隐藏

在数据之中的事物相关性。也就是说,“人工智能+”条件下的教学评价,必须具备海量多样的数据、高度适合的技能组合、优化的数据平台、功能强大的数据分析工具,以及可扩展的灵活计算与存储架构,对学习者的个体学习状态和线上线下的教育教学成效做出全面评价。总之,就“人工智能+教育”而言,其大量在线教育资源和线上线下师生沟通渠道,以及国际间协作教育的授课成效等,都需要应用大数据技术手段对教育教学进行准确有效的评价。

区别于传统课堂终结性评价方式,“人工智能+”条件下的教学评价将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互联互通特性,使所有相关学生、教师和教育协作单位管理者共同参与其中,在对当前教育与学习成效做出评价的同时,更多关注个体全过程学习状态,强化教育过程和个体学习成效的过程性监督指导。“人工智能+”条件下的教学评价是一种形成性、总结性、全过程的双向乃至多向性成效评估,将对教学计划制定、学习方法选择、学习成效考核等线上线下教与学的全部内容展开系统评价。其中,形成性成效评估重点关注学生各阶段学习状态;总结性成效评估则体现为对学生专业知识技能掌握程度做出具体评定;双向乃至多向性成效评估则表现为所有评价都将学生包含其中,以便学生了解自身学习状况,改进学习方法,明确继续努力的方向。总之,“人工智能+”条件下的教学评价,目的在于引导学生由知识积累型学习向知识创造型学习转变,培养其为应对全球化竞争而持续学习的自觉意识与能力。

(7) 建立完善教育管理机制

促进学生自主深度学习,需要将大量结构化的教育资源投放线上平台,实现课程结构、教育资源、教学评价与教学环境线上线下全面系统融合,以保证教学效果。因此,不仅所有教学环节都必须具有与之匹配的信息技术设备条件,还需要建立完善与之相适应的教育管理

机制。

也就是说,“人工智能+教育”需要完善的教育管理运营体系,方能保障其最终的教学成效,而并非线上线下教学的简单叠加。因此,除课程设置、教育资源、教育模式、技术平台、学习机制、教学评价变革外,尚需建立线上线下同步管理的相应运行机制,对教育资源协作和教与学的各过程环节进行全方位的监督管理。

“人工智能+”条件下的教育管理需要建立智能化教学平台,通过人机交互和信息自动识别转换实现数据的管理、查询和监控,有效地衔接整个教学系统。这一管理运营体系涉及教师、课程、授课班级、测评打分等一揽子相关教学信息,能够实现对综合评分、分析统计、后台管理、数据库设计、动态网页设计和安全管理的智能化管理,使相关人员通过相关用户界面即可智能地完成各项操作。例如,评分子系统自行智能测评、管理子系统自行对评分情况智能统计归纳,即可得出可供决策的分析数据;后台管理子系统对整体系统进行智能化的管理维护,可随时依据系统出现的问题和应用需求,对数据库所存储的数据进行智能化的查询、添加、删除、修改等具体操作。当前,我国明令将教育信息化作为学校基本办学条件,人工智能技术也已相当成熟,“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要尽快完善设备投入,就可以实现教育系统的智能化管理,从而形成教与学管理的有机闭环。

四、结语

“人工智能+”不仅是一项科学技术,也不仅只是一种教学应用方式,还应该成为一种审视问题、认识当下时代万事万物的思维方式。当这一新的认知逻辑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首先需要我们思考的是怎样使之付诸应用。本文基于这样的认识,从学校教育视角,以互联网思维对“人工智能+教育”的本质特性探赜钩沉,冀望借此洞察当前学校教育与国家发展战

略的有机契合点,把握教育变革的发展路向,探索教育变革的实现路径,借助于“人工智能+”使学校教育获得与时代协调一致的发展方向与速度。

参考文献:

- [1] 闫志明,唐夏夏,秦旋,等.教育人工智能(EAI)的内涵、关键技术与应用趋势——美国《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好准备》和《国家人工智能研发战略规划》报告解析[J].远程教育杂志,2017(1):26.
- [2] 马玉慧,柏茂林,周政.智慧教育时代我国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发展路径探究——美国《规划未来,迎接人工智能时代》报告解读及启示[J].电化教育研究,2017(1):123.
- [3] 刘清堂,王洋,雷诗捷,等.教育大数据视角下的学习分析应用研究与思考[J].远程教育杂志,2017(3):71.
- [4] 彭绍东.大数据时代网上学习行为研究的挖掘方法模型与应用[J].电化教育研究,2017(1):70.
- [5] 谢达.智能机器人在培养学生信息素养中的教学模式研究[J].中国教育信息化,2008(12):15.
- [6] 李杭波.有效开展智能机器人教学的策略研究[J].中国现代教育装备,2014(6):73.
- [7] 王竹立.面向智能时代的知识观与学习观新论[J].远程教育杂志,2017(3):3.
- [8] 朱永新,徐子望,鲁白,等.人工智能与未来教育笔谈(上)[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4):15.
- [9] 中国“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将新增“人工智能2.0”[EB/OL].(2017-02-15)[2018-09-10].<http://www.chinanews.com/gn/2017/02-15/8150641.shtml>.
-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的通知[EB/OL].(2016-06-22)[2018-09-10].http://www.moe.edu.cn/srcsite/A16/s3342/201606/t20160622_269367.html.
- [11] 全国国民阅读调查课题组.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主要表现[J].出版发行研究,2017(5):6.
- [12] DONG Yu,HINTON G,MORGAN N,et al.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section on deep learning for speech and language processing[J].IEEE Transactions on Audio,Speech,and Language Processing,2012(1):4.
- [13] HINTON G E,OSINDERO S,TEH Y W. A fast learning algorithm for deep belief nets[J].Neural Computation,2006(7):1527.
- [14] 田壮壮,占荣辉,胡杰民,等.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SAR图像目标识别研究[J].雷达学报,2016(3):320.
- [15] 周文娟.大数据时代的外语教育理念与方法的探索与发现[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94.
- [16] 吴国强.能动关联:“云”时代的设计学习理念与策略[J].远程教育杂志,2012(5):82.
- [17] 人工智能与教育四问[EB/OL].(2017-03-29)[2018-09-10].http://www.edu.cn/xxh/xy/jyjs/201703/t20170329_1502413.shtml.
- [18] 余胜泉.推进技术与教育的双向融合——《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解读[J].中国电化教育,2012(5):5.
- [19] 周文娟.智慧教育:“互联网+”视阈下的教学系统重构——基于O2O法则的教学变革思考[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5):153.



引用格式:孙杰,俞海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形势与政策”课的思考[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9(6): 71-75.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8.06.009

文章编号:1009-3729(2018)06-0071-0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形势与政策”课的思考

Thinking about Xi Jinping's socialist thou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ntegrating into the situation and policy courses

孙杰¹, 俞海洛²

SUN Jie, YU Hailuo

1. 中原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7;

2. 郑州轻工业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形势与政策”课是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新时代国内外形势的核心课程,是第一时间推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的重要渠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为“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提供了思想指引,也为其提供了丰富的教学素材。推动这一思想融入“形势与政策”课,是顺应时代发展的现实需要,是创新“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的迫切需要,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必然要求。当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形势与政策”课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设计中,如何利用第二课堂提升学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获得感,以及如何创新教学方式方法以增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吸引力与感召力。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形势与政策”课,应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设定和优化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式方法,丰富第二课堂。

关键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形势与政策”课;
第二课堂

[收稿日期] 2018-10-02

[基金项目]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团队择优支持计划资助项目(15JDSZK102);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2017SJGLX082);中原工学院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创新项目

[作者简介] 孙杰(1980—),女,河南省驻马店市人,中原工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俞海洛(1961—),男,浙江省宁波市人,郑州轻工业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2018年4月12日,教育部颁发的《教育部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形势与政策”课是理论武装时效性、释疑解惑针对性、教育引导综合性都很强的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第一时间推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的重要渠道^[1]。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理论武装,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2]。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本文拟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重要意义、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与现实路径,以期增强大学生的政治认同和思想认同,使其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与忠实实践者。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形势与政策”课的重要意义

学习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为“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提供了思想指引,也为其提供了丰富的教学素材。推动这一思想融入“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顺应时代发展的现实需要

从国际环境看,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的关键时期,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进程加快,这就造成了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碰撞;从国内环境看,当下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呈现“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的态势。在此背景下,亟需发挥科学理论的导向作用。中共十九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进了党章,成为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高校大学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接班人,需要学深悟透这一思想中所蕴含的价值

内涵、使命意识与担当精神,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断提升自身政治觉悟与理论素养。因此,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形势与政策”课,有助于增强大学生抵御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侵蚀的能力,使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与可靠接班人。

2. 创新“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的迫切需要

“形势与政策”课作为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新时代国内外形势的核心课程,承担着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大学生头脑的任务,这就要求我们与时俱进,紧跟时代步伐,掌握时代脉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为“形势与政策”课创新提供了理论指导,又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将这一思想融入“形势与政策”课是创新“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的现实需要。因此,我们应将党的理论创新最新成果,如新时代新发展理念、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全面从严治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内容,融入“形势与政策”课堂教学,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与实质,从而增强“形势与政策”课的时代感和时效性。

3.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2],足见党中央对青年的高度重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新时代各族人民的共同追求,也是新时代赋予青年的责任与使命。当代大学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力军,是将来实现中国梦的主体力量。大学生能否担此重任,能否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中站稳脚跟、有所作为,肩负起时代赋予

的历史使命,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要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形势与政策”课,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大学生成长,不断提升其思想觉悟、道德品格与文化素养,激励大学生将个人的理想追求与国家的长远目标结合起来,使其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力量。^[3]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形势与政策”课亟待解决的问题

教育部的《意见》为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提供了新内容,提出了新要求,也为改进和创新“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提供了参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科学指南^[4]。但在具体操作上,要推动这一思想融入“形势与政策”课,需解决以下问题。

1. 如何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形势与政策”课程设计中

“形势与政策”课是推动党的理论创新最新成果第一时间走进课堂的重要途径,如何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嵌到“形势与政策”课的课程设计与讲授内容中,成为我们亟待解决的课题。《意见》要求在教学内容上“把坚定‘四个自信’贯穿教学全过程,开设好全面从严治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港澳台工作、国际形势与政策四大类专题”^[5]。应该说,教育部的《意见》是对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的具体部署,它为“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设计提供了基本遵循。但在现实中,由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很丰富,如何将这些内容具体融入到课程设计中,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一问题,中央提出的提高大学生对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掌握水平、正确认识新时代国内外形势、掌握国家大政方针政策的要求才能落到实处。

2. 如何利用第二课堂提升学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获得感

第二课堂是相对课堂教学即第一课堂而言的,是在课堂教学之外的时间进行的与课堂教学相关的教学活动,其内容源于教材,也可以适当拓展,使其形式多样化。第二课堂作为“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重要环节,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在具体实践中,由于当前我国高校“形势与政策”课采取的授课形式是专题式教学,讲授的内容多是理论性的,第二课堂只起辅助作用,仍处于探索阶段,存在着课时安排较少、流于形式等问题,从而成为比较薄弱的环节。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性较强,如果仅仅依靠课堂教学,学生因缺乏足够鲜活生动的实践与亲身体验,无法解决情感体验、行为养成、意志锻炼等问题,无法真正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因此,如何利用第二课堂提升学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获得感,成为我们必须审慎对待的问题。

3. 如何创新教学方式方法以增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吸引力与感召力

当前,我国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育教学采用的仍是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一味地“满堂灌”,教学方法比较单一、手段比较落后,难以充分调动大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再加上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当代大学生,大多是“95后”“00后”,其自我意识、动手能力、实践精神与法制意识显著增强,追求自由、平等、个性、独立、创新、开放、民主等价值。在“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方式上,他们已不再满足于过去的“满堂灌”“一言堂”,厌恶空洞的“我说你听”的简单说教,更愿意通过课堂积极参与和表达自己的观点,渴望基于知识、阅

历、经验与人生等要素的互动对话与共享,来提高自己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如何在“形势与政策”课中创新教学方法,以增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吸引力与感染力,成为我们亟需解决的问题。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形势与政策”课的现实路径

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6]。而作为彻底的科学理论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完全可以也能够被群众所掌握。“形势与政策”课是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的重要途径。而要推动这一思想融入“形势与政策”课,必须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设定和优化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式方法,丰富第二课堂,使“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在内容、方法和手段等方面得到不断提升与优化,以提高教育的实效性。^[7]

1. 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前提

中共十九大提出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内涵非常深刻,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它是我党在新时代开辟新征程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是“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的指导思想。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形势与政策”课,首先应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其内容吃透吃准,从宏观层面上,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背景、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和历史贡献;从中观层面上,准确理解新思想、新矛盾、新使命、新征程与新方略;从微观层面上,正确把握一些基本概念与知识,如“新时代”“四个伟大”“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等。同时,对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义思想的解读,还要运用历史的眼光,将其放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长河中去理解、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去理解、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去理解,真正让该思想在“形势与政策”课的思想沃土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2. 设定和优化教学内容是根本

“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的调整、补充与完善,亟需优化教学设计,构建政治性、时效性、思想性兼具的内容体系。高校应增强对“形势与政策”课程的重视程度,设定和优化教学内容,确保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

一方面,在内容设置上,应根据《意见》开设党的建设、经济社会发展、两岸关系与国际问题四大专题,具体包括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开启建设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全面认识新时代新征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准确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走中国特色乡村振兴之路、金融危机10年后的世界经济、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专题。在载体上,应采取生动活泼的形式,如通过形势与政策报告会、座谈会、研讨会等形式推动新思想进课堂、进头脑;在方法上,应创新教育教学方式方法,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扩大优质课程的覆盖面,提升“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效果。

另一方面,应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活化融入,既要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等热点问题给予关注,也要对学生的所思所想所需给予关注,从一个一个的故事、常识、具体事例讲起,从中引出深刻的道理。同时,应加快构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课程体系,将中共十九大提出的新思想、新论断、新战略、新布局写入教材,做好教育部统编教材与自编教材彼此的融入,以提升学生对理论的认知和接受效果。

3. 创新教学方式方法是抓手

当前在校大学生群体基本为“95后”“00后”,

这类群体更具有全球化视野、立体化知识结构与个性化表达习惯,对“形势与政策”课授课的内容和方式要求更高,所以亟需推进教学方式方法的创新。具体来说,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其一,创新教育模式。应采用“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开放性教育模式,突出学生的主体性。可通过实施小班教学、分层教学,探索实施翻转课堂,让学生参与到课堂上来,与老师同学相互交流、探讨,实现信息的多向流转与深层互动,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其二,注重课程平台建设。应充分利用大数据与互联网平台,构建“形势与政策”慕课,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慕课平台,加强线上线下的联动互动,深化对理论的认知与理解。例如,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张宇燕讲授的《从世界变局、大国博弈谈中美经贸摩擦》,就是通过网络这个平台来使广大师生及时地了解最新国际形势的。

其三,充分运用与发挥新媒体优势。微博、微信、微视频、动漫与网络直播是最新的信息传播载体,应充分运用与发挥新媒体的优势,及时发布新时事、新政策、新热点,将基础知识与最新时事政策相结合。如建立微信公众号,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加以推送,让学生可以随时点击查看,以拓宽学生时事学习的渠道。

4. 丰富第二课堂是基础

在具体实践中,可将课堂教学和第二课堂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强第二课堂教学环节建设,突出融入式教学的优势,推动学生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达到知行合一。第二课堂的组织形式应多样化,校内可以通过讨论课、辩论赛等形式,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体现出来;或围绕主题通过座谈式自由发

言、辩论式分组对辩、现场即兴辩论等形式开展。校外可以由教师带领学生走进实践教学基地开展蹲点调研、理论宣讲和社会考察,使学生通过亲身实践,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提高学生将理论应用于实践的能力,促使学生在服务社会中开阔视野、接受教育、增长才干,增进学生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同,使其日后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中坚力量。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若干意见[EB/OL]. (2018-04-12)[2018-09-10].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3/moe_772/201804/t20180424_334097.html.
- [2]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2017-10-18)[2018-09-10]. http://www.xinhuanet.com/2017-10/27/c_1121867529.htm.
- [3] 王建国. 扎实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进”的思考[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7(12):3.
- [4] 韦洪发,张然.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几点思考[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8(5):100.
-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高校学生每学期“形势与政策”课不低于8学时[N]. 光明日报,2018-04-28(03).
-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
- [7] 俞海洛. 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中的问题意识与优化路径探析[J]. 思想教育研究,2010(10):39.



引用格式:刘欣.“课程思政”的内在价值与实践路径研究[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6):76-81.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8.06.010

文章编号:1009-3729(2018)06-0076-06

“课程思政”的内在价值与实践路径研究

Study on the intrinsic value and practice pat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urriculum

刘欣

LIU Xin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课程思政”的内涵是:课程承载思政,思政寓于课程。“课程思政”是新时代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是实现全程育人、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的关键。“课程思政”应始终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教育的根本任务,秉持大局意识,深挖各专业各学科的育人价值,形成课程整体育人的联动效应,促进大学生全面成长成才。“课程思政”的关键在于如何将其宗旨加以实践,将其内在价值充分彰显,以达到最优的育人效果。当前,推进“课程思政”的顺利实施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统筹协调育德与育才,树立德才并进的观念;二是教师应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三是立足育人使命,覆盖所有课程,构建完善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

关键词:
思想政治工作;
课程思政;
德才并进

[收稿日期]2018-10-09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18SJA0522)

[作者简介]刘欣(1984—),女,河南省新乡市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

立德树人是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重要使命。中共十九大提出,要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对高校来说,育人的使命光荣而艰巨。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1]可见,思想政治工作在高校中的重要性非同寻常。全面育人的高等教育理念,要求高校必须充分挖掘各种资源,将课程内容、学术信息与文化内涵转换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知识资源,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全面改革,推动传统“思政课程”向“课程思政”转变,协同共进,以培养新时代所需要的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目前,教育界对“课程思政”的研究大多以教师、教材、课堂、资源、制度等为着眼点,聚焦于如何构建思政教育课程体系。鉴于此,本文拟在分析“课程思政”的渊源、含义、内在价值的基础上,探索其实施路径,以期为高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提供理论参考。

一、“课程思政”的渊源与含义

从历史上看,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大学生培养目标任务中,思想政治教育始终是关键一环。改革开放之后,中央曾多次针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做出重要指示。在恢复高考之初,教育部就曾发布文件,明确高等学校马列主义课程的内容与作用;1990年代,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过程中,中共中央曾多次印发文件要求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进入21世纪,种种西方社会思潮大量涌入我国,给大学生的理想信念和价值取向带来了不良影响,中央

曾再次强调要改进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说,在高等学校发展的历程中,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备受党和国家重视。一直以来,我国教育主管部门、高等学校、学者们都在如何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方面进行探讨,积累了很多经验,也经历了许多挫折。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做好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切实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然而长期以来不能遮蔽的事实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大学生所接受的思想政治教育脱节,其有效性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究其原因,一是社会主义大学的价值引领作用并未完全得到体现,或者说过于注重知识传授,而忽略了对大学生的价值观培养;二是大学生的思想理论政治课程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并未完全吻合;三是大学全面育人的理念没有得到充分彰显,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与专业课程教师处于“老死不相往来”的隔绝状态。

针对这种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1]这是在新的时期和新的形势下,党中央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措施,对于高校今后进一步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次会议对如何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指出:要将育人作为所有高校教师的首要任务和目标,强调各科教师都应把教书与育人结合起来,利用课堂教学,形成各门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协同效应,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与专业课教师同向同行,力往

一处聚,劲往一处使。在这样的情势下,自2016年起,“课程思政”这一概念逐渐为大家所接受,并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课程思政”虽无统一的定义,但研究者的基本观点较为一致。总体上说,所谓“课程思政”,其实质不是在高校中增设一门课程,也不是增设一项活动,而是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课程教学和改革各环节、各方面,实现立德树人润物无声的目标^[2]。这一方面表明,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将不再是孤岛,而是与各类课程并肩作战,共同发挥育人作用;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并不仅仅存在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也应覆盖其他课程。对于高校来说,除思想政治理论课专职教师外,其他通识类课程的教师、专业课教师都应承担起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使命,同心协力、同向同行,共同完成育人工作。

二、“课程思政”的内在价值

“课程思政”作为一种新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本质上是“课程承载思政,思政寓于课程”,即让所有课程都上出思政味,让所有任课教师都挑起思政担,从而形成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的思政教育新格局。“课程思政”可以将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到一切知识的传授、应用之中,从而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论统一。

从价值根源上分析,“课程思政”的理念之所以能够产生并指导当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高校立德树人的目标设定。大学是立德树人、培养人才的地方,是青年人学习知识、增长才干、放飞梦想的地方。^[3]对于我国的高等学校来说,应首先明确其历史使命。2018年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北京大学时强调,高校只有抓住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根本才能办好,才能办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3]。坚持

办学的正确政治方向,这是对新时代我国高校工作的新要求和新指向。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高校是社会主义的高校。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判断,不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必将产生深远影响。从根本上讲,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的伟大宣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不动摇,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动摇。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我国大学最鲜亮的底色^[3]。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中,高等学校责任重大,必须继续坚持办好社会主义大学的原则,坚持办学的正确政治方向,承担起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人才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一切事物的根本。对于高校来说,思想政治工作说到底就是育人工作,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育人,育人是其价值本位。毛泽东曾指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4]“课程思政”应始终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教育的根本任务,坚持大局意识,深挖各专业各学科的育人价值,形成课程整体育人的联动效应,促进学生的全面成长成才;要聚焦育人价值的本源,明确价值指向,找准目标定位,弄清楚教育教学工作是为为什么而做,可以做什么,最终是为了实现什么。

价值指向决定了人才培养的方向。“课程思政”必须正确处理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之间的关系,切实达到育人的目标。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育人的根本目标在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在人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德育起到引领作用。因此,高校“课程思政”承载着对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培育和塑造,对健全人格、文化传承、体育精神、审美

情操和劳动热情的培养和引导,为大学生成长成才奠定坚实价值基础的使命。

三、“课程思政”的实施路径

“课程思政”理念的提出,明确了我国高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和全面育人的使命担当,同时也反映了当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种种问题。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被认为仅仅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任务,专业课程只负责教授专业知识。这样的错误观点导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专业课程之间存在鸿沟,形成了育人过程中的“两张皮”现象,其结果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课程思政”要求高校各门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应同向同行、形成合力、全员育人,从而为未来高校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课程思政”的关键在于如何加以实践,将其内在价值充分彰显,以求达到育人的最优效果。对此,我们认为,应从高校、教师和课程这三个方面深入理解并贯彻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推动“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的内外协调共进。具体来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实施。

1. 统筹协调育德与育才,树立德才并进的观念

通常来说,思想政治教育承担着育德功能,而专业教育承担着育才功能,只有将育德与育才统一起来,才能深刻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让学生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1]这一重要论述明确了高校以学生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也指出高校在注重育才的同时,还必须始终着眼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尤其是对学生如何做人的教育培养。这样的道理虽然被人们普遍认同,然

而在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例如,有人认为大学生应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也有人认为,教授所谓做人的道理太虚,学生在学校只要学好专业课即可,等等。这些观点实际上忽视了高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也割裂了育德与育才的内在联系。“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德才兼备是人才培养的目标体现。对于大学生来说,在大学期间的课程学习和能力积累,不仅可以增强自身的综合技能,为其走入社会做好准备,更为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和完善打下坚实基础。大学生虽已成年,但并未成熟,其情感底色、家国情怀、社会责任感、思维方式等,都是在大学期间定型的。高校的政治教育承载着大学生现在与未来的价值取向,对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至关重要。因此,为造就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高校应在注重育才的同时,将育德置于更重要的位置上,统筹协调育德与育才两种教育,实现二者的统一。

2. 教师应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

首先,“课程思政”教师——非仅指思政理论课教师——应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因为这是实施“课程思政”的基础和先决条件。作为“课程思政”教师,必须充分了解和领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衷心赞同党的理论,高度关注时政等,唯有如此,才能在课堂教学中使“课程思政”发挥最大化的效果。

其次,“课程思政”教师应不断提高自己的德育素养。在课程教学中,教师只有明确其肩负的德育使命,才可能将价值观教育融入教学过程中,从而实现传道授业和价值引领双重目标。因此,在高校中,师德至为重要,应将教师德育意识的提升纳入日常培训体系中,进一步强化其立德树人的神圣使命。

再次,“课程思政”教师应不断提升自己的人文素养。教师在课堂上所展现出的渊博知识和开阔视野,直接关系到“课程思政”的开展效果。所以,教师必须同时兼顾专心教书和全面育人,坚持教书与育人相统一。教师的本分虽是专心教书,但并不仅仅是传播知识理论,更应着力塑造人的高尚灵魂。一名合格的高校教师,要同时兼顾传授精深的专业知识、塑造大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念、培养学生卓越的做事能力三项使命。

3. 立足育人使命,构建完善的思政教育课程体系

课堂教学是育人的主渠道,为贯彻“课程思政”的要求,实现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的转变,需要进一步增强思政育人功能在思政课程外其他课程中的体现,形成育人合力,构建完善的高校思政教育课程体系。

首先,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来说,应承担起传授马克思主义学科知识,启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觉悟,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定信仰,以及树立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的政治意识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1]当前,我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着许多新问题。近年来,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某些不健康的西方思潮对大学生产生了消极影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工作的推进。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大学生是青年的中坚力量。要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胜利,必须牢牢把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这个主阵地。因此,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核心课程的政治理论课,应明确历史使命,不断创新,加强和改进教育教学方式,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增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亲和力和吸引力,以积极健康

的价值观念促进青年大学生成长成才,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大学生头脑,坚定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其次,对于非思想政治类的专业课程而言,应着力挖掘其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专业教育是一项重要内容,是传播专业知识、培养专业能力、促进大学生成为专业人才的主要课程。一直以来,专业教育通常被认为是“实”的,而思想政治教育被认为是“虚”的。这种“两张皮”现象严重影响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成效。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员育人、全程育人的新要求,守好自己的“一段渠”,专业课程也应做出相应的变革。教育部长陈宝生指出:“教育系统有两个生产过程:一个是思想的生产过程,即理论知识的生产过程;一个是人的生产过程。两个生产过程交织在教育战线。第一个生产过程影响现在、塑造未来;第二个生产过程直接培养未来的接班人、建设者。二者的结合,事关党和国家的未来。所以,教育战线是我们党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基础。从社会情势来看,很多意识形态的错误东西都出自教育战线。”^[5]专业课程同样承担着育人的使命,既要传授专业知识,更要讲授做人的道理,守好课堂的意识形态阵地。这就要求专业课教师加强政治素养和理论素养,在思想导向上时刻保持与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大政方针的一致性。否则,由于青年大学生思想尚不成熟,一旦受到不良立场和观点的影响,先入为主,就很难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所传递的正面信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功效就难以达到了。其实,在专业课程教育中同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不艰涩,反而有其独特的优势。先说哲学社会科学专业教育,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内容主要存在于哲学社会科学之中,它们

之间有较强的关联性。“思想政治工作需要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理论基础。没有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理论基础的思想政治工作,缺乏理论支撑和科学论证,缺乏认同感和凝聚力。哲学社会科学不等于思想政治工作,但哲学社会科学要在立德树人过程中发挥独特作用,也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6]我国高校的哲学社会科学课程教育首先应立足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着力于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是高校专业课教育的使命要求和首要责任。所以,哲学社会科学课程应发挥其自身独特的优势,充分利用专业课程教育的资源,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形成育人合力,共同完成育人任务。再说自然科学课程,由于其课程内容有着客观真理性和实用性,大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会比较强,在这类专业课程教育中,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会使大学生更易接受,从而实现对大学生的价值引领和指导作用。事实上,自然科学的专业课程中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是非常丰富且值得挖掘的。例如,在医学解剖学课程中,讲述生命伦理的知识,会大大增强大学生对生命的尊重感、仪式感;在讲述尖端科学技术时,增加我国科学成就的相关研发背景,会增强大学生对国家和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如此,大学生会在潜移默化中学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和内容,一旦形成协同效应,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的目的便达到了。

总之,“课程思政”是新时期对高校育人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关系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关系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课程思政”也是一项系统工程,从大的方面说,需要教育主管部门和各高校的顶层设计;从小的方面讲,需要各专业各学科互相协调配合。目前“课程思政”在理论上还需进一步探讨,在实践上尚需多践行、多总结、多反思、多改进,可以说任重道远,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协调推进。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6-12-09(01).
- [2] 高德毅,宗爱东.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从战略高度构建高校思政政治教育课程体系[J].中国高等教育,2017(1):43.
- [3]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3(02).
- [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2.
- [5] 陈宝生.切实加强党对教育系统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J].紫光阁,2016(12):32.
- [6] 杨耕:在思政工作中彰显哲学社会科学作用[N].光明日报,2016-12-13(02).



引用格式:李琴英,陈珂,陈力朋. 保费补贴认知度、邻里效应与农户参保决策的实证研究——以河南省种植业保险为例[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6): 82-89.

中图分类号:F84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8.06.011

文章编号:1009-3729(2018)06-0082-08

保费补贴认知度、邻里效应与农户参保决策的实证研究

——以河南省种植业保险为例

An empirical study on premium subsidy awareness, neighbors' effects and farmers' decision of insurance participation

—Taking He'nan province crop industry insurance for example

李琴英, 陈珂, 陈力朋

LI Qinyin, CHEN Ke, CHEN Lipeng

郑州大学 商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农业保险是我国农业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农业保险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因素是构建农业经济体系的基础,也是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迫切需要。通过建立 Ordered Probit 模型,实证分析农户对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的认知度与邻里参保状况对其参保意愿的影响,发现:保费补贴认知度、邻里参保状况,均对农户参保决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农户对保费补贴政策认知度越高,农户越倾向于购买种植业保险;在邻里踊跃参保的情况下,农户购买种植业保险的意愿会更高。有鉴于此,为了提高农户的参保意愿,建议加大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的宣传力度,拓宽农户获取信息的渠道,提高农户对种植业保险的认知度;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户相结合的模式,以发挥新型农业主体的引领作用。

关键词:

保费补贴认知度;
邻里效应;
种植业保险;
参保决策

[收稿日期]2018-10-1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3BJY180)

[作者简介]李琴英(1973—),女,河南省温县人,郑州大学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农业保险。

[通讯作者]陈珂(1993—),男,河南省濮阳市人,郑州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农业保险;陈力朋(1988—),男,河南省洛阳市人,郑州大学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财税理论与公共政策。

农业保险作为国家扶持农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对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推动农业保险的发展,政府相关部门逐年增加保费补贴金额,保费补贴比例不断增大。2007—2016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从51.84亿元上升到417.12亿元,增长了7倍,承保的农作物从2.3亿亩增加到17.21亿亩,增长了6倍^[1],中央财政保费补贴从12.96亿元增加到162.1亿元,增长了11.5倍。随着农业保险业务的快速推进,参保率不断提高,保费补贴对农业保险的推动作用明显增强。

河南省作为一个以全国1/16的耕地生产占全国1/10粮食的省份,其农业在全国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河南省的农业发展直接关乎全国农业经济的进步。农业保险在分散种植风险、补偿风险损失与维持农业稳定发展等方面均发挥着重要作用,是维护我国农业发展的基石。虽然河南省农业保险在短期内呈现高速的发展趋势,但其发展的可持续性受到严重阻碍。以2016年为例,河南省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达到17.4亿元,其中中央补贴和地方补贴占75%~80%,农户仅缴纳实际保费的20%~25%。河南农户的参保率在高补贴政策的驱使下已突破50%,但仍远低于全国农户的平均参保水平。这表明,即使在政府财政大力补贴的情况下,河南省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依然不强。如何提高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扩大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使之推动河南省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现阶段关注的重点。

一、文献综述

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表明,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认知度与邻里效应均会对农户的行为产生影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户的参保行为与生产要素的购买行为。

一是关于农业保险需求影响因素的研究。

M. L. Vandaveer^[2]对越南荔枝保险的实证分析发现,农户的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对其是否选择购买农业保险有显著影响;R. A. Babcock^[3]的研究表明,农户对风险的关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郭翔宇等^[4]认为,农户的农业保险认知水平与政府的保费补贴额度对农户的参保决策有重要影响。

二是对于农业保险认知度与农户参保意愿之关系的研究。钟涨宝等^[5]发现,随着农户对保费补贴政策认知度的提高,对此项惠农利民政策理解的加深,农户接受农业保险的可能性会提升;S. Ghazanfar等^[6]通过对巴基斯坦300户农户数据的分析表明,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认知度越高,农户越愿意参与农业保险;李琴英^[7]认为,无论是兼农型农户、农兼型农户还是纯农型农户,对其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影响最大的因素主要是其对农业保险的认知程度;聂荣等^[8]采用辽宁省农户入户调查数据,运用Heckman模型对其进行分析,认为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认知度越高,其参与农业保险的概率越高。

此外,还有学者对邻里效应与农户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史运等^[9]认为,农户在选择农产品时,其行为会受到邻里行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邻里间农户的相互模仿和跟从等;姚瑞卿等^[10]通过对农户行为大量实地调查发现,农户无论是种植农作物的方式与耕作习惯,还是选用化肥与农药,其行为都存在较大程度的邻里影响,体现了明显的邻里效应;李矜燕等^[11]指出,跟潮效应可能也会影响农户购买农业保险。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对农户参保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的分析研究。但大多集中在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认知度和农户生产要素购买意愿的邻里效应方面,而对农户保费补贴政策的认知度、邻里效应与参保决策之关系的研究却很少。鉴于此,本

文拟基于对河南省 403 名农户的调查问卷,从农户自身特征和外部环境出发,运用 Ordered Probit 模型对保费补贴政策的认知度、邻里效应与农户参保决策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以期对河南省农业保险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二、研究设计与计量模型

1. 研究设计

(1) 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由调研问卷收集整理而得。农户样本的抽样使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采取调查人员深入农户一问一答的形式进行,综合运用自由回答、两项回答、多项选择、赋值评价等方法,在被调查农户作答后,收回问卷并完成数据的采集。本次调查于 2018 年 2—3 月份进行,共向河南省 18 个地市发放问卷 500 份,收回问卷 440 份,有效问卷 403 份。

(2)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在测度被调查农户参保意愿时,让被调查农户回答“您愿意购买种植业保险吗?”,调查问卷要求被调查农户在“非常不愿意”“不太愿意”“不确定”“比较愿意”“非常愿意”5 个

选项之间进行选择,分别赋值 1、2、3、4、5。在测度农户保费补贴认知度时,让被调查农户回答“您了解种植业保险的保费补贴政策吗?”,调查问卷要求被调查农户在“非常不了解”“不太了解”“一般了解”“比较了解”“非常了解”5 个选项之间进行选择,分别赋值 1、2、3、4、5。在测度邻里效应时,让被调查农户回答“您的亲戚邻居朋友是否参加了种植业保险?”,调查问卷要求被调查农户在“是”与“否”选项之间进行选择,分别赋值为 0 和 1。此外,考虑到农户购买种植业保险的意愿可能还会受到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本文还采集了种植业保险的重要性、年龄、文化程度、家庭年收入、发生自然灾害的可能性等控制变量,各主要控制变量的定义和说明具体如表 1 所示。

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2。由表 2 可知,被调查农户参保意愿的均值为 3.33,农户对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认知度的均值为 2.21,邻里是否参保的均值为 0.44,农户对种植业保险重要性评价的均值为 3.07。由此可见,被调查农户的参保意愿低下,对保费补贴政策的认知度不足,邻里参保较少,并且种植业保险的重要性没有得到农户的高度认可。

表 1 主要控制变量的问题设置与定义说明

变量名称	问题设置	赋值
种植业保险的重要性	您认为种植业保险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如何?	1、2、3、4、5 分别表示“非常重要”“不太重要”“一般”“比较重要”“非常重要”
年龄	年龄多大?	1、2、3、4、5、6、7 分别表示“18 岁以下”“18~24 岁”“25~34 岁”“35~44 岁”“45~54 岁”“55~64 岁”“65 岁以上”
文化程度	文化程度怎样?	1、2、3、4、5 分别表示“未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或中专”“大专及以上”
家庭年收入	您的家庭年收入大概多少?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 分别表示“0.5 万以下”“0.5~1 万”“1~1.5 万”“1.5~2 万”“2~2.5 万”“2.5~3 万”“3~3.5 万”“3.5~4 万”“4~4.5 万”“4.5~5 万”“5~5.5 万”“5.5~6 万”“6~6.5 万”“6.5~7 万”“7~7.5 万”“7.5~8 万”“8~12 万”“12~15 万”“15 万以上”
发生自然灾害的可能性	您认为种植业发生自然灾害(干旱、洪涝、雹灾、病虫害等)的可能性大吗?	1、2、3、4、5 分别表示“非常小”“比较小”“一般”“比较大”“非常大”

2. 实证模型构建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户购买种植业保险的意愿,是取值范围为1~5的有序离散变量。为了实证分析农户保费补贴政策的认知度和邻里是否参保对其购买种植业保险意愿的影响,本文在参考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如下Ordered Probit 计量模型:

$$Buyinsur_i = \beta_0 + \beta_1 Kpspolicy_i + \beta_2 Neighinsur_i + \delta X_i + \mu_i$$

其中,被解释变量 $Buyinsur_i$ 表示第 i 个农户购买种植业保险的意愿程度;核心解释变量 $Kpspolicy_i$ 和 $Neighinsur_i$ 分别表示第 i 个农户对保费补贴政策的认知程度与邻里是否参保; X_i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参保意愿	1	5	3.33	1.19
保费补贴政策认知度	1	5	2.21	1.02
邻里是否参保	0	1	0.44	0.50
种植业保险的重要性	1	5	3.07	1.01
文化程度	1	5	2.95	1.11
家庭年收入	1	19	9.36	4.75
年龄	1	7	4.52	1.30
性别	0	1	0.67	0.47
发生自然灾害的可能性	1	5	2.92	1.04

表3 保费补贴认知度和邻里效应对农户参保意愿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农户参保意愿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Kpspolicy$	0.223*** (0.069 1)	0.186*** (0.071 4)	0.182** (0.072 3)	0.194** (0.073 6)
$Neighinsur$	0.930*** (0.135)	0.859*** (0.139)	0.868*** (0.142)	0.844*** (0.142)
种植业保险的重要性		0.272*** (0.062 1)	0.264*** (0.064 3)	0.268*** (0.065 8)
文化程度			0.025 2(0.055 0)	-0.028 0(0.069 7)
性别			-0.038 7(0.109)	-0.020 1(0.110)
年龄				-0.064 2(0.053 3)
家庭年收入				-0.005 24(0.011 7)
发生自然灾害的可能性				-0.042 2(0.054 4)
N	403	403	403	403
Wald chi2	99.72	128.69	128.63	130.50
Prob > chi2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Pseudo R^2	0.096 0	0.115 7	0.116 0	0.117 7

注:括号内的数字为稳健标准误差,***、**、*分别表示变量的估计系数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下文表4与此相同

表示控制变量,包括农户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家庭年收入、种植业保险对农户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和发生自然灾害的可能性等因素; μ_i 为随机扰动项。

三、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1. 基本估计结果与分析

为了实证检验农户对保费补贴政策的认知度与邻里效应对农户参保意愿的影响,在控制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等相关因素的情况下,采用计量模型,分别对农户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的认知度和邻里是否参保的实验数据进行了估计。同时,为了使回归结果更加稳健可信,采用逐步回归法对模型进行极大似然估计,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表3中的模型(1)为农户对种植业保险的认知度和邻里是否参保对农户参保意愿影响的回归结果。采用逐步回归方法,模型(2)(3)(4)则进一步依次加入了农户对种植业保险在农业生产中之重要性的评价、农户的文化程度、性别、年龄、家庭收入,以及农户对种植业发生自然灾害的预期等控制变量。

由表3可知,首先,核心解释变量农户对种

植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的认知度的估计系数在模型(1)(2)中始终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在模型(3)(4)中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在控制年龄、家庭年收入、文化程度等一系列因素作用的情况下,农户对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的认知度对农户参保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农户对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越是了解,其参保意愿就越高。究其原因,对保费补贴政策有不同认知度的农户对种植业保险的意愿存在差异。对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认知程度越高的农户,其对此项惠农利民政策的理解越深,为了提高自己的预期收益和效用,农户会更愿意购买种植业保险;而对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认知程度越低的农户,则通常认为种植业保险保费对其是一种额外的经济负担,容易产生对种植业保险的排斥,其参保意愿会降低。农户对种植业保险深入的认知能够有效地减少他们对该保险的误解和偏见^[12]。因此,对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认知度较高的农户,对种植业保险有较强的意愿。

其次,从模型(1)一(4),核心解释变量“邻里是否参保”的估计系数始终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这表明在控制年龄、家庭年收入和文化程度等一系列因素的情况下,邻里是否参保对农户参保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农户的亲戚邻居朋友参保能使其参保意愿提高。邻里效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农户从内心接受邻里的行为而做出的跟随行为;二是农户为了“跟潮”而做出纯粹的简单模仿行为,邻里参保状况不同的农户对种植业保险的意愿存在差异。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群体通过较长时间的互动,其思想观念会逐渐趋同。K. R. Ahern^[13]通过对一个班级的学生进行关于风险厌恶变化的实证研究发现,经过一个学年的共同学习后,同一班级学生从原本不同的风险厌恶程度而逐渐趋于一致。C. J. Eun^[14]研究发

现,由于中国是一个具有较强的文化自律意识和集体主义的国家,因此居民更容易受到他人思想和行为的影响。种植业保险的购买可以通过农户的互动行为进行传播,这对种植业保险的购买具有促进作用。而且,农户模仿其他农户的参保行为会产生从众效应。大量研究发现,居民参保决策等行为存在从众现象,因为群体在互动过程中会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一种特定的舆论和风气,从而会产生一种催促人行动的压力^[15]。这种压力与强制性命令不同,每个人都有“被其他人所接受”的心理,从而多数人的行为会对个体产生无形的压力,形成个人对其他人行为的模仿。而且,农户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对农业保险和保费补贴政策不了解,对于是否参保,农户往往不能仅仅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判断,很容易产生“跟潮”效应。亲邻朋友的参保也会对农户起到宣传作用,使农户更加了解种植业保险和保险保费补贴政策,有助于农户参保。因此,亲邻朋友购买种植业保险的农户对种植业保险有较强的购买意愿。

此外,从控制变量角度来看,农户对种植业保险在农业生产中重要性评价的估计系数在模型(2)(3)(4)中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农户对种植业保险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评价对其参保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农户认为种植业保险对农业生产重要,愿意购买种植业保险。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农户对种植业保险在农业生产中的评价来自于其以往遭受自然灾害损失的经历,保险赔偿使其减少了大量的损失,失而复得的经历和体验通常能为农户带来较高的产品认知,这种亲身体验所带来的产品认知通常会比对产品功能的直接了解更加有效。因此,农户对种植业保险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评价将影响农户是否积极主动了解种植业保险及其补贴政策,从而影响农户

的参保意愿。

2. 边际效应估计与分析

通过 Ordered Probit 模型可以证实农户对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的认知度与邻里是否参保是否会影响农户的参保意愿,但估计结果只能确定农户对保费补贴政策的认知度和邻里是否参保对农户参保意愿影响的方向和显著性,而不能具体地分析其影响程度。因此,为了分析农户对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的认知度和邻里是否参保对农户参保意愿选择概率的影响,本文在表 3 中模型(4)的基础上,进一步计算了农户对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的认知程度、邻里是否参保等其他相关变量对农户参保意愿的边际影响,具体计算结果见表 4。从表 4 可以看出以下两点。

其一,农户对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的认知度对农户“非常不愿意”(Y=1)购买种植业保险的边际影响为-0.011,对农户“不太愿意”(Y=2)购买种植业保险的边际影响为-0.054,两者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农户对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的认知程度每提高一个等级,农户“非常不愿意”和“不太愿意”购买种植业保险的概率分别下降了 1.1% 和 5.4%。但是,农户对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的认知度对农户“比较愿意”(Y=4)和“非常愿意”(Y=5)购买种植业保险的边际影响为 0.038 和 0.039,并均在 1% 的显著性水

平上为正,这表明农户对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认知程度的提高,农户“比较愿意”和“非常愿意”购买种植业保险的概率分别增加了 3.8% 和 3.9%。

其二,邻里效应对农户参保意愿“非常不愿意”(Y=1)和“不太愿意”(Y=2)参加种植业保险的边际影响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分别为-0.047 和-0.223。这表明与亲邻朋友没有参保的农户相比,亲邻朋友参保的农户“非常不愿意”和“不太愿意”购买种植业保险的概率分别下降了 4.7% 和 22.3%。但是,亲邻朋友参保的农户“比较愿意”(Y=4)和“非常愿意”(Y=5)购买种植业保险的边际影响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分别为 0.141 和 0.183,这表明与亲邻朋友没有参保的农户相比,亲邻朋友参保的农户“比较愿意”和“非常愿意”购买种植业保险的概率分别增加了 14.1% 和 18.3%。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了农户对保费补贴政策的认知度和邻里效应对农户参保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对保费补贴政策的认知度和邻里效应对农户参保决策均有显著的影响;农户对保费补贴政策的认知度越高,农户参保的意愿就越强烈;邻里参保的农户更愿意参保。此外,农户对种植业保险的重要

表 4 保费补贴政策认知度和邻里效应对农户参保意愿影响的边际效应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农户参保意愿				
	Y=1	Y=2	Y=3	Y=4	Y=5
<i>Kpspolicy</i>	-0.011*** (0.005)	-0.054*** (0.021)	-0.012*** (0.005)	0.038*** (0.015)	0.039*** (0.015)
<i>Neighinsur</i>	-0.047*** (0.012)	-0.223*** (0.019)	-0.054*** (0.014)	0.141*** (0.027)	0.183*** (0.035)
种植业保险的重要性	-0.015*** (0.005)	-0.075*** (0.019)	-0.016*** (0.006)	0.052*** (0.014)	0.055*** (0.014)
文化程度	0.002(0.004)	0.008(0.020)	0.002(0.004)	-0.005(0.013)	-0.006(0.014)
性别	0.001(0.006)	0.006(0.031)	0.001(0.007)	-0.004(0.021)	-0.004(0.023)
年龄	0.004(0.003)	0.018(0.015)	0.004(0.003)	-0.012(0.010)	-0.013(0.011)
家庭年收入	0.000(0.001)	0.001(0.003)	0.000(0.001)	-0.001(0.002)	-0.001(0.002)
发生自然灾害的可能性	0.002(0.003)	0.012(0.015)	0.003(0.003)	-0.008(0.011)	-0.009(0.011)

性评价也是影响农户参保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其一,加大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宣传力度,提高农户对种植业保险政策的认知度。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在农村的应用与推广为种植业保险的宣传提供了新的载体,为宣传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便利。保险公司和政府相关部门应在原有传统宣传方式的基础上采用更多形式的宣传手段,如建立微信公众平台、与农业保险相关的手机移动客户端等,拓宽农户的认知渠道,让农户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最新的农业保险政策。另外,为了达到宣传的视听效果,相关机构还应制作拍摄与种植业保险相关的微视频、微广告进行宣传教育;为了发挥宣传的联动效应,在普遍宣传中要对目标群体特别是村干部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有针对性地进行走访式宣传。

其二,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户相结合的模式,使其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户间产生邻里效应。政府应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户”模式的扶持力度,推动合作社农业保险和龙头企业农业保险的大力发展。一方面,应增强对农户的认知培训,实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户的有效对接;另一方面,应提供良好的对接环境,建立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农户在对接过程中能享有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平等的地位,从而提高农户参与合作社的意愿,使农户与合作社形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扩大合作社规模,形成合作联社,发挥农户之间的联动效应。

其三,增强农户的风险意识,使农户充分认识到种植业保险对其生产经营的重要性。保险公司应多开展与种植业保险相关的经验交流会,将认为种植业保险对农业生产非常重要的农户组织起来,面向认为种植业保险对农业生产不重要的农户进行宣讲与经验交流,让认为

种植业保险对农业生产十分重要的农户为其他农户讲述农业生产面临的风险以及种植业保险的作用,使农户意识到自然灾害可能带来的损失和购买种植业保险的优越性,这样不仅可以提高没有参保农户对种植业保险及其保费补贴的认知度,而且也可促进邻里效应的充分发挥,从而极大地提高农户购买种植业保险的意愿。

参考文献:

- [1] 冷翠华. 告别“靠天吃饭”和“猪贱伤农”农业保险保费 10 年增 7 倍[N]. 证券日报, 2017 - 06 - 26(01).
- [2] VANDEVEER M L. Demand for area crop insurance among litchi producers in northern Vietnam [J].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1(2): 173.
- [3] BABCOCK B A. Time to revisit crop insurance premium subsidies? [R]. Center for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Policy Briefs, Iowa State University, 2011.
- [4] 郭翔宇, 张美玲, 李丹. 交易成本视角下农户购买政策性种植业保险意愿的实证分析——基于黑龙江省的调查[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6(3): 551.
- [5] 钟涨宝, 聂建亮. 政策认知与福利判断: 农民参加新农保意愿的实证分析——基于对中国 5 省样本农民的问卷调查[J]. *社会保障研究*, 2014(2): 80.
- [6] GHAZANFAR S, ZHANG Q W, ABDULLAH M, et al. Farmers' perception and awareness and factors affecting awareness of farmers regarding crop insurance as a risk coping mechanism evidence from pakistan [J]. *Journal of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English Edition)*, 2015(1): 76.
- [7] 李琴英. 农业政策性农业保险需求意愿实证分析[J]. *河南社会科学*, 2014(12): 73.
- [8] 聂荣, 沈大娟. 影响农户参保农业保险决策的因素分析[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2017

(1):107.

- [9] 史运,田珍. 邻里效应对农村居民电子支付平台使用意愿的影响研究[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18(3):120.
- [10] 姚瑞卿,姜太碧. 农户行为与“邻里效应”的影响机制[J]. 农村经济,2015(4):40.
- [11] 李杍燕,胡胜德. 政策性农业保险需求实证研究——基于黑龙江省的调查分析[J]. 学习与探索,2011(4):204.
- [12] 晁娜娜,杨沛华. 耕地规模、农业保险认知及其潜在需求的多样化——基于全国 6492 个粮食种植户的考察[J]. 财经科学,2017(5):67.

- [13] AHERN K R. Peer effects in risk aversion and trust[J].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2014(11): 3213.
- [14] EUN C J.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correlates of volunteering and charitable giving[J].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2011(6):1092.
- [15] LIU H, SUN Q, ZHAO Z. Social learning and health insurance enrollment:evidence from China's new cooperative medical scheme[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2014 (97):84.

(上接第 61 页)

- [3] 叶敏. 从政治运动到运动式治理——改革前后的动员政治及其理论解读[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75.
- [4] 唐皇凤. 常态社会与运动式治理——中国社会治安治理中的“严打”政策研究[J]. 开放时代,2007(3):115.
- [5] 冯仕政. 中国国家运动的形成与变异:基于政体的整体性解释[J]. 开放时代,2011(1):73.
- [6] 周雪光. 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J]. 开放时代,2011(10): 67.
- [7] 周雪光. 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J]. 开放时代,2012(9):105.
- [8] 百度百科. 五水共治[EB/OL]. (2018-07-02) [2018-07-2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94%E6%B0%B4%E5%85%B1%E6%B2%BB/13004585?fr=aladdin>.

- [9] X 县府办. X 县“五水共治”工作情况总结[R]. X 县,2014.
- [10] 蒋永甫,疏春晓. 基层政府的文件治理何以可能? ——基于 A 乡“清洁乡村”的实证分析[J].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2):128.
- [11] 折晓叶,陈婴婴. 项目制的分级运作机制和治理逻辑——对“项目进村”案例的社会学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2011(4):126.
- [12] X 县开展“五水共治”清三河活动 县四套班子领导集体捡垃圾[EB/OL]. (2014-02-08) [2018-07-20]. <http://www.zjwater.com/gq60zn/document.aspx?id=109129>.
- [13]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7.
- [14] 周雪光. 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2.



引用格式:王新庆. 基于 VRIO 框架的知识链知识优势研究[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6):90-96.

中图分类号:F062.3;G46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8.06.012

文章编号:1009-3729(2018)06-0090-07

基于 VRIO 框架的知识链知识优势研究

Study on knowledge advantage of knowledge chain based on VRIO framework

王新庆

WANG Xinqing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18

摘要: 组建知识链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知识优势。基于 VRIO 分析框架,从价值性、稀缺性、难以模仿性和组织四个维度探讨知识链知识优势的来源,分析这四者对知识优势形成的不同作用,可以看出,价值性知识是知识优势来源的基础,稀缺性知识是知识优势来源的关键,难以模仿性知识是知识优势来源的保证,组织是知识优势形成的条件。提升知识资源的价值性,控制知识资源的稀缺性,确保知识资源的难以模仿,提高知识链组织管理水平,是知识链知识优势的实现方式。我们在获得知识优势的同时,还应建立知识创新预警机制,并克服模仿性悖论,以便及时调整战略维持知识优势。

关键词:

知识链;

知识优势;

VRIO 框架

[收稿日期] 2018-10-24

[基金项目] 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2018B046)

[作者简介] 王新庆(1966—),男,河南省郑州市人,河南经贸职业学院院长,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教育管理和知识管理。

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是 21 世纪世界经济的两大特征。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认为,“知识正成为当今唯一有意义的资源”^[1]。然而,与一般商品不同,知识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这就要求知识转移和知识共享必须突破组织边界。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环境下,企业仅仅依靠自身力量开发使用知识显然不够,还需要通过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合作获取外部知识。由此,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上下游企业甚至竞争对手之间,常通过知识流动来实现知识共享和知识创造,从而形成了知识链。

知识链是指以企业为创新的核心主体,以实现知识共享和知识创造为目的,通过知识在参与创新活动的不同组织之间流动形成的链式结构^[2]。知识链在竞争中取胜的关键在于形成知识优势^[3],而通过知识协同形成的知识优势又能为知识链带来知识增值效应^[4]。其实,知识链的知识优势不仅是一个静态概念,其形成也是一个动态过程。相关学者对知识优势的来源做了探索性研究。例如,顾新^[5]认为,知识优势是在知识流动过程中一条知识链相对于另一条知识链所表现出来的优势,知识优势来源于知识链在成员已有知识基础上的知识流动过程中的知识共享和知识创造。童小英^[6]认为,企业知识优势的形成与三个因素密切相关:(1)企业所拥有的资源的特质,特别是人力资源的素质;(2)企业内部运作体系的复杂性;(3)应用技术的领先程度和创新能力,并提出了通过实施知识吸纳、知识联盟、知识整合、知识转移、知识激励和知识创新战略,在产业定位中形成自身特有的知识优势,以确保在国际竞争中的活力和持久竞争优势。唐承林等^[7]认为,知识优势是通过知识存量优势和知识流量优势集成并在知识网络内进行知识创新的结果,其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知识联盟能力是获取知识优势的外部能力;核心能力是形成持续知识优势

的基础;学习能力是获取知识优势的动力保障。通过对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剖析,李其玮等^[8]将知识优势归纳为专有性知识优势、成本领先知识优势和利益领先知识优势三种类型,并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发现知识因素、过程能力因素、社会资本因素、利益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等,是知识优势的重要影响因素^[9-11]。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关于知识优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微观层面(如企业),而中观层面的研究(如知识链、企业联盟)刚刚起步,至于宏观层面(如国家知识优势)更鲜有研究。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引入 VRIO 模型,从价值性、稀缺性、难以模仿性和组织四个维度探讨知识链知识优势的来源,并分析这四者对知识优势形成的不同作用,以期对知识链知识优势的评价和测量提供一个基本框架。

一、VRIO 模型框架

VRIO 模型最早由杰恩·巴尼提出^[12]。在《从内部寻求竞争优势》一文中,巴尼概括了该模型的核心思想:可持续竞争优势不能通过简单地评估环境机会和威胁,然后仅在高机会、低威胁的环境中通过经营业务来创造,它还依赖于独特的资源和能力,企业可把这些资源和能力应用于环境竞争中。他认为,判断企业特定的资源和能力是优势还是劣势需要回答以下四个问题:(1)企业的资源和能力通过开发机会和抵御威胁能否增加价值?(2)有多少竞争企业已经获得了这些有价值的资源和能力?(3)与已经获得资源和能力的企业相比,不具有某些资源和能力的企业是否面临获取它的成本劣势?(4)企业是否被组织起来开发利用其资源和能力?

VRIO 模型虽着眼于组织内部,但作为一种战略分析框架,它可以被借鉴到知识链知识优势分析中。知识本身就是一种战略资源,知识

链的每一个环节需要不同知识资源的运用与融合,知识链对知识资源的选择和方式决定了知识链知识优势的大小。价值性、稀缺性、难以模仿性和组织作为判断知识链知识优势的标准,是具有一定的逻辑关系的。知识链知识优势的金字塔结构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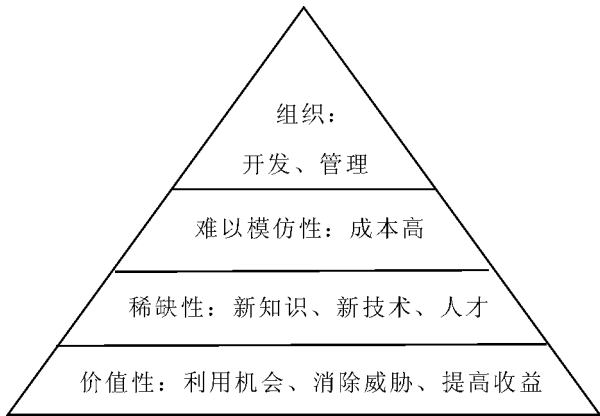


图1 知识链知识优势金字塔结构

二、知识链知识优势的来源

知识链知识优势的来源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 价值性知识:知识链知识优势来源的基础

价值性是指知识链拥有的知识资源能够降低成本或提高知识链的收益,知识资源可以为知识链赚取“李嘉图租金”和“张伯伦租金”。前者是由于降低了边际生产成本而获得的收益,后者是利用规模经济和高额的转移成本建立的高进入壁垒;知识链通过知识整合和知识创新,还可以创造出“熊彼特租金”,即通过在一个不确定性很高或者非常复杂的环境中,承担风险和形成独创性的洞察力来获得基于创新的租金^[13]。

2. 稀缺性知识:知识链知识优势来源的关键

如果一种知识虽有价值,但能够通过交流、付费购买等方式被其他人或组织全部获得,那

么这种知识就很难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自然无法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因此,想要让知识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这种知识还需具有稀缺性。稀缺性是对资源分布所作的描述,只有少数组织占有的资源如专利、专业技术人才、特定的企业文化等才具有稀缺性^[14]。杰恩·巴尼^[15]等认为,只要拥有有价值的资源或能力的组织数目小于能够在行业中产生完全竞争的组织数目,就可认为组织所拥有的这种资源或者能力是稀缺的。知识的稀缺性多体现在隐性知识上。一个企业隐性知识的形成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过程,这种隐性知识不仅与特有的技术和知识有关,还与企业管理制度、企业文化、工作流程等相关,其在市场上难以购得。因此,隐性知识的这种稀缺性就为企业获得竞争优势提供了条件。

3. 难以模仿性知识:知识链知识优势来源的保证

知识链经过知识获取、知识共享、知识创造和知识应用,逐渐形成特有的、不能被轻易模仿的隐性知识。杰恩·巴尼^[16]认为,时间的不可逆性、社会的复杂性、专利模仿成本高、优势不确定性等,使得竞争者在模仿时存在很大劣势。具体来说,隐性知识的难以模仿性和复制性为知识链带来知识优势的原因在于:其一,相较于其他资源,隐性知识的价值更难于测量和评价。虽然可以确定知识链的一些优势,但形成竞争优势的原因很难识别,故要想复制和模仿这种优势很困难。其二,知识链知识优势是许多单位和个人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相互作用与个人素质、文化氛围、社会环境、知识水平等密切相关,因为涉及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故重复的可能性很小。其三,隐性知识是特殊历史进程的产物,与时代环境、领导决策、战略选择、竞争对手策略等有关,而复制历史的概率几乎为零。其四,隐性知识是通过长期积累、从量变到质变

的产物,这使其很难在市场获得。

4. 组织:知识链知识优势形成的条件

知识链组织若能有效地开发利用有价值的、稀缺的、难以模仿的知识资源,那么就可以获得相对于其他知识链的知识优势。然而,知识链组织之间是一种战略伙伴关系,依靠合同协议和相互信任维持合作,在运行过程中容易受到目标分歧、文化差异、利益不均等的干扰而产生冲突,因此需要运用正式的契约机制、非正式的自实施机制、第三方冲突管理机制、关系强度调节机制等多种手段,扫除知识链开发利用知识资源的组织障碍,促进知识链知识优势的形成。

综合考虑价值性、稀缺性、难以模仿性、组织四者与知识链知识优势之间的关系,可以构建一个基于 VRIO 的知识链知识优势来源分析框架,见表 1。

三、知识链知识优势的实现方式

1. 提升知识资源的价值性

一般来说,知识的价值性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体现:一是知识的应用提高了实物的生产效率;二是知识直接物化为商品;三是将知识作为资本进行投资以实现其价值。当知识链的知识资源丧失了知识优势的时候,知识链可以选择开发新的有价值的知识或改变知识的应用方式来形成新的优势。由于价值性的体现方式不同,故不同行业的价值链知识优势影响因素不同,即使属同一行业,不同的知识链的知识优势也存在着差异,专利技术、人力资本、营销渠道、

企业文化等,都是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

丰田公司就是通过提升知识资源的价值性来获得其知识优势的。在“共存共荣”理念的指引下,丰田公司构建了“公司—供应商—专家顾问”的知识链,旨在促进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在丰田公司的协助下,专为丰田供货的生产部门工人的人均产出率提高 4%,存货水平降低 5%,残次品率降低 50%。丰田公司还聘请专家团向供应商传授丰田生产方式 TPS。例如,在联合对大陆特种金属制品公司生产流程进行检查中,发现其 30 个生产步骤中仅有 4 个为增值流程,经过改进,将 9 个非增值步骤排除掉,大陆特种金属制品公司的启动时间也从原来的 2 个小时缩减至 12 分钟。丰田公司通过知识链不仅获得了更多的知识资源,更重要的是提升了利用知识资源的能力。这种协同模式奠定了丰田公司的知识优势地位,丰田公司于 1976 年超过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德国大众公司,居美国小轿车进口商的首位,到 1985 年,其在美国市场的销量已占美国轿车市场的 20%。

丰田公司知识链的构建,使丰田公司、供应商、专家顾问等都获得了有价值的知识。供应商可以通过咨询交流的方式从专家顾问那里获得有价值的知识,也可以通过与其他供应商合作的方式获得知识提升。丰田公司在与供应商合作的过程中,不仅能从供应商那里学到有价值的知识,还可将有价值的知识传递到公司内部和其他的供应商,进而使得整个知识链能够源源不断地产生有价值的知识。换句话说,在

表 1 基于 VRIO 的知识链知识优势来源分析框架

是否有价值	是否稀缺	模仿成本是否高	组织是否合适	优势大小	经济利润
否	—	—	否	知识劣势	低于正常
是	否	—	↑	对等优势	正常
是	是	否	↓	暂时的知识优势	高于正常
是	是	是	是	持续的知识优势	高于正常

“丰田公司—供应商—专家顾问”知识链中纵向的竞争关系和横向的协作关系的作用下,知识链中各主体间最终可形成一种协同共生的关系。同时,由于知识链间的竞争和协作能够促进新知识的产生,故基于知识链的协同共生,能够提升整体知识的价值并形成知识优势。

2. 控制知识资源的稀缺性

知识链上知识资源的稀缺性,主要体现在知识链中核心企业对知识资源的控制上。一般来说,知识链中的核心企业都是知识型企业,它们是创新活动的投入主体、决策主体和收益主体,在生产产品的同时也应用和创造知识,并将知识融入其产品中。核心企业通常通过知识需求与上下游企业、供应商、经销商进行知识整合,创造出资产专用性程度极高的知识资源和特殊资源,以带动整条知识链形成知识优势。

沃尔玛和凯玛特竞争地位的转变可以说明知识稀缺性是知识链知识优势的关键。凯玛特成立于1897年,是美国零售历史上最悠久的公司之一。1980年代,该公司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经营战略,取得了商业零售业的辉煌业绩,1987年其销售额高达240亿美元,是沃尔玛的两倍多。但是,到了1990年代,沃尔玛经营业绩突飞猛进,凯玛特却节节后退。进入21世纪后,在美国经济衰退、公司自身经营不善等的作用下,凯玛特在2002年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对于沃尔玛与凯玛特之间的竞争,可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分析。第一阶段为1990年代以前,凯玛特在行业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凯玛特制定详细的企业战略,对企业各业务制定了明确的管理方案。在产品管理方面,其以各战略业务单位为利润中心,进而制定最佳的商品选择、定价与促销策略。在与供应商的交易中,凯玛特对运营和关系的处理游刃有余,这使得其能够保持最低成本。凯玛特在经营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知识,而这些知识都是在长时间特定工作环

境中积累的。第二阶段为1990年代至今,电子技术的运用使得沃尔玛获得成功。沃尔玛很早就对零售信息系统进行了投资,1969年就应用计算机跟踪存货,1970年代建立了管理信息系统,1980年代应用条形码技术和存货定位信息系统,1983年采用了销售点数据系统,1985年建立了电子数据交换系统,1986年建立了快速反应机制,等等。1990年代末,长期的技术投入和知识积累,使沃尔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折扣零售商。之后,虽然凯玛特也引入了电子技术,但是如何利用这些技术还需要很长时间去探索,这说明,沃尔玛的零售系统与操作、运行方式知识,在当时都是稀缺知识。

3. 确保知识资源的难以模仿

知识链知识资源的难以模仿性确保了知识链的知识优势,并最终转化为经济利益;反之,如果知识链没有有意识地保护自己独特的资源,其知识优势就会慢慢丧失。所以,知识链管理的重心就是隐性知识的开发和利用——通过把员工头脑中的创新思路、工作经验、心智诀窍等意会知识变为知识链独特的知识资源。除隐性知识外,知识链所拥有的专利、声誉、渠道等往往也难以模仿,这些都保证了知识链知识优势来源的稳定性。

电脑制造行业的横向一体化程度一般较高,是典型的知识联盟。以IBM为例,从生命周期角度可以看出知识资源的独特性对其知识优势的影响^[17]。在初创期,IBM公司主要生产用于管理的机械式计算工具。在这一阶段,虽然公司也出现了管理不当、债务不断等问题,但是公司通过分析自身和时代发展,专注于自动计算技术与设备,积极与军方、政府等进行合作,这些都使其得以成功存活。在成长期,IBM公司为了获得竞争优势,将大量资金投入技术创新与研发,以确保自身技术处于市场最前沿。在成熟期,IBM公司的计算机技术走向商业化,

一方面继续在应用型学习能力上进行大量投资,同时借助多年积累的技能、企业内部和外部资源等,构建了独具优势的模块化生产方式与运作流程。1985年后,IBM逐渐走向衰退:在已有技术被疯狂模仿、新技术不被市场认可的双层夹击中,IBM的市场地位受到极大削弱。可以看出,IBM公司由盛转衰的根本原因就是其核心技术被模仿,核心人才被挖走,公司声誉没有得到很好地维护。IBM曾经的“给钱叫人离开的方案”使得大量优秀知识精英流失;IBM拒绝购买微软的DOS系统导致其遵从于微软公司设定的行业技术标准,从而难以保证其核心技术的独立性;IBM对英特尔开发386CPU芯片反应迟钝,使自己由技术的引导者变成追赶者,最终失去在个人电脑市场上的知识优势和获利能力。

知识链组织成员尤其是核心企业,在组织设计中要充分考虑到知识资源的特点,主要包括资源来源、资源呈现方式、资源类型等^[18]。在知识经济时代,管理者对知识来源的需求随着管理层次的不同而不同。一般来说,管理层次越高越需要较多的外部知识资源(国家政策、社会环境、市场信息等)作为决策参考;管理层次越低越需要较多的内部知识资源(数据库、核心技术、成本利润等)作为决策参考。资源呈现方式是指管理层对所获得的知识资源详细程度的要求。高层的管理者只需要概括性、概念性的知识和信息就可以满足工作上的要求;基层管理者则需要尽量详细的知识和信息。知识资源类型与组织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高层管理者需要更多的隐性知识,基层管理者则需要更多的显性知识。

作为跨组织的链式结构,知识链知识管理成功的关键在于采用关系管理,这种组织结构的运行特点就是将分销商、代理商等也纳入到自己的关系网络。为了辨识同行业、上下游企

业的知识,思科公司专门成立了增值合作事业部。该部是公司人员较少的几个部门之一,但却是公司推出产品最多的事业部,目前已经立项的产品就有10多个。增值合作这种特殊的经营模式,就是收集、利用不同行业的不同知识资源进行整合增值,以“拿来主义”的思路,寻求具有行业背景的软硬件开发商、系统集成商和行业销售商来共同开发和销售产品。这种知识优势得以发挥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与供应商建立了良好的协作关系,并体现了知识链的信息化管理和跨组织结构无边界柔性管理的特点。

四、结论与讨论

如果知识链所掌握的知识资源没有价值,知识链就应该停止对这些资源的利用与开发,否则将会产生预期的知识劣势,只能赚取低于正常的经济利润;如果知识资源有价值但不稀缺,知识链往往获得对等的知识优势,只能获得正常的经济利润;如果具备前两个要素,但是知识资源的模仿成本不高,知识链能够获得暂时的知识优势,并在一段时期内赚取高于正常的经济利润;即使同时拥有价值性、稀缺性和难以模仿性的知识资源,知识链的组织设计和变革也至关重要,无开发、管理能力的组织会浪费知识资源带来的高额回报,从而失去知识优势。

VRIO模型是一种静态分析框架,而在现实中由于需求的变化、技术的变革与政策环境的剧变,知识优势可能会很快变成知识劣势。尤其对知识型企业来说,不可预测的威胁和机遇常常存在,所以在获得知识优势的同时,还应建立知识创新预警机制,以便及时调整战略维持知识优势。此外,用VRIO模型分析知识链知识优势还存在一个模仿性悖论——知识链越容易获得知识优势,相对于其他知识链,这种优势的模仿成本就越低。这表明要想获得长期的知

识优势,知识链应该着眼于内部知识开发,注重核心技术的培育,用独有的知识资本保持自己的知识优势。

参考文献:

- [1] 德鲁克. 知识管理[M]. 杨开峰,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7.
- [2] 顾新,李久平,王维成. 基于生命周期的知识链管理研究[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7(3):98.
- [3] 拉各斯,霍尔特蒂斯. 知识优势——新经济时代市场制胜之道[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26.
- [4] 程强,顾新,全力. 知识链的知识协同管理研究[J]. 图书馆学研究,2017(17):2.
- [5] 顾新. 知识链管理——基于生命周期的组织之间知识链管理框架模型研究[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76.
- [6] 董小英. 知识优势的理论基础与战略选择[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37.
- [7] 唐承林,顾新. 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知识优势来源与形成研究[J]. 科技管理研究,2010(11):113.
- [8] 李其玮,顾新,赵长轶. 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知识优势的内涵、来源与形成[J]. 科学管理研究,2016(5):53.
- [9] 李其玮,顾新,赵长轶. 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知识优势评价体系——以成都市高新区89家科技企业为样本的实证分析[J]. 中国科技论坛,2018(1):37.
- [10] 李其玮,顾新,赵长轶. 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知识优势影响因素:理论框架与实证研究[J]. 经济问题探索,2017(9):163.
- [11] 李其玮,顾新,赵长轶. 影响因素、知识优势与创新绩效——基于产业创新生态系统视角[J]. 中国科技论坛,2018(7):56.
- [12] BARNEY J B. Firm resource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1(1):99.
- [13] 芮明杰,方统法. 知识与企业持续竞争优势[J]. 复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3):721.
- [14] MATA F, FUERST W, BARNEY J B.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a resource based analysis[J]. Mis Quarterly, 1995(4):487.
- [15] BARNEY J B, WRIGHT P. On becoming a strategic partner: the role of human resources in gain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J].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1998(1):31.
- [16] BARNEY J B. Gaining and sustain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M].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97:134.
- [17] 张梦蝶. IBM 生存之道——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案例分析[J]. 现代商业,2017(25):111.
- [18] 林榕航. 知识管理原理[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168.



引用格式:王晓辉. 河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能力提升的检视与思考[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9(6): 97-102.

中图分类号: F49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8.06.013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8)06-0097-06

河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能力提升的 检视与思考

Review and thought on enhancing patent capability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in He'nan province

王晓辉

WANG Xiaohui

中原工学院 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河南 郑州 450007

摘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明专利状况,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科技创新实力与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然而,透视河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现有专利状况发现,河南省的创新能力一直在全国排名的中后段徘徊。虽然从绝对数量上看,近年来河南省专利数量有较大的提升,但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与河南省GDP在全国的位次不相称,发明专利比较优势不明显,发明专利授权量严重不足,存在着专利政策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黏合度不高、专利布局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合度不够、自主核心专利技术缺乏、专利运用能力有限,以及专利人才储备不足且分布不均衡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河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河南省应着力于将专利政策对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对专利进行前瞻性布局,提升核心专利技术的自主化水平,同时,实施专利运营能力提升工程,构建知识产权驱动型的创新发展人才体系,从而推动河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明专利状况;
科技创新实力;
自主创新能力;
专利能力提升

[收稿日期] 2018-06-24

[基金项目] 河南省知识产权软科学研究项目(20180106001);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182400410602)

[作者简介] 王晓辉(1979—),男,河南省禹州市人,中原工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知识产权管理。

中兴公司被美国商务部激活销售禁令进而导致公司几乎“休克”的惨痛现实,让我们认识到掌握自主核心专利技术的极端重要性,这也为知识产权助推河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目前,河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面临诸多问题。近年来,学界对于知识产权助推河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专题研究不甚充分。鉴于此,本文拟对河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能力和发明专利产出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分析河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竞争优势培育存在的问题,提出提升河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能力的应对策略,以期为知识产权助推河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理论借鉴与实践参考。

一、河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能力和发明专利产出的现状

依据国家知识产权局、河南省知识产权局的统计和部分科研机构的研究**^[1],河南省的创新能力和发明专利一直在全国排名的中后段徘徊。从绝对数量上看,近年来河南省专利数量有较大的提升。2017年,河南省专利授权总量为55407件,同比增长12.7%,其中,发明专利7914件,实用新型专利35822件,外观设计专利11671件。然而,河南省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占比分别为14%、65%、21%,与全国19%、56.2%、24.8%的比例相比仍有一定差距,河南省获权专利仍以实用新型专利为主,发明专利的比例有待提高。根据国际共识,发明专利状况是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科技创新能力的主要标准,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明专利

状况,更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科技创新实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河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的贫弱状态,说明“创新河南”建设仍然步履蹒跚。

1. 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与河南省 GDP 在全国的位次不相称

2016年河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为8091件,比2017年增加21%,然而,其增幅仅位于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中游(第14位),落后于同处于中部的湖南省、湖北省,这与河南省GDP在全国的位次(多年来蝉联第5名)是极不相称的。

2. 发明专利比较优势不明显

截至2016年,河南省拥有发明专利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仅在节能环保、生物、新能源汽车三个产业具有比较优势。依据公开渠道搜集的数据,2014年河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授权总量为1275件,占国内比重2.08%,在国内排名第14位。2014年河南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授权年增长率为负值,发展态势较差,呈明显下降趋势。2014年河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技术产业的年增长率远远高于国内相应产业的年增长率,但在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其他产业的年增长率则远远低于国内相应产业的年增长率,且均呈现明显的负增长趋势,发展态势较差。^[2]

3. 发明专利授权量严重不足

2014年河南战略性新兴产业各产业中专利授权量最多的是生物技术产业(643件),授权量最少的是新能源汽车产业(13件),各产业

* 《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国发[2010]32号)确定的国家层面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七个产业。《“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2016年)和《河南省“十三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2017年)确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先进材料、新能源、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数字创意等产业。

** 本文数据均依据公开渠道获取。由于数据的不完整性,部分结论是依据现有数据间接地推导出来的,可能会存在部分误差,有待后续权威数据与分析的补充。

占国内该产业发明专利授权量比重均不足3%。河南省专利授权量排名第一的生物技术产业占国内比重仅为2.95%,但在国内排名较为靠前,跻身前10名,省市专业化指数达0.13,具有较强的相对优势。

综上可知,河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明专利拥有量的绝对值与增速仅占全国中游位置,而且,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拥有量在2014年还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这说明,河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能力还很薄弱,科技自主创新的内生动力不足且不稳定,其专利比较竞争优势还不明显。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明专利创新实力不强、存量不足的短板,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河南省专利政策(战略)的制定、专利运用能力的提升、高层次专利人才的培养,制约了河南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与实现。

二、河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竞争优势培育存在的问题

河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数量不多、质量不高的现实状况,反映出河南省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这些问题的形成,既与河南省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历史欠账有关,又与新时期河南省知识产权战略实施不彻底、知识产权布局不科学、知识产权潜力挖掘不充分等有关。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专利政策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黏合度不高

河南省有关专利政策的文件中,涉及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政策较少*,也没有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质量的提升作为增强河

南省科技核心竞争力、引导自主创新的重要抓手与突破口,而仅将其作为日常专利工作的一部分简单提及。虽然《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意见》中提到“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引领计划”,并对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但有针对性的、衔接有序的促进专利落实的政策很少。截止到目前,通过公开渠道搜集到的专利政策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结合度较高的文件,仅有《河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引领计划管理办法》。然而,这个文件主要是管理方面的规定,而不是具体的专利支持政策。同时,河南省有限的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专利政策,除同国家、本省经济科技政策的衔接不甚紧密外,对于金融、税收、执法等方面的保障措施的具体规定,在落实上也缺乏可操作性。

2. 专利布局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合度不够

从宏观上看,河南省缺乏专门的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发展的总体战略,部分构想也只是蕴含于河南省知识产权整体发展的战略之中,从而在主政策与子政策之间就出现了断层;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布局和其他产业知识产权类型布局之间,也缺少应有的融合与衔接。这种单一而非综合的专利布局,无法形成合力,收到“1+1>2”的效果。从微观上看,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布局中,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公司管理层、市场部门、研发部门对于构建专利组合,形成层级分明、功效齐备、要素完整的企业专利格局的整合度不足,专利布局设计的科学性也有待检验,因而导致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所涉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应有的推动力无

* 如仅在《河南省专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在我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与现代农业中选择集聚度较强、更具优势的产业领域开展专利导航工作,引导我省的重点优势产业找准发展方向,着力培育高价值高质量核心专利,快速完成转型升级;在《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省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提到,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链超前部署创新链、导航布局专利链,推行知识产权布局与产业链相匹配的知识产权集群管理。其他专利政策文件未见再提及。

法得到充分的释放。

3. 自主核心专利技术缺乏

国家知识产权局规划发展司撰写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统计分析报告(2017)》显示,河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实力在全国仅排第15位,处于中游水平,且只在节能环保、生物、新能源汽车3个产业具有专利比较优势,其他4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质量现状还无法完全支撑我省知识产权强省建设。具体表现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所需的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共有技术申请专利数量少,专利质量不高;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链各节点上的技术水平参差不齐,未能发挥协同效力;尚不具备“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的知识产权要求;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效率低,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创新资源的意识和能力较欠缺^[3];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生态的超前引领,在理念和实践上均相对滞后。

4. 专利运用能力有限

河南省整体研发实力偏弱、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的问题,影响了后续发明专利之经济价值的挖掘与专利运用能力的提升。通过对2017年河南省知识产权流动水平与专利发展水平的考察^[4],可以看出河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运用能力比较薄弱。例如,从反映知识产权进入市场后的运营状况的河南省技术市场交易指数、技术市场规模指数、技术外溢度指数、技术国际竞争力指数、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指数等指标及其排名看,河南省知识产权运营状况处于全国中下游水平;从专利流动效率、专利效益、专利有效性、专利金奖、技术国际竞争力、专利发展效益等内涵性指标看,大部分指标仍处于全国中游水平。这说明河南省当前的自主创新能力和专利运营能力不足。虽然河南省的专利金奖指数的排名较高,但是河南省专利产出和运营效率整体上的劣势与不足仍然是显而易见的。

5. 专利人才储备不足且分布不均衡

从整体上看,河南省科技人才虽然在数量上较多,但是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的数量相对不足,而支撑“创新河南”建设的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本土高水平专业技术人才尤为缺乏。河南省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少、小、弱”的问题,缺乏高效运转的区域性、行业性与专题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大部分知识产权服务人员只能负责代理业务,知识产权高端服务能力欠缺^[3]。通晓知识产权国际规则、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策划与新兴产业知识产权规划,能代理涉外知识产权诉讼的高端服务人才,更是极度匮乏^[5]。同时,现有的科技创新、知识产权专业人才主要集中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中,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中服务的相对较少,诸多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还没有特设的知识产权专员,能够融合自然科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知识的复合型人才更为稀少。

三、提升河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能力的应对策略

针对河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创新实力薄弱的现实,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专利竞争优势培育中存在的问题,河南省应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能力的提升为突破口,培育自己独有的专利比较竞争优势,以推进“创新河南”建设。

1. 专利政策应对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其一,推进河南省科技创新政策、专利政策与产业政策之间的对接和协调。应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战略规划与知识产权政策的融合协调和超前引领,构建“官产学研用”联合创新平台,支持和引导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联合设立研发机构,对河南省域内的科技资源进行产权化整合。

其二,进一步完善以保障和激励创新驱动发

展为宗旨的专利政策体系。应设置多样化的专利奖励方式,加大资金奖励和政策优惠力度,对专利贫瘠的某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企业进行定向帮扶;建立以专利为主要内容的激励创新驱动的绩效评价体系;完善专利评价政策,把高质量专利的产出与运用作为项目投资、科研立项、绩效奖励、职称评定、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和各类科技园区申报与认定的重要评价指标。

2. 对专利进行前瞻性布局

河南省应在现有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权存量的基础上,将发明专利、核心高质量专利、产业专利分布情况、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发明专利运用情况、重大项目前沿专利技术等,融入专利布局整体战略框架之中,结合河南省知识产权事业发展规划、专利开发实力、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优势、企业的专利消化创新能力、企业自身商业战略和河南省市场竞争环境,对河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明专利数量与构成结构进行科学布排与合理组合,绕开专利壁垒,积极做好专利诉讼应对,抢占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先机。同时,应按照“一业一策”的原则,把握重点,分类推进。对于河南省具有比较优势的节能环保、生物、新能源汽车3个新兴产业,应运用路障式布局、城墙式布局和地毯式布局模式,对本产业已经具有核心技术或者处于专利优势地位的专利,形成一个严密性、层次性强且性价比优越的专利防护网;对于河南省发展薄弱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4个产业,进行丛林式布局,通过由外而内、从量到质的外围专利组合的设定与优化,获取其专利竞争优势。

3. 提升核心专利技术的自主化水平

其一,增强高价值、高质量自主核心专利创造能力。应按照五大国家战略部署和河南省《先进制造业大省建设行动计划》,设立高价值、高质量专利培育专项资金,深入实施专利导

航工程,在河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中选择集聚度较强、更具优势的产业领域开展专利导航工作,引导河南省重点、优势产业找准发展方向,着力培育高价值、高质量核心专利,抢占产业和技术制高点^[6]。对于节能环保、生物、新能源汽车3个具有专利竞争比较优势的产业,应将培育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自主标准作为首要任务和核心目标,继续加大专利优惠政策支持力度。对于其他4个产业,应结合国内外这些产业的专利发展态势与企业需求,将知识产权作为重要指标,融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竞争力的考核体系。

其二,优化现有自主核心专利技术的竞争机制。应对河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具有自主核心技术的科技项目与成果进行专利前置审查,设立发明专利考核硬指标与检测体系,设定专利存活率、企业对外发明专利申请产出率、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产品销售收入等一批围绕科技创新的指标,并与本单位知识产权年度工作考核挂钩^[6]。在科技创新规划及其实施中,应确立核心高质量发明专利在推进河南省自主创新建设中的决定性地位,打造河南自主创新优势品牌,通过自主核心技术的产权保护,巩固河南省优势产业的专利竞争优势,积极发挥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自主创新引领与辐射作用。

4. 实施专利运营能力提升工程

应支持河南省技术产权交易所建立网上专利实时评估系统和竞价系统,构建以专利价值评估、转让许可、投融资、股权交易、债券交易、质押物处置等为支撑的网上网下相结合的交易服务体系,以此为河南省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提供市场化的价值实现途径与金融支持。具体措施包括:探索市场化专利管理公司建设,发展具有第三方支付等功能的专利转移机构;大力发展专利投融资和专利保险工作,推动金

融机构开发专利质押融资和专利保险新模式,完善专利投融资风险管理与补偿机制;推进采用债转股与反向许可等模式,探索开展专利权证券化、信托、出资,支持知识产权+互联网金融服务;鼓励开展同业担保、供应链担保等业务;设立省市财政知识产权运营投资基金,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投资;设立以专利投资基金、集合信托基金、融资担保基金、风险补偿基金等为基础的投融资平台和工具,搭建资产评估与知识产权专家、知识产权投融资试点合作平台^[7],推进专利与金融的深度融合。

5. 构建知识产权驱动型的创新发展人才体系

河南省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应适合建设“创新河南”的需要,以高层次人才和紧缺人才为重点,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着力培养和开发能够掌握自主核心知识、关键技术的工程技术专业人才,依托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重点创新项目以及郑洛新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创新创业平台,设立科学家工作室,大力培养、引进、建设高层次创新人才和重点领域创新团队。同时,应加强河南省内高校战略性新兴产业学科建设,建立校企联合培养人才新机制,注重复合型、实用型知识产权专业人才与国际化人才培养;继续支持知识产权培训平台建设,制定并完善培训计划和课程体系设计,加快建设省级知识产权人才库和交流平台,建立知识产权从业人员的资质认定、分级评价、技术职务评聘体系;着重吸引和聘用海外掌握知识产权法律和技能、熟悉知识产权国际规则和事务的高端人才来豫全职、兼职或短期工作。

四、结语

河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特别是发明专

利的数量与质量,体现了河南省自主科技创新实力的强弱。通过对河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竞争情报、专利数量、专利被引次数、专利成长率、专利实施率、产业标准化等指标经济与技术方面的统计与分析,可以为河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提供决策参考。河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能力的提升与竞争优势的培育,需要政府与相关企业正确制定专利战略,对专利进行前瞻性布局,提升核心专利技术的自主化水平,实施专利运营能力提升工程,以及构建知识产权驱动型的创新发展人才体系等,以推动河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 [1]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16—2017)[R]. 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6:7.
- [2] 国家知识产权局规划发展司.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统计分析总报告(2015)[R]. 2015:157.
- [3] 李文丽,陈景翊. 运用知识产权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对策[J]. 经济纵横,2014(11):36.
- [4] 王正志. 中国知识产权指数报告(2017)[R].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7:213-214.
- [5] 李明星,何娣,张懿,等. 知识产权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实证研究——以江苏省为例[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13(9):56.
- [6] 河南省知识产权局. 河南省专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EB/OL]. (2017-02-15)[2018-05-12]. www.hnkjt.gov.cn/2017/03/08/14889-81586586.html.



引用格式:王伟,蔡幸,黄巍华.金融助推广西特色小镇建设的对策研究[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6):103-108.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8.06.014

文章编号:1009-3729(2018)06-0103-06

金融助推广西特色小镇建设的对策研究

Study on countermeasur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aracteristic towns in Guangxi based on financial perspective

王伟, 蔡幸, 黄巍华

WANG Wei, CAI Xing, HUANG Weihua

广西财经学院 金融与保险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3

摘要:特色小镇作为经济新常态下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已成为国家和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但建设和发展特色小镇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基于资金均衡、数量均衡与固定资产投资配比三种路径研究预测广西轻、重资产型特色小镇建设,发现广西特色小镇建设的资金需求巨大。当前广西特色小镇建设投融资程序繁琐、地方政府财政实力偏弱、融资渠道偏窄,特色小镇建设项目自身收益性低、风险性大等,是广西特色小镇建设面临的主要投融资问题。广西应做好顶层设计,科学界定政府职能,优化特色小镇投融资扶持政策,统筹整合各级财政资源,加大银行等金融系统对特色小镇建设投融资的支持力度,构建特色小镇建设项目多元投融资体系,以解决特色小镇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资金瓶颈问题,推动特色小镇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

特色小镇;
资金需求;
政府金融;
市场金融

[收稿日期]2018-07-19

[基金项目]广西数理金融高水平创新团队及卓越学者计划项目(桂教人[2014]49号)

[作者简介]王伟(1978—),男,河南省南阳市人,广西财经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商业银行管理;蔡幸(1974—),女,广东省南海市人,广西财经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区域金融。

“特色小镇”一词于2017年底亮相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彰显特色小镇成为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的同时,肯定了特色小镇建设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供需两侧发力的黄金结合点。广西积极贯彻中央精神并持续发力推动自治区特色小镇发展,2017年迅速出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培育广西特色小镇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通知明确,到2020年,要培育30个左右全国特色小镇,建设100个左右自治区级特色小镇、建设200个左右市级特色小镇,激活2000亿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但特色小镇建设任重道远,广西乃至全国,资本短缺是阻碍快速发展的瓶颈。如何多渠道、多形式利用金融资本助推特色小镇发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前金融助力特色小镇发展的的问题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宋艳丽^[1]认为,开发性金融由于具有目标、功能、效率、手段等方面的特性和优势,更能破解小城镇发展的资金瓶颈;宣吉方等^[2]认为,为贯彻特色小镇发展战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应创新体制,提高金融支持能力;李涛^[3]认为,特色小镇的基础设施项目可采取政府采购、PPP和资产证券化等融资模式,重大项目可采用中长期贷款、投贷联动、融资租赁等融资模式,特色小镇建设中的中小企业发展可采用银行贷款、产业基金等融资模式;魏蓉蓉等^[4]对PPP模式支持特色小镇发展进行了研究,认为PPP可以为特色小镇建设提供持续的金融支持;袁军^[5]提出应从完善金融体系、拓宽融资渠道等方面加大金融助推特色小镇建设的力度;万树等^[6]认为,PPP模式是助推特色小镇发展的重要融资模式,但由于特色小镇经济发展慢、金融市场程度低和地方财政自给力不足,因而存在PPP融资风险,这就要求特色小镇、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三方通力协作。

综上所述,关于金融助推广西特色小镇建

设,已有研究涉及开发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社会性金融,但由于2016年国家才全面推行特色小镇发展战略,因此研究金融助推特色小镇发展的文献还比较少,且没有形成规模性和系统性的研究;广西由于地处西南边陲,针对金融助推广西特色小镇建设的研究就更少。建设特色小镇是我国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研究金融助推广西特色小镇发展,将有助于广西加快贯彻国家战略,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实现以小城镇带动大发展的目标。鉴于此,本文拟在研究特色小镇战略推进所带来的巨大投融资需求和当前广西在这方面面临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推动广西特色小镇持续健康发展。

一、广西特色小镇发展现状

广西探索推进区域村镇建设较早。从2010年底到现在,广西村镇建设经历了从特色名镇名村、美丽广西乡村到如今的广西特色小镇的发展过程。2017年出台的《意见》对广西特色小镇做了明确界定。

1. 目标与规划

广西在承袭浙江等发达地区特色小镇建设标准的基础上,明确广西特色小镇是“相对独立于城市中心区,具有明确产业定位、文化内涵、旅游特征和一定社区功能的发展空间平台”,小镇主要以“建制镇(乡)、产业园区、现代农业核心示范区、特色旅游集聚区等”为载体,分国家级、自治区级和市级进行培育,强调要拓宽融资渠道,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积聚全社会资源;同时细分产业类型,建设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等具有广西地方特色和产业优势的小镇,进而实现“一个主题文化品牌、一个文化场馆、一个小镇公园、一个具有独特文化肌理和建筑风貌的小镇核心区文化展示”的“四个一”广西特色小镇建设目标。

为全面贯彻国家大力发展特色小镇建设精神,《广西培育特色小镇意见》提出,到2020年,要培育30个左右全国特色小镇、100个左右自治区级特色小镇、建设200个左右市级特色小镇。该意见的出台为广西贯彻国家特色小镇发展战略、发展广西区域经济明确了方向。

2. 政策环境

为推动广西特色小镇建设,广西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2010年底,广西颁布了《关于促进特色名镇名村发展的意见》,之后每年持续推动自治区工贸型、生态(农业)型、旅游型和文化型特色名镇名村遴选和建设。截至2016年底,共创建了90个特色名镇名村,其中工贸型10个,生态(农业)型20个,旅游型36个,文化型24个,为推进广西特色小镇建设积累了经验。

2014年,为加快推进镇域经济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广西又出台了《广西百镇建设示范工程实施方案》,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在培育主导产业,发展工业、边贸、旅游和文化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和支持政策,进一步优化了广西特色城镇发展的政策环境。

2017年10月,广西出台了《广西培育特色小镇意见》,提出培育特色小镇有利于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有利于集聚产业人口、有利于完善设施服务,从要求、任务、创建程序、支持政策和政策保障5个方面提出了指导意见。《广西培育特色小镇意见》总体上借鉴浙江等发达地区特色小镇建设经验,立足广西实际,要求住房城乡建设、发展改革、国土资源、文化、旅游和产业等主管部门协同配合,并辅以每个小镇2000万元补助资金奖励,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积极有序推进特色小镇建设。该意见的颁布为广西特色小镇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

3. 国家级特色小镇培育

2016年7月,住建部、发改委、财政部三部

委联合发布《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启动了全国特色小镇培育工作。同年8月,住建部启动了全国特色小镇推荐遴选工作。截至2018年8月,广西共有14个镇入选,其中工贸型4个(木乐镇、桥圩镇、陆屋镇、新和镇),农业(生态)型5个(莲花镇、校椅镇、侨港镇、溶江镇、六堡镇),文化型3个(南康镇、贺街镇、刘三姐镇)、旅游型2个(中渡镇、黄姚镇)。

二、广西特色小镇建设规模和资金需求预测

1. 社会投入

《广西培育特色小镇意见》指出,广西特色小镇建设要分轻资产型特色小镇和重资产型特色小镇来进行,这两种类型的特色小镇的建设面积原则上按1~3平方公里面积进行建设,但对这两种类型的特色小镇的社会投入要求不同。文件明确要求轻资产型社会投入要达到每平方公里8亿元以上,重资产型社会投入要达到每平方公里16亿元以上。但根据广西经济发展预测和其他省市特色小镇建设投入情况,广西轻资产型特色小镇建设未来社会投入可能会达到每平方公里8~24亿元,重资产型特色小镇社会投入可能会达到每平方公里16~48亿元。

2. 建设数量

《广西培育特色小镇意见》从整体上确立了广西特色小镇建设数量和投入资金规模,但没有明确指出轻、重资产型和国家级、自治区级、市级三种类型特色小镇的拟建数量。通过研究分析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未来走势、过往政策实施路径与固定资产投资占比等因素,广西特色小镇按照轻、重资产分类,数量均衡、资金均衡、固定资产投资配比三种路径拟建数量如表1所示。

3. 资金需求

如果进一步把特色小镇建设分为低、中、高

三种情况,三种情况下轻、重资产型特色小镇每平方公里社会投入分别对应为8亿元、16亿元、24亿元和16亿元、32亿元、48亿元,三种情况下资金需求总量如表2所示。从预测结果可以看出,只有低情况和资金均衡下,才最为接近《广西培育特色小镇意见》计划的2000亿元固定资产投入。同时考虑到广西农业发展和旅游业的天然优势,未来广西特色小镇建设轻、重资产类型数量比为2:1较为合理,符合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实际。

根据社会投入,进一步对预建设的轻、重资产类型特色小镇数量优化调整 and 进行梯形部署,按照低情况下轻、重资产型特色小镇每平方公里社会投入分别为8亿元和16亿元,为实现特色小镇发展目标,广西特色小镇建设的资金需求总计为4600亿元,具体见表3。

表1 广西特色小镇轻、重资产分类建设

建设路径	数量预测	
	轻资产型	重资产型
数量均衡	150	150
资金均衡	200	100
固定资产投入配比	112	188

表2 广西特色小镇投资需求总量预测 亿元

建设路径	低情况	中情况	高情况
数量均衡	3600	7200	10800
资金均衡	3200	6400	9600
固定资产投入配比	3904	7808	11712

表3 广西低情况特色小镇资金需求预测

资产类型	建设面积/平方公里	建设数量/个	投资需求/亿元
轻资产型	1	135	1080
	2	45	720
	3	20	480
重资产型	1	65	1040
	2	25	800
	3	10	480

三、广西特色小镇建设面临的投融资问题

2017年广西全区国内生产总值(GDP)仅为20396.25亿元,全区财政收入仅为2604.21亿元,面对特色小镇建设庞大的资金需求,财政资金捉襟见肘。这就要求广西应从自身实际出发,充分利用金融利器,创新投融资模式,开拓多层次投融资渠道。目前,广西特色小镇建设面临如下投融资问题。

1. 融资程序繁琐减弱了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

广西特色小镇主要以建制镇(乡)、产业园区等为载体进行培育,特色小镇建设主要依托乡镇政府落实开展。但目前乡镇政府并不是一级完整的预决算财政单位,没有融资权限,需要层层上报等待审批,程序冗长繁琐,工作效率较低。同时乡镇一级政府对项目决策缺乏主导权,企业进入乡镇的制约性较大。这些都可能造成特色小镇建设投融资缺乏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

2. 财政实力偏弱降低了财政支持特色小镇建设的力度

特色小镇建设项目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维护与公共服务配套方面,前期启动阶段的资金投入需求较大,需要自治区和地方财政支出支持。但是,一方面广西财政收入规模处于全国中下游水平,2017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615.03亿元,在全国仅排第22位;另一方面广西财政自给率较低,对中央财政支持的依赖度较大,2017年全区获中央补助资金2634.72亿元,占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的46.3%,财政自给率仅为32.87%。同时广西地方政府债务率较高,截至2017年底,柳州、南宁、钦州、北海等地的地方政府负债率已超过警戒线。面对资金均衡路径下广西特色小镇建设所需要的4600亿元的资金,地方政府财政支持捉襟见肘。

3. 融资渠道偏窄制约了特色小镇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快速发展

广西特色小镇建设需要激活 2000 亿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通过固定资产投资形成城乡结合的新平台,以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目前,预算内资金、国内贷款、利用外资、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是广西固定资产投资的 5 个资金来源。长期以来,广西固定资产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自筹资金、国内贷款和预算内资金,利用外资和通过其他渠道融资获得的资金很少,融资渠道偏窄。2017 年,广西实际利用外资额仅为 8.2 亿美元,比全国均数低 15.3 个百分点。随着 2017 年《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7 号)的出台,政府购买服务严重受限,同时随着银行信贷资金加紧风险防范,国内贷款支持特色小镇建设力度趋向疲软,融资渠道偏窄严重制约了广西特色小镇的快速发展。

4. 特色小镇自身属性加大了投融资难度

广西特色小镇建设项目大多具有收益性低、风险性高的特点。前者因为特色小镇建设虽然以产业发展为主导,但同时以完善设施服务、建设宜居城镇和提高城镇居民生活质量为最终目标,特色小镇建设项目很多集中在基础设施完善与公共服务提高方面,这一类项目收益率非常低。由于特色小镇项目的建设周期都比较长,一些涉及农业、旅游、环保、养老等融资项目建设周期一般都需要 3~5 年以上。需要融资的额度比较高,项目收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这就加大了项目融资的风险性。特色小镇建设项目的这两大金融属性,加大了项目建设的投融资难度。

四、金融助推广西特色小镇建设的政策建议

1. 做好顶层设计,科学界定政府职能

一方面应做好顶层设计,引领特色小镇发

展。各级政府应通力协作,做好顶层设计,科学划分特色小镇投融资项目,制订特色小镇长期和中短期投融资规划,尽快启动特色小镇投融资项目建设。另一方面应科学界定各级政府的职能,明确特色小镇投融资的方向与渠道。乡(镇)一级政府应具有一定的投融资决策主导权,负责特色小镇投融资项目实施;县一级政府应成立特色小镇建设项目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出台特色小镇项目投融资方案等;市、自治区一级政府应为办理特色小镇建设资金上报、审批等事宜开辟绿色通道。

2. 优化特色小镇投融资扶持政策

应统筹整合和安排特色小镇建设用地,在特色小镇土地利用指标与融资等方面给予便利,保障特色小镇项目合理用地空间,增强特色小镇投融资项目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同时应量身制定特色小镇税收减免、贷款利息补贴等优惠政策,增强特色小镇建设项目的吸引力,减轻特色小镇建设项目的投融资风险,吸引更多社会资本积极参与特色小镇建设。

3. 统筹整合各级财政资源

自治区政府应尽快落实各项补助资金,根据广西区情,向国家申请资金支持。应统筹自治区、市、县的财政资金,精准把握支持重点,大力支持特色小镇项目建设。同时应根据特色小镇建设项目情况,整体打包列入年度自治区重点项目,使其能享受重点项目优惠政策或优先获得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政策性银行的长期低息贷款。

4. 加大银行体系对特色小镇建设的金融支持力度

银行体系作为我国金融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助推广西特色小镇建设发展的最重要的金融力量,应统筹开发性银行、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等各类银行融资主体,建立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互为补充的支持特色小镇建设

的银行融资体系。开发性、政策性银行应发挥其综合服务功能和作用,加大信贷支持,提供优惠的中长期贷款,并引领带动商业银行、社会资本参与广西特色小镇建设。商业银行应进一步完善金融服务体系,为特色小镇建设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支持,同时还应大力创新金融产品,有效对接特色小镇项目建设。

5. 构建特色小镇建设项目多元投融资体系

应创新融资模式,拓宽融资渠道,构建特色小镇建设项目多元投融资体系。应鼓励特色小镇建设中的基础设施领域投融资项目优先考虑选择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鼓励有稳定现金流的特色小镇项目通过PPP、资产证券化融资,同时在特定条件下允许地方政府发行特色小镇建设专项债券、绿色债券,支持设立自治区特色小镇建设专项基金,支持项目业主引入保险资金等参与具有稳定收益的项目建设和运营。同时还应创新运用券商资管、信托计划、融资租赁、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与并购重组等多种金融工具进行特色小镇项目融资,大力形成和建设广西特色小镇建设项目的多元投融资体系。

五、结语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在进入新常态这一关键时期,建设广西特色小镇将成为推进广西经济

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但由于广西经济底子薄,特色小镇建设任重道远,资金不足已成为其快速发展的瓶颈。金融作为特色小镇建设发展的重要推手,在广西特色小镇建设过程中,应创新融合政府金融和市场金融,构建多层次多渠道融资体系,使“金融活水”充盈广西特色小镇建设的“蓄水池”,以加快推进广西特色小镇建设。

参考文献:

- [1] 宋艳丽. 开发性金融支持小城镇发展的策略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 2014(1): 61.
- [2] 宣吉方, 陈颂华. 农业政策性金融支持特色小镇的战略思考[J]. 农业发展与金融, 2016(5): 30.
- [3] 李涛. 经济新常态下特色小镇建设的内涵与融资渠道分析[J]. 世界农业, 2017(9): 75.
- [4] 魏蓉蓉, 邹晓勇. 特色小镇发展的PPP创新支持模式研究[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7(10): 125.
- [5] 袁军. 金融资本推动特色小镇发展思考[J]. 青海金融, 2018(7): 24.
- [6] 万树, 徐玉胜, 张昭君, 等. 乡村振兴战略下特色小镇PPP模式融资风险分析[J]. 西南金融, 2018(10): 11.